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文学姻缘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风

## 自序

这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我所写的有关书的评价的结集。由于我长达40年的编辑工作主要是从事日本文学的研究、编辑和翻译，所以本集所收录的34篇文章，半数以上是有关日本文学的，其中有两篇应属于中日比较文学范畴：《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以及《川端康成的水月和沈从文的阿金》。我在介绍幸田露伴、泉镜花、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宫本百合子、五味川纯平、三浦绫子、远藤周作及大江健三郎时，着重写了他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那场不义战争的态度。例如在《在暧昧的日本——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一文中，就介绍了他在美国《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名《否认历史导致日本无能》的文章中，曾愤慨地抨击了日本政府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毫不认罪的态度。可惜我国倒有些人居然置民族感情于不顾，曾试图于1995年秋季在武汉大学召开三岛由纪夫国际研讨会，从而掀起一股三岛由纪夫热。这些人竟全然忘记了三岛由纪夫是个鼓吹军国主义复活的反动文人。幸而由于有关方面及时坚决制止，未成事实。

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方面，日本女作家三浦绫子和大江健三郎同样旗帜鲜明。十几年前，她曾寄给我一篇题名为《爱国心》的短文，我把它译出来附在《绿色棘刺》中译本的前言中了。该文的大意是：由于她经常指出：“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做过残酷的事”，有些日本人就公然写信给她，说她缺乏“爱国心”。但她认为，敢于出面反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在该文末尾她写道：“倘若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全体日本人都拒绝打仗，我们就不会遭受原子弹轰炸，也不至于死去几百万人。当然其他国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被我们杀害。总之，凡是知道日本所犯下的罪行的人们，都应该承认侵略就是侵略，战败就是战败。不过我预感到，这种人在日本日渐减少了，我为之忧心忡忡。”

值得欣慰的是，1993年，大江健三郎和三浦绫子分别被推选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十大作家中的第五位和第七位。这表明日本读者大众也在反思过去，并对未来做出抉择。

我从小就对书爱不释手。每天放学回家，我往往捧着一本书，边走边读。幸而那时古城北平人烟稀少，汽车更是寥寥无几，所以从来没出过事，家里人也不知道。由于在家中也总是闷声不响地看书，父亲叫我“书呆子”。

我在东华门孔德小学念完一年级，任外交官的父亲就把六个子女都接到日本东京去了。父亲为我们请了一位姓今野的家庭教师，每天晚上辅导一小时的日文，所以入东京麻布小学的时候，我们毫不费力地就跟上了班。那阵子我还喜欢画画，有空就把小人书上的画一张张地描摹下来。父亲说：“以后你就把小人书上的日文对话写成中文吧。这就叫翻译。”我一向听话，就认真干了起来。

10岁上，父亲又鼓励我把他所收藏的《世界小学读本》日译本再转译成中文。于是，我花了足足4年时间硬是把那100万字的10卷集一篇不漏地译了出来。父亲和大姐馥若都替我润色过一部分，大姐还夸过我的译笔。1966年抄家后，我手头居然还留下了一本当年的译文。那是《美国小学读本》高年级的部分，其中包括美国作家华盛顿·艾尔文的《瑞普·凡·温克尔》。不知怎么一来，在“文革”中我也进了“牛棚”，造反派天天要我们写交代材料。当时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就把这部用线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我少

女时代的译文交上去，作为从小就走“白专”道路的“罪证”。估计造反派早把它随手丢进了字纸篓。当然，如果和同一时期丢失的萧乾的一个作文本相比，我这点损失也算不得什么了。记得那是用墨笔写的，可贵的是还有老师密密匝匝的批语。有一篇写的是人骑着驴，驴累得气喘吁吁，人还嫌驴走得慢，用鞭子不断抽驴，于是驴发出怨言。写得有点像寓言，又像是在诉人间的不平。据萧乾有一次告诉我，当时教他的是一位老先生。从批语中看，这位国文教员似乎认为这个学生是能够成为作家的好苗子。这个作文本，萧乾并没有上交给造反派，但抄家后搬了几次家，就不见踪影了。

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后，正是出于对书的爱好，我就考入了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当上一名校对，成天同书稿打交道。转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经我主动要求调了去，可以说，我这一生同书（尤其是文学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祖父文静川曾留下他写的两部诗集，记得是线装本，铅印的，现在自然不见了。父亲鼓励我搞翻译时，一遍遍地念叨：“将来你的名字要是印在书上，该有多好！”我总算没辜负他那番殷切的嘱望。如今，我的书架上已经摆了不少本自己翻译或写的书了。

50年代初，正是书这个红娘使我步入了萧乾的生活。这些都已写进本集那篇《文学姻缘》里了。

我是从译书起步的，近些年来，由于编辑工作的需要，又经报刊编者们的督促，也写了一些，其中大多是关于书的评介。我的人际关系也一般是通过书而建立的。这方面我自认为是很幸运的。

文洁若

1997年4月25日

## 总 序

季羨林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变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及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毫无

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书海浮槎》，实在也是天下一件“好事”。因此，我十分乐意为这一套书写这样一篇短序。

1997.4.8



## 文学姻缘

## 晚年的冰心更辉煌

像许多人一样，我最早读的现代文学作品也是冰心写的。记得那年我才6岁，读的是她的短篇小说《寂寞》。从那以后，我爱上了大海，爱上了月光，更重要的是也爱上了文学。

自从同萧乾结缡以来，我就由她的书接触到她本人。20年代，当如今已交八六的萧乾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最要好的同窗就是冰心大姐的三弟为楫。为楫常带他到中剪子巷那座三合院去玩，他也跟着喊那位头上还留着月牙弯、却已发表了好几篇作品的端庄少女作“大姐”——一喊就是七十几年。30年代萧乾上燕京大学时又成了吴文藻的门生。现在，吴先生和为楫均已作古，萧乾成为大姐在世上最老的朋友了。所以我少不得也经常有缘见到这位慈祥睿智的大姐，她还为我的第一部散文集《梦之谷奇遇》写了序。这几年，她遵医嘱谢绝来客，但萧乾是例外。1992年2月8日，大姐写来了这样一封信：

“最近又得一次‘房颤’，急救过来了。小妹管我极严，‘不见客，不写信’，但饼干舅舅除外。”

萧乾早年叫“萧秉乾”，因而被同学们起了个外号叫“饼干”。后来他把“秉”字去掉了，然而在大姐那里，他依然是“饼干”。她的子女则称他为“饼干舅舅”。我们总把大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每一次去，从来不超过半小时。告辞前，她就深情地握着萧乾的手，吻别他，也总亲切地吻吻我。我们知道，大姐每次见到萧乾都会联想起她的亡弟。

大姐一向重视教育事业，关心下一代的成长，这封信中所说的“房颤”，就是由于有几十个小学生来看望冰心奶奶，一批批地轮流进屋来，终于把她累垮了。

每当我们到冰心大姐的书房去看望她，必得经过她的客厅。那里挂着一对笔力遒劲的条幅：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上款是：“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落款是：“梁启超乙丑沐佛日”。我总觉得，梁任公书写的那两句话正好是与世纪同龄的大姐那光明磊落、胸襟开阔的一生的写照。

冰心大姐曾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无论是抗战期间到大后方，还是战后出国，她都随身带着这对条幅。“文革”期间抄家，它被压在一堆杂物底下，从而免于遭到破坏。

冰心是幸运的。11岁以前，她跟着英勇地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的父亲谢葆璋，在烟台的海边生活了8年。朝夕与浩淼的海洋做伴，使她具有了坦荡荡的胸怀。思想开明的父亲把这个早慧的女儿当做男孩子来栽培，教她骑马、打枪，带她乘汽艇，登军舰。她耳闻目睹的净是兵营生活，自幼养成了军人般的豪迈、大无畏气质。父亲，一位副舰长，经常讲给她听的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更激发了她的爱国主义至情。

冰心是幸运的。天资聪颖。家庭和学校的的教育，时代的风风雨雨造就了她，使她在五四运动初期就以诗歌及散文的形式写出风格清新的佳作，



熏陶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和读者。

冰心更大的幸运还在于：这位女寿星以耄耋之年，当绝大多数同龄人早已才思枯竭时，她却老当益壮，喷发出火一般的激情，写下了一篇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今年8月间，萧乾忽然接到一封东瀛来鸿，是日本女汉学家冈田祥子用流利通畅的中文写的，字迹娟秀，还附有一部由她本人译成日文的《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苏晓康、张敏著），书中夹了几张她与冰心及其女儿吴青等的合影。信的大意是：她曾多次访华。在翻译《忧思录》的过程中，她注意到了冰心的小说《万般皆上品——一个副教授的自白》和散文《我请求》。她目前正在写一篇《关于八十年代的谢冰心》，很想采访一下萧乾，只要他肯见，她马上就申请护照，专程来京。

我在萧乾回信之前，就先把《忧思录》的日译本翻看了一遍，并且细读了译本序。这篇写于1994年5月5日的近40页的序言，与其说是《忧思录》的序，倒更像是一篇“冰心论”，题目是《写在前面——以谢冰心的我请求为中心》。冈田详细介绍了《万般皆上品——一个副教授的自白》和《我请求》的内容。还把冰心大姐在《我请求》一文中对《忧思录》的高度评价也译了出来：

这篇《神圣忧思录》广闻博采，字字沉痛，可以介绍给读者的句子，真是抄不胜抄。……

由于萧乾在《能爱才能恨——为“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而作》一文着重谈了冰心的《我请求》等作品，冈田从中引用了四段。冈田这篇日译本序是这么结尾的：

萧乾也说：“冰心大姐深深地爱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古老民族……”只要一息尚存，她就爱中国，鼓舞中国人民，关心中国的未来，并且不断地谈论教育。

冈田祥子女士是8月31日来到我们家的。寒暄毕，她首先想知道的是萧乾在《能爱才能恨》一文第二段中所谈到的“1957年当她也在报上被点了名时，我忘记了自己当时的遭遇，一直在为她捏把汗”，指的是什么。萧乾告诉冈田，当社会学家费孝通已作为右派分子被公开批判，而他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一文也被批成毒草时，有人站出来揭发该文中所引唐诗是冰心大姐提供的。于是，她也在报上被点了名。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为右派分子提供炮弹就等于同谋。何况冰心大姐家已经出了三个右派（丈夫吴文藻教授、三弟为楫、儿子吴平）！

这时，周恩来总理派车把冰心大姐接到中南海的西花厅去。她怀着一腔悲愤对总理说，如果吴文藻是右派，我就是漏网右派，因为我同他在思想上是差不多的。不过，周总理和邓大姐也只能对冰心表示一下关怀，恳切地劝她好好帮助吴文藻而已。

萧乾还告诉冈田，50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竭力否定自己，领导指到哪儿，就安于在那儿当个驯服工具。然而经过“文革”这场浩劫，80年代人们开始反思，这位写海写爱的冰心大姐也实在隐忍不下去了，就振笔写出一篇篇愤世警世之作。这些文章在社会意义上绝不亚于《寄小读者》和《超人》。

萧乾在《能爱才能恨》中所谈到的《孩子心中的“文革”》是一批回忆

和反省文章的结集。想当年，在惨绝人寰的浩劫中，这些作者曾卖力地投身打砸抢，有的手上还沾满了鲜血。冰心一家人在“文革”也吃尽了苦头，但是浩劫之后，她从不谈个人的遭遇。她的心紧紧地系在祖国的前途、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上。然而在为这个集子所写的短序中，她还是痛心疾首地指出：

“在孩子们的‘难忘一事’中，就有吴晗和田汉挨斗的惨状，以及一位校长让学生用图钉打脸等事实，看到和忆起都使我气愤填膺！……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难忘一事’永远铭刻在心，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由独自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

也许由于冰心大姐的名望的关系，这篇措词尖锐的短序居然还是在《北京晚报》（1986年11月7日）上全文刊载出来了。次年7月13日，她又针对社会上轻视教育以及教师待遇太低的问题写出讽刺小说《万般皆上品——一个副教授的自白》。这回可犯了忌，差点儿就被从印版上撤下来。冰心说：“这是我60年创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据说是‘上头’有通知下来，说是不许在报刊上讲这种问题。若不是因为组稿的编辑据理力争，说这是一篇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为什么登不得？此后又删了几句刺眼的句子，才勉强登上了。”<sup>1</sup>

但是冰心这位耿直不阿、愤世嫉俗的老人家毫不气馁，她接着又写了《介绍三篇小说和三篇散文》（1987年9月26日）。文章是这么结束的：“从我的许多朋友口里也听到许多使人气愤的事，就像《房租》这篇中所说的‘孙子楼’，就是‘北京新建的高层居民楼当中，有些竟然被群众称之为“鬼楼”——黑夜不亮灯，长期锁着门……到派出所一查户口本，这些楼房的户主原来都是“祖国的花朵”……’我不能再抄下去了！我奉劝我平时所挚爱的‘祖国的花朵’长大了自己拒不住进这种‘鬼楼’，免得阴森的鬼气四面袭来，使花朵未开先萎，而且还会连‘根’烂掉！”

这番掷地有声、催人泪下的话语，竟是出自当时已年近九旬的老人之手！

冰心平生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泊。50年代初，他们放弃美国耶鲁大学的优厚待遇，举家奔回祖国，在狭窄的宿舍楼里一住就是34年。改革开放后，政府曾有意为她建造一座高级住宅，她谢绝了，至今仍住在普通楼房里。

冰心关怀灾区人民，并多方为提高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小学教员的待遇而呼吁。她自己一家人过着俭朴的生活，却先后把辛辛苦苦爬格子得来的稿费慷慨地捐献了好几万。

冰心咏海的散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海的母亲，在洪涛上轻轻的簸动这个大摇篮。几百个婴儿之中，我也许是个独醒者……”

恍惚间我仿佛觉得时光倒退到本世纪初。一个5岁的军装小囡囡，直勾勾地盯着烟台的茫茫大海出神。这个7个月就会喊妈妈和姐姐的超常智慧的小妞儿，也许是在幻想长大了也像爹爹似的当上个威武的军官，奋力抗击强敌吧。弹指间，小囡囡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女作家。自从1951年回到新生的共和国，她曾多次随代表团出访，足迹遍及印度、缅甸、瑞士、日本、埃及、意大利、苏联，更不用说在全国各地参观访问了。表面上看来她是够风光的，然而1957年以后，想到落难的老伴，想到被发配到大西北受熬煎的三弟，她的心情并不好过。及至“文革”10年，就更一言难尽了。

---

<sup>1</sup> 见《我请求》。

如今，冰心大姐年事已高，她理应安享晚年了。然而，她笔耕不辍。去年是甲午海战 100 周年，她为此题了辞：“不要忘记甲午海战！”她还一直惦着要写一篇纪念那场惊心动魄的海战的文章，但每次提起笔，总回想起那些英勇捐躯的海军将士，于是激动得热泪满面。

今年 4 月下旬，冰心老人在医院里听说萧乾和我已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开山之作”《尤利西斯》译成中文出版，就高兴地口授了一篇祝词，送到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全文如下：

《尤利西斯》是一部很不容易读懂的书。但萧乾在 85 岁体力比较弱时，和夫人文洁若协力把它翻译出来，这是一件有意义但又很不容易的事。只有不怕艰苦和具有顽强毅力的人才能完成。你们很会消磨时光，结果消磨出了一部《尤利西斯》。可喜可贺！

冰心 1995 年 4 月 19 日

当大会主席宣读素有“中国文坛祖母”之称的冰心老人派人送来的这篇祝词时，场上掌声雷动。毫无疑问，尽管这一年多一直住在医院里，这位老人无时无刻不关心着国际国内大事，尤其是文坛动态。

1992 年 12 月 24 日，当冰心研究会在福建省画院成立时，出任会长的巴金从上海发来贺电说：

冰心大姐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她写作了近一个世纪，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一代一代的青年，她以她的一生呕心沥血，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是中国知识界的良知。我敬重她的人品文品并以她为榜样。

被选为副会长之一的萧乾也从北京发来了贺电：

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向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的势力及腐朽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

两位老友的话概括了冰心大姐光辉灿烂的一生。

（原载《千花集》，《第 1 届 冰心文学奖 散文参赛文选》）

## 川端康成的《水月》和沈从文的《阿金》

川端康成（1899—1972）和沈从文（1903—1988）是同时代的作家。他们先后于20年代走上文坛，作品都以中短篇为主，又分别从本国文学中吸取了营养，直接间接地接受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成为风格独特的美文家。两个人的艺术境界极高的作品超越了对空，属于世界。川端康成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沈从文正作为“牛鬼蛇神”在故宫博物馆“被批斗，被罚打扫厕所”（甚至“打扫女厕所，以示侮辱”）。进入80年代，当他在海外的声誉越来越高时，他却遽然去世。瑞典皇家学院的汉学家马悦然教授说：“他的作品包括多种风格：他的很多乡情作品带有抒情的激情和富有象征意义的田园风格，这在同时代中国文学史中是绝无仅有的。”把他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也在悼念文章中写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

应当指出，川端康成与沈从文在20年代都曾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川端于1924年大学毕业后，与横光利一等人创办了新感觉派的同人刊物《文艺时代》。这个文学流派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法国的达达派以及构成派等的主张，追求新的表现方法，立意写出“新的感觉”。再加上川端对日本的千年古都京都的浓厚乡情以及对日本传统美的探索，遂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沈从文是20岁上从湘西苗区的荒僻小县只身来到北京的，在北大当上一名旁听生。通过译文，接触了西方各种文学流派。在作品中，他匠心独运，应用了这方面的文学技巧。1925年他在《用A字记下来的事》中提到过“潜意识”。他“现在承认在他的代表作乡土文学作品《边城》中，也有弗洛伊德的气味”。

这里要谈的是，川端康成和沈从文都写过以寡妇再嫁为题材的短篇，在处理的手法上既有相似处，也有迥然不同之处。

沈从文的《阿金》写于1928年。主人公黄牛寨的阿金是个23岁的苗族单身汉。这一天，他带上一笔丰厚聘礼，准备交给媒人，以便把耙耙寨的一个新寡娶回家来。那个小寡妇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儿，因而常有人散布一些糟踏她的谣言。地保生怕阿金把这么个风骚的女人娶到手后会吃亏，出于好心，就竭力拦阻。阿金三次往媒人家走，马上都被地保挡了回来。阿金无奈，心想只好等地保回家吃晚饭时再说。为了消磨时光，阿金就进了赌场，不料一下子竟把带在身上的那笔钱输个精光。几天后，地保听媒人说阿金出不起钱了，因而小寡妇就被一个远方绸商娶走了。地保曾经亲眼看见阿金抱兜里带的那一大束钞票，却不晓得后来他去赌输一事，还以为阿金是听信了自己的

---

刘北汜：《执拗的拓荒者》，见《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页。

刘一友：《沈从文现象》，见《长河不尽流》，第384页。

马悦然：《沈从文——独立的人格和骨气》，见《长河不尽流》，第291页。

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一位真诚、正直、勇敢、热情的长者》，见《长河不尽流》，第295页。

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劝告，才打消了结亲的念头呢。地保自以为做了一件很对得起朋友的事，就带上一大葫芦烧酒，走到黄牛寨去看望阿金，好为老朋友做事果断表示祝贺。故事就到此戛然而止。

沈从文曾经说他爱契诃夫。这位俄罗斯作家长于用同情的幽默笔调来强化作品的讽刺力量。他往往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截取片断，凭借精湛的艺术，通过细节，真实地刻画和描绘生活和人物，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中琢磨出作品的涵义。《阿金》这个戏谑性故事中的小人物的悲喜剧，确实也令人联想到契诃夫的风格。

自古以来，汉族社会总要求寡妇对亡故的丈夫守节。尤其是在农村，甚至 50 年代婚姻法公布后，世世代代的封建礼教依然把寡妇捆得喘不过气来。女作家戴厚英在 1982 年写的中篇小说《锁链，是柔软的……》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她（寡妇瑞霞）知道，娘婆二家，街坊邻闾，都瞪着眼看着她这个年轻的寡妇，看她能不能守到底。”丈夫死后，瑞霞纵然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男人，可是在封建桎梏下，也只得放弃再婚的机会，终身作宗族的殉葬品。沈从文笔下的苗族寡妇，其实在婆家也是没有地位的。阿金没娶上她，她却很快地就被一个远地的商人接走了，婆婆换到手的是能买六头水牛的钱币。

川端康成的《水月》写于 1953 年，时代背景是战后初期。故事以女主人公京子与她的两个丈夫的关系为主线。前夫代表的是灵，后夫则代表肉。前夫因体弱，连兵役都免除了。战争快结束时，应征去修了几天机场，从此就卧病不起。她在菜园子里干活时，便交给躺在楼上的丈夫一面镜子，以便让映在镜中的妻子的形影，给他以莫大的慰藉。大雨之后，病人还欣赏那映在水洼子里的月亮的倒影。这就点出了本篇的主题——“水中月”。小说通篇都笼罩着这样一种朦胧色彩——“影中影”。

京子比沈从文所写的湘西那个只因为长得美便无端地被邻里泼了一身污水的小寡妇要幸运多了。久病的前夫死后，在大叔子的劝说下，她改嫁给比她大 15 岁的后夫。这人和妻子离了婚，跟前有个男孩儿。他非常赞赏京子的形体，说她干净得像少女一样。京子与前夫之间，确实过的是严格的禁欲生活。尽管后夫对她体贴入微，然而她对亡夫却一往情深，思念不已。甚至在跟现在这个丈夫有了身孕后，竟还担心：“娃娃如果长得像你（指前夫），可怎么办哪？”

日本评论家鹤田欣也把京子的反常心情解释为：“实际上京子所怀的胎儿就是前夫的。当然，这仅仅是在京子心中演的戏，并不是从生理学上而言。”

《水月》和《阿金》共同点是：它们都从男人（丈夫或求婚者）的角度欣赏寡妇的形体美。例如新婚旅行的第一天，京子的第二个丈夫就摸摸她说：“你简直跟一个少女一样，怪可怜见儿的……”这话不是用讽刺口吻说的，却包含着意外的喜悦。第二个丈夫认为，曾经嫁过一次人的京子竟然还像一个少女，是求之不得的事。京子呢，一方面跟现在这个健康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却还不断地回忆着原先那个病弱的丈夫。于是“事后”她不由自主地说：“不一样。怎么这么不一样。”话音刚落，她便想：这话说得太造次，羞得无地自容。丈夫却似乎心满意足地说：“好像也没生娃娃。”第二个丈夫提

到京子出身的镇子的名字，又把她搂住：“俗话说，越后三条这个地方出美女，所以京子的身子才这么好看。”

沈从文笔下的阿金始终没见到他想娶的那漂亮的小寡妇，但是单凭着想象，他早已心花怒放了。小说中有这样一些段落：“阿金在乡场上，各处走动了一阵。今天苗族女人格外多。各处是年青的风仪，年青的声音，年青的气味。因此阿金更不能忘情粑粑寨那年青寡妇。粑粑寨这个年青女人是妖是神，比酒还使人沉醉，要不承认是不行的。这管事，打量讨进门的女人，就正是一寨中身体顶壮、肌肤顶白的一个女子！……说起这妇人，阿金管事就仿佛挨到了妇人的白肉，或亲着了妇人的脸，有说不出的兴奋快活。”“他预备的是用值得六只牯牛的银钱，换一个身体肥胖白蒙蒙的、年纪二十二岁的妇人”。

沈从文在《女难》中对自己所做的分析，似乎也同样适用于川端康成：“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物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另外一句话说来，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水月》和《阿金》的不同点是：前者的基调是“物哀”，后者则是淡泊。日本江户中期的国学者本居宣长（1730—1801）认为《源氏物语》这部1000年前（平安时代）的女官紫式部所写的长篇小说体现了“物哀”精神，也就是所谓“触物伤情”。《水月》的女主人公京子虽然与现在的丈夫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小至一面镜子，大至怀孕，她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那已故的丈夫，这也反映着一种“物哀”精神。沈从文则相反，分明是一个小人物弄得“人财两空”的故事，他却写得极其恬淡。《阿金》的结尾是典型的沈从文小说结尾，有着一种淡泊的惆怅情调。川端康成和沈从文各自代表了本国文化的深层底蕴，而他们运用同一题材（寡妇再嫁）的这两个短篇，分别以“物哀”（《水月》）和“恬淡”（《阿金》）为各自的特色。

最后，本文还想就日中这两位文学巨匠的一个共同点——对美的执着追求——做些探讨。川端一生都在作品中刻意追求日本独特的美的境界。他生长在大阪，距日本古都京都仅46公里。关西优美的自然风物培育了他对自然美的感受。他的代表作《古都》，描写了四时节庆，简直把这座千年历史名城人格化了，作品中充满了诗情画意。

沈从文生长在尚未被近代文明侵蚀的湘西苗区。自幼养成奔放不羁性格的少年沈从文，在离开故土之前，曾随军辗转于湘、川、黔三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接触了各种社会状况。他擅长描绘湘西风土。早在30年代，他就认为文学应该在更大范围内追求美。他在自传中着重渲染了“美”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他曾写道：“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1972年，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自杀身死，原因不明。这也算是一种“物哀”吧。沈从文也曾于1949年自杀未遂过，原因很清楚：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从文自传·女难》，见《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

《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见《沈从文散文选》，第10页。

“外界的强烈刺激导致精神迷乱”造成的。后来他从文艺转到文物研究方面。事实上，以 50 年代那样的政治气氛，他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下去的。直到 1961 年 7 月至 8 月初在青岛，或 8 月间回京后，他才写了《抽象的抒情》一文，措词迂回、转弯抹角地表达了自己的向往：“在某一历史情况下，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己的思想，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观念计划在支配一切，于是有时支配到不必要支配的方面，转而增加了些麻烦。控制益紧，不免生气转促。”（即使是在客观环境略微松动的当时的情况下，此文也未能发表。实际上，也并没写完，仅收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纪念集《长河不尽流》里。）

我之所以从川端康成联系到沈从文，最主要的还是他们二人都不像中国的茅盾或日本的岛崎藤村那样企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大时代。茅盾的《子夜》包含着 1930 年前后中国都市和部分农村的庞杂内容，气势宏大，再现了这一动荡时期的风云和人们的活动，是一部活的历史。岛崎藤村的《黎明之前》（1929—1935）则写了封建社会崩溃，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过程，涉及明治维新前后近 30 年的重大事件。可是沈从文和川端都着眼于男女间的悲欢离合，而且两位作家在描绘女性美这方面都不吝惜笔墨。这样的写法在 50 年代的中国，是不经见的，也是不被允许的。今天看来，不论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是契诃夫画廊中那些小人物，在文学史上都同样是不朽的。所以我认为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在作品中不追求大而博，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纤细而精致，却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愉悦。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 年第 1 期）

---

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见《长河不尽流》，第 353 页。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见《长河不尽流》第 7~9 页。

## 周作人与谷崎润一郎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周作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尽管1949年以后出版社还约他翻译古希腊作品和日本古典名著，并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知堂回想录》等著作和不少单篇文字问世，但生前始终未准许他在文前署上本名。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却保持了晚节。例如，侵华期间日本军部曾组织作家们到被占领的中国大陆，要他们写替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报道，谷崎却坚决予以抵制。

战后，谷崎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并曾在1957年2月号的《心》杂志上发表《欧阳予倩君的长诗》一文。欧阳予倩逝世后，谷崎又以《怀旧友欧阳予倩君》为题，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编印的月刊《日中文化交流》（1962年11月号）上发表谈话，谴责日本侵华以后“中日关系陷入了可悲的不幸状态，日本军阀作威作福，迫害中国人民”。并记起“我曾有机会到中国去，但我不愿受军阀利用，更不愿意看到军人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所以再也不曾去中国”。

周作人于1906年至1911年间留学日本，在日本现代作家中，他对比他小一岁的谷崎润一郎很是推崇。1935年6月15日，他在《冬天的蝇》一文中写道：“这几天读日本两个作家的随笔，觉得很有兴趣。一是谷崎润一郎的《摄阳随笔》……《阴翳礼赞》与《怀东京》都是百十页的长篇。却值得一气读完，随处遇见会心的话……”1936年8月8日，他又写道：“我写下这个题目，便想起谷崎润一郎在《摄阳随笔》里的那一篇《怀东京》来。已有了谷崎氏的那篇文章，别人实在只该搁笔……”

1936年元旦，周作人又在《宇宙风》第八期上发表《二十四年我的爱读书》，他开列的是：

- 一、永井荷风：《冬天的蝇》；
- 二、谷崎润一郎：《摄阳随笔》；
- 三、罗素：《闲散随笔》

以上三种均系散文集，1935年出版。

谷崎润一郎的汉学造诣很深。他曾在秋香塾攻汉文，十几岁时就能赋汉诗。1918年，他只身来我国东北、北京、天津、汉口、九江及江浙等地游历，返国后写《苏州纪行》、《秦淮之夜》、《西湖之月》等。1925年他又访华，在上海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作家结识，回国后写《上海交游记》。

周作人在1936年7月5日致梁实秋的信中畅谈日本文学，并将此函收在《瓜豆集》里。该书于1937年3月出版后，谷崎不久就读到了。他在《冷静与幽闲——周作人氏的印象》一文中，做了如下的评论：“关于日本文学，他（周作人）说：‘《源氏物语》54卷（周作人文中误作52卷，谷崎引用时已予以更正）成于10世纪时，中国正是宋太宗的时候，去长篇小说的发达还要差500年，而此大作已经出世，不可不说是—奇迹……这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红楼梦》，仿佛觉得以唐朝文化之丰富本应该产生这么的一种大



作，不知怎的这光荣却被藤原女士抢了过去了。’他又把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与明清的俗文学加以比较，称赞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和三马的《浮世澡堂》与《浮世理发馆》的独创性，确实说得上是最了解日本民族之长处的人。”

自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与周作人有过交往的原四中教员张铁铮在《周作人晚年遗事》（香港《大成》杂志第201期）一文中说，当时住在香港的鲍耀明（现已移居加拿大）曾为谷崎与周作人之间取得联系。1961年，谷崎的《疯癫老人日记》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转年5月出版单行本，立即销售一空。同年6月就印到第七版，被视为当年日本文坛上最轰动的一部作品。这部长篇小说着重描写一个77岁的老人虐待狂的变态心理。出书后，谷崎给周作人寄来一部豪华版。据张铁铮回忆，他曾在周作人八道湾的寓所里翻阅过这部装帧精美的书，“扉页有谷崎的签名，并写有周先生的上款”。周作人没有什么可回礼的，只好忍痛“拿出一枚刻有自己名字的铜印章，比一般略大，兽纽、雕镂之精是我（张铁铮）于铜章中所仅见”，并托在故宫工作的金禹民“磨去原字”，用小篆刻上“谷崎润一郎”五字，作为回赠。

谷崎于1965年7月30日上午在神奈川县县的寓所逝世，享年77岁。《朝日新闻》在当天的晚刊报道说：“谷崎晚年的作品《钥匙》和《疯癫老人日记》尤其表达了这位文豪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境界。谷崎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注意，曾数次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谷崎名副其实地是日本的瑰宝……他在海外享有盛名，《细雪》、《各有所好》等许多作品被译成各国文字……1964年他被推选为全美艺术院和美国文学艺术学会的名誉会员，有‘世界的谷崎’之称，获得很高评价。”

相形之下，周作人身后也没什么光彩。他译的《平家物语》于1984年出版了。当时我作为责任编辑，仍未敢恢复他的本名。转年《周作人年谱》问世，这才在1988年出版的《枕草子》（《日本古代随笔选》中的一篇）和1989年出版的《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上写上“周作人译”字样。连向以翔实可靠著称的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广辞苑》，在1986年10月6日刊行的第三版第四次印刷的版本上，也竟然还把周作人的卒年误为1966年。我也是直到今年春间为了写《周作人的晚年》一稿，才从周作人的遗族那里得知他去世的确切日期是“1967年5月6日”。随后，我已去函给岩波书店编辑部部长，建议他们再版时予以更正。

1990年9月18日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91年第1期）

## 老社长冯雪峰二三事

冯雪峰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21 年了。他在冷落与冤屈中溘然长逝后，我不断地读到怀念并描述他的文章，从而使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位德高望重的首任社长更加深了理解和尊敬。毫无疑问，未能活着看到自己重新恢复党籍的那一天，是他终身的恨事。而在他众多的遗憾中，那部两度化为灰烬的、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手稿，想必占着相当大的比重。

50 年代我曾在他手下工作过，“文革”期间我们又在“牛棚”里被关过十年之久，那以后还在湖北咸宁干校一道劳动了两年，也算是跟老社长共过一段患难。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 1951 年 3 月，当时在文化部旧楼借几间屋子办公。冯雪峰只身从上海来京，住在该楼的一间小屋里，筹划创社事宜。入秋后，简陋的三排筒子楼才竣工，我们遂搬进去办公。一天，身穿中山服、足登布鞋的冯社长走进了我们总编室整理科的办公室，满脸漾着慈祥的笑容，同科里刚从大学分来的男女助编们一一握手，亲切地问及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的质朴坦诚、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按规定，冯雪峰上下班应由出版社派汽车接送，可他一向搭公共汽车。夏季到了，总务科买了一台华生牌电扇送到他家。次日，他便雇了一辆三轮车，把电扇退了回来。

冯雪峰还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不但亲自抓鲁迅编辑室的业务，还要过问古典部、现代部、外文部的工作。1954 年后，刚直不阿的冯雪峰就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到批判，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一再挨整。他写的寓言被斥为“毒草”，他被牵涉进了“丁陈集团”，最终，一顶右派的大帽子压到了这位 1927 年入党，1934 年参加长征，1941 年被关进上饶集中营的老同志身上。

一连串的惩罚纷至沓来：他本人连降好几级还不算，他的子女也受到株连，或被赶到外地，或被调到基层。冯雪峰老两口也由原来的小独院搬进白米仓一座大杂院中勉强能容身的两间小屋。

冯雪峰一向律己甚严。解放初期，当领导的为自己的妻子及亲属安排工作的事相当普遍。冯雪峰的夫人何爱玉比他小 6 岁，高中毕业，30 年代以来协助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完全有资格调入社里工作。然而，冯雪峰只让夫人在编制外当一名不拿工资的秘书。

1952 年深秋，冯雪峰到外文局去看望萧乾，那是胡乔木派他去征求萧乾对回归文艺队伍的意见。萧乾对冯雪峰心仪已久，那次见面，感到他为人谦逊和蔼，胸怀磊落。几个月后，萧乾就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划创办《译文》杂志事宜。

冯雪峰戴上右派帽子后，降为一名普通编辑，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1961 年他被摘了右派帽子。

早在抗战期间，冯雪峰就根据亲身经历着手写以长征为主题的《卢代之死》了。前几年故去的老作家骆宾基就曾看到过《卢代之死》前半部的手稿，可惜抗战期间冯雪峰的老家被日寇纵火烧掉，手稿也化为灰烬。

全国解放后，他又在百忙之中硬挤出时间陆陆续续重写。写过一遍的东西，多少有个印象；进城后，资料也容易搜集。这样，到了 1957 年，全稿已

完成大半，他还拿给《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看过。

摘帽后，冯雪峰曾当面向那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过请创作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心愿：写完《卢代之死》。岂料碰了个大钉子。回答是，以你现在的政治身份，不适宜去写长征这样的革命题材（而冯雪峰是长征干部中硕果仅存的作家）。他受此打击，回家后万念俱灰，就将《卢代之死》手稿愤然投入炉中。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作家烧手稿的事例屡见不鲜。詹姆斯·乔伊斯就曾把《一个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的手稿投入壁炉中，幸而他的胞妹爱琳扑上去，把手稿从火焰中抢救出来。然而冯雪峰焚稿却有着沉重的政治背景。

那时冯家三代人挤在两间斗室里。家人眼睁睁看着火舌吞噬成百张手稿，谁也不敢劝阻。凝聚着冯雪峰多年心血的手稿就这么被付之一炬了。他的手稿第一次被焚毁是在战争年月，他还不到不惑之年，当时他尚有充足的信心重写。而在1961年他已年近花甲，是绝望之余把它烧毁的。

转年3月，他应邀列席政协会议。出版社这才把他的住房调整到北新桥的宿舍里，周扬还破例批准他享受几个月的创作假，以便写一部以太平天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出版社奉周扬之命拨专款2000元，让他到广西和湖南去实地考察过。然而，小说刚开了个头，就又奉命赴河南安阳参加“四清”了。

“文革”开始后，他又被关进了“牛棚”。有个时期，造反派顾不上管我们，我每天完成了指定的劳动后，便在桌上摆本《毛主席诗词》，一首首地背诵，倒觉得比较改译稿省眼睛。那时候我们中间最忙的是冯雪峰，成天有人向他外调，他片刻也不得清闲。

196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只留下少数人搞“样板戏”，其余的人全到咸宁五七干校，去围湖造田。早在1941年，冯雪峰被囚在上饶集中营的时候，就患上肺病，奄奄一息，幸而被营救出狱。1959年又患胃病，胃切除了五分之四。“老弱病残”四条，他都占全了。然而纯粹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67岁的冯雪峰也佝偻着腰，不由分说地被赶到干校。当时，最脏最累的活儿都摊到那些在“牛棚”里受过审查者的身上，动辄就是：“派几个右派。”冯雪峰出身于农民家庭，干活不惜力。这位奔七旬的老人往往被当成壮劳力使用。例如，有一次修桥，冯雪峰、萧乾和另一个右派被派去挑石头。雪峰挑得又多又快，萧乾比他小7岁，却不如他，第三位又是个文弱书生。下工时，领班把冯雪峰留下，叫另外两人自次日起，“不必再来了”。

由于冯雪峰劳动得格外出色，有一天军代表和连干部派他在四排“讲用”，还指定由我去奉陪。

自从1957年在文化部小礼堂听冯雪峰作大鸣大放的动员报告以来，已经多年没听见他当众讲话了。他用浓重的浙江义乌口音开腔了，但嗓音再也不像50年代作报告时那么洪亮、那么充满自信了。他没有一句自我表扬的话，只谈了谈尽管自己对党对人民犯下过严重错误，但依然有决心通过劳动来改造世界观，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冯雪峰讲毕，军代表绷着脸申斥他，说他自己所犯的错误的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端正。当时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军代表竟然把冯雪峰希望回到党的怀抱这一愿望看作不认罪的表现。用军代表的原话来说，这乃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实不论冯雪峰怎么讲，也过不了关，因为他还是摘帽右派，他的命运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那之后不久，在“拉练”中，冯雪峰又受到一次摧残。“拉练”本是部队练兵的做法，军代表把它搬到干校来了。不定哪天，半夜里突然吹号，要求这些大多数已年过半百的人，像棒小伙子那样，5分钟内穿好衣服，叠好被，紧急集合，然后沿着崎岖山路跑步行军。一天晚上，冯雪峰和萧乾都跌了跤，因而远远落在队伍后面。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么折腾！

1971年6月，冯雪峰随着一批老弱病残到了丹江。拉着大车去购买粮油肉菜的任务落在了他身上。亏得转年秋季修订《鲁迅全集》的工作上了马，冯雪峰被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才避免了像评论家侯金那样在干校驾辕时猝然倒地身死的命运。

1973年7月至1978年间，我们蛰居在东四北门楼胡同的8米“门洞”，那里离冯雪峰住处不远。1974年的一天，萧乾去看望老友孙用，孙用送给萧乾一包红艳艳的宁夏枸杞子，萧乾马上蹬自行车给冯雪峰送去一半。第二天，冯雪峰又步行到我家回访，并且还送了一包黄豆。可惜那阵子我“以社为家”，住在办公室里，无缘同这位老领导再见一面。1975年3月，冯雪峰就因肺癌在协和医院动了手术。大夫说是由于他体质过弱，又由于多年的劳累，再加上心情长期郁闷造成的。术后一个多月就被迫出院；及至发现癌细胞扩散，再住进医院，就已经回天无术了。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去世的消息传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个办公室，大家都十分哀伤。尽管“四人帮”下令不许念悼词，并规定参加追悼会不得超过200人，然而自发地前来参加悼念的还是突破了300人。2月16日召开的追悼会由胡愈之主持，茅盾、叶圣陶、宦乡和不少民主人士都参加了。及至冯雪峰的冤案正式平反后，又于1979年11月17日重新开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聊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冯雪峰。

1995年，当中共湖北省咸宁地委政策研究室的李城外向我们采访五七干校的情况时，我对他说：“当年在咸宁干校洒下汗水最多的，是中国文艺界唯一的长征干部冯雪峰，他已去世19年了，但是跟他一起劳动过的人有不少还健在。”我当即拨通了几个人的电话，替李城外联系了严文井、牛汀、陈早春等人，他都一个个地采访了。

如今，《雪峰文集》（共四卷，1981—1985），还有他的论文集、寓言集、诗集以及几部关于他的论著和研究资料（《雪峰评传》、《雪峰年谱》、《冯雪峰与中国现代文学》）已陆续出版，足以使后人了解这位曾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并代表中国共产党与鲁迅先生建立联系的杰出的老革命家毕生所做的贡献。

当冯雪峰带着太多的遗憾于20年前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反映长征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想必是他最为挂念的未竟事业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根据第一手资料而写的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竟由于政治成见而落空了。

1997年4月15日

附记：本文系把《人物》（1996年4月号）上所载同名文章修改补充而成。

## 序《静静的听》

尽管海音大姐与我们相隔着一道海峡，但我们一见如故，而且相识以来一直亲如一家。如今，她命我在她的《静静的听》一书前面写几句话，我感到莫大荣幸。

这是大姐散文的又一结集，由五组文章组成。一组是她旅游日本留下的印象，其次是她对海峡两岸四位文坛耆宿的思念。第三组是怀念老北京之作。最后是散文诗《静静的听》，及《读与写》（附录）等。海音大姐的京味儿名著《城南旧事》问世后，有位名叫林海的台湾青年作曲家深深为原作所打动，就把自己的心声谱成曲子，题名《静静的听》。海音大姐听了此曲，十分喜欢，就为它配了一首散文诗。如今，还用这曲名作为她这本新散文集的题名，也可以说是文艺界的一份不经见的缘分吧。

由于我小时在东京读过两年书，半个世纪后又曾旧地重游，我对海音大姐笔下的日本，倍感亲切。作者是应日本“老舍研究会”之邀，到风光明媚、遍布名胜古迹的关西地方去做以“城墙、天桥、四合院”为题的讲演。在东京，她约好与在《城南旧事》里扮演英子的演员沈洁见面一叙。当年那位纯真的小演员，已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正在东京的东洋大学攻读法律。

1982年，这部电影曾在大陆各地上演，颇为轰动，有口皆碑。敢情，八个样板戏早已使大家倒了胃口，改革开放后，青黄不接之际，这部小说和根据它改编的同名影片使人耳目一新，仿佛是闷室里打开了一扇窗户。

“敬老四题”，除了其中最年轻的谢冰莹女士（今年也已90高龄），都是海音和萧乾共同的老友。冰心大姐住得离我们不远，一年总见好几次面，自不用说了。80年代以来，凌叔华老人同我们在北京和伦敦多次聚首，她溘然长逝后，我们都写了悼念文章。苏雪林老人是在台湾被誉为“国宝级大师”的文坛祖母，我们的相册上还贴着一张海音大姐和女儿祖丽在为她举行的祝寿庆典上同这位老寿星的彩色合影，背面写着：“萧乾、洁若两口子惠存，海音偕次女祖丽参加苏雪林先生百岁寿庆。1995年3月24日台南。”端坐在前面的苏雪林老人身穿紫红色锦缎上衣，与满头银发相辉映，目光炯炯，神态慈祥，十分硬朗。海音双手亲切地放在苏老的两肩上，喜气洋洋，像是满脸开了花。风华正茂的祖丽站在妈妈旁边，握着高背椅的扶手，朝气蓬勃。我想，正是在崇古敬老精神蔚然成风的台湾，人瑞苏雪林才活得这么硬朗。我们家里还珍藏着苏老题赠给萧乾的一本《苏雪林山水集》。印刷精美的画册，扉页上用遒劲挺拔的字迹写着：“萧乾先生晒正，苏雪林敬赠。1994年11月25日。”萧乾回忆说：30年代他在上海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曾经和苏老打过交道。我们祝愿苏老和冰心老人一样，健康地与我们一道步入21世纪。海音大姐笔下这四位各领风骚的老一辈女作家的素描，既是珍贵的史料，又是意味隽永的散文。

海音大姐写北京的“京味儿之篇”尤其吸引我。我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这座古城虽历尽沧桑，但城内布局多少世纪来保持完整。只是自50年代起，拆毁得过了些。梁思成曾致力于保护敌国日本关西的古都京都、奈良免遭美军的轰炸，却未能保住祖国的文化古都北京。他对北京城真是比对自己的生命爱得还要深，然而面对严酷的现实，他徒唤奈何。对此地的城墙、牌楼、三座门等历史悠久的文物群所进行的无情的破坏，宛若一斧斧地砍在

这位爱国的建筑学大师心上，他受到摧残，过早地撒手人寰。

詹姆斯·乔伊斯 22 岁就离开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都柏林，然而他毕生只写以故土为背景的作品。有人说，倘若都柏林市从地球上消失了，仍能根据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来重建这座城市。海音大姐的“京味儿之篇”和乔伊斯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海音远离自己在那里度过二十几个春秋的故土，怀着深切的思乡之情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古老北京城的民俗画和风景图，倾尽作者对往昔岁月的眷恋和缅怀之真情，娓娓道出一个个有着浓郁民族色彩的故事。据说爱尔兰人注意保存古迹，近一个世纪来，都柏林的变化不大。我们的北京城可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要想重温一下这座文化古都的风貌，还真得读读《城南旧事》和“京味儿之篇”这样的作品呢！

1979 年 8 月以来，萧乾马不停蹄地出国 11 次。最后一次是 1988 年 9 月初，赴韩国汉城参加国际笔会。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得以结识海音大姐。1990 年 5 月，海音大姐光临舍下，接着，在她所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们见到了留在大陆的她的妹妹林燕珠，以及她的先生夏承楹的众多亲属和朋友。以后，海音大姐和夏先生又带着子女于 1992 年 5 月来京，参加萧乾文学生涯 60 年展览。最令人感动的是，转年 11 月，海音大姐又从医院里请假出来，带着病专程来京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文彩阁主办的《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首发式，其中有海音的大作《金鲤鱼的百裥裙》。不消说，我们每次见面，彼此都加深了了解。海峡是隔不断我们这份深厚情谊的。

附记：本文写于 1996 年 1 月 27 日（萧乾 86 寿辰）。《静静的听》于同年 6 月由台北雅出版社出版。

## 女权还是人权。

### ——华严小说读后感

当代台湾文坛上，女作家辈出，各领风骚，其中，华严是60年代初崛起的一位著名的长篇小说家。多年来，她执著地以关系到妇女命运的爱情与婚姻这一题材，从不同角度，写出不少艺术水平较高的力作。

1969年，一位土耳其留学生（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康百世）对台湾六所大专院校做了一次调查，征询他们最喜爱的当代台湾小说家。他一共发出1万多封信，收到了8000多封回信，统统推崇华严。近几十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经济起飞，台湾青年所面临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也愈益错综复杂。华严之所以赢得这么多读者的赞许，除技巧和语言，以及故事引人入胜之外，还有她的作品中所蕴含的哲理思考。

近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将较有系统地向大陆读者介绍华严的作品，其中，《智慧的灯》、《神仙眷属》、《明月几时圆》、《秋的变奏》已在排印中，这无疑会给我们读书界吹来一股新风。不论是认识今日台湾社会，还是借鉴艺术表现手法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华严原名严停云，福建闽侯人，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父亲严叔夏曾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母亲林慕兰是台湾望族——板桥林家花园主人林本源的女儿。华严于1948年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她原准备在大陆工作，只是在前往台湾看望母亲时，滞留下来。她是位孝女，至今，不论多忙，每天都必抽出时间来陪伴这位将届百岁高龄的母亲。

华严天资聪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她有一副好嗓子，小时音乐老师曾鼓励她学声乐。她也喜欢演戏，与名导演费穆的女儿曾是同窗，课余常演话剧。当年还大受费导演的激赏。她的小说对话生动俏皮，可能和那段舞台经验是分不开的。在大学里她先学的是化学，第二年转入外文系。一学期后，又转入中文系。

华严一度从事教育，与叶明勋（曾任台湾中央通讯社社长、至今仍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结婚后，遂辞去教职，专事抚育三子一女。1959年，当最小的女儿3岁时，她以母校圣约翰大学为背景，写了以一对纯真可爱的少年少女的恋爱悲剧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智慧的灯》，一举成名。作者在后记中谈到，女主人公凌净华是“把握住一个和自己相当接近的性格”而塑造的人物。难怪她母亲读完此书的原稿后曾说：“这里面凌净华的性格、脾气和爱好，还不就和你的差不多吗？”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曾说过：“爱玛就是我。”在华严的《明月几时圆》的女主人公万朵红、《神仙眷属》的女主人公华闭月、《秋的变奏》的女主人公唐羽思身上，我们也依稀可以瞥见作者的影子，然而正如黛玉和晴雯的气质虽相近却又是个性鲜明的不同的人一样，华严的人物画廊里的众多形象也没有雷同的。

为《智慧的灯》写序的言曦先生认为此作以“其性灵挥洒之美，殆上与《傲慢与偏见》、《简爱》相接”。华严与19世纪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及夏洛特·勃朗特一样，对她笔下的那些中等阶级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社会心理是十分熟悉的。她的社交圈子并不宽，但却以女性那特有的敏锐和细腻

刻画描绘了日常生活中的风波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傲慢与偏见》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消除了对达西的误解与偏见，达西则克服了傲慢，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简·爱》中的男女主人公经过不少周折结縻之后，生活也很美满。不过，同样是以爱情与婚姻为主题，华严的《明月几时圆》和《神仙眷属》，问题却出在婚后。《明月几时圆》的女主人公万朵红不能原谅丈夫向宇歌竟背着她在婚前与另一个女人养了个私孩子——尤其那又是个儿子，而她本人只生了个女儿。但是为了满足丈夫续香火的愿望，她一度把那个名叫雨安的孩子接回家来。不论公公婆婆还是娘家父母，简直都被聪明、英俊、又善于体贴人意的雨安迷住了，万朵红和她女儿都不免有被冷落的感觉。向宇歌只得忍痛把儿子过继给一对只生了四个女儿的夫妇。最终解决矛盾的是妹妹万朵丽的横死：她插到一对夫妇当中，做了第三者。当意中人撇下她，又去和原来的妻儿团聚时，她在万念俱灰中，死于一次车祸。万朵红也险些陪着妹妹丧命。死里逃生后，她在巨大的精神震动下，主动把雨安接回自己家来。

《神仙眷属》的写法既别致又富于风趣，作品自始至终都由老太婆华闭月和老太爷李德吾两个人的对话组成。他们结婚已30个寒暑，膝下两个女儿婚后均在海外定居。岂料这时老夫妻（华闭月已56岁）竟然发生了婚变：老太爷移情于一位下属的年轻风流的妻子夏念香，并相信夏的第三个儿子是跟他所生的。夏孀居后，他搬去与她同居，并把一笔财产过户到那孩子名下。最离奇的是，他又不断打电话给老妻，问寒问暖，甚至把自己和那位小寡妇一道生活的情况也一一汇报给她听。作者灵巧地利用李德吾的一双旧鞋来象征这畸形的关系。就在老太爷与小寡妇同居时，还在电话中向老妻问起丢在家的那双变了形的鞋。他抱怨新鞋穿在脚上箍得慌，只有那双随着他的脚形变了样的软鞋才可脚。李德吾终于和那位风骚的小寡妇（她另有了外遇）闹翻，回到老妻身边。小寡妇拿出证据说，那孩子根本不是她和李德吾之间所生，然而过户到孩子名下的那笔财产，她却当然绝不撒手。

在评选十大模范夫妇时，这对夫妇居然入选，并参加了表扬大会。这个回头的老浪子得出的结论是：“老妻是全世界唯一金不换的好东西，苦难来的时候只有她站在你身边……”

然而，倘若认为华闭月会本着三从四德的观念来原谅丈夫的一切，那就错了。她毕竟是20世纪后半叶的新女性。从表扬大会上回来后，她郑重地对丈夫宣布：“坦白告诉你，我一向都认为自己不妨做一两件什么事，使自己想起你的种种作为时，心中可以得到一份平衡，然后我可以如你所愿，和你一齐扮演一对众人眼中的‘神仙眷属’而不会想起来就有一份被人欺负得惨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好运气，我既得不到像你那么样的好机会，同时也一直没遇着一个我认为值得和他一齐做出一些什么‘壮举’的人。那不是贞节的观念使我止步，有关男女的关系，男人常爱给女人冠以贞节的美名，表面上是赞美和奖励，事实上是约束和歧视。如果人结婚后再和别人发生感情和关系是大逆不道的事，那么男人应该和女人同样地‘洁身自好’，而不是应该由女人片面地建造她们的贞节坊。”

她接着说：“我争的不是女权，争的是人权。世界上不论什么等色的人都应该平等，以生命是平等的道理来讲，世界上不应该有特权阶级；不应该某种人可以做的事，某种人却不可以做；不应该有种人生下来不管怎么样便是第一等人，有种人生下来却已经注定只属第二等。”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阐述了自己对婚姻的如下看法：“世界上的配偶中，极相配的很少，但是极不相配的也不太多。”她认为绝大多数夫妻都是通过摩擦，慢慢地去适应对方，从而达成妥协的。

华严认为，写小说的目的不是讲故事，而是传达对人生的看法和人生的道理。在《智慧的灯》中，老祖母不断地向刚进大学的凌净华灌输待人处世要宽厚的原则。在老祖母的熏陶下，净华敢于在宗教课上就耶稣是否为唯一的真主宰的问题与洋牧师展开了一场辩论。她说：“我们可以称他（指宇宙的真主宰）为耶稣，也可以称为释迦牟尼，也可以称为穆罕默德……我觉得所有的宗教都是人生海上的救生艇，引导人类向善、向上……地球上各种不同的宗教……你相信基督教，他相信天主教，我相信佛教；各凭不同的思想和感受，分别地接受着最适合自己的宗教。如果人类不明了这一点而寻求真、善、美，却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你排斥我、我讥笑你的斗争中，这必定远非他所崇奉的真神的本意，也忽略了宗教的意义了。”

用华严自己的话来说，多年来她都是在不断地“求变，求创，但是很艰苦”。《秋的变奏》是她的第17部长篇小说。作者把一些重要的情节埋作伏笔，形成一股悬念的暗流，迷离扑朔，紧紧地攫住读者。故事轮廓到最后才豁然明朗：原来给林雪意瞧病的雷予靖大夫正是她寻求多年的那个婚前所生的长子。可是她在顺境中生下的次子，却被环境惯成个花花公子，生活浪荡，终于死于意外事故。

华严的作品里，不难找到一些荡妇型的女子：如陈元珍（《智慧的灯》）、简若仙（《秋的变奏》）、夏念香（《神仙眷属》），作者着力于揭露她们的丑态，并加以鞭挞。华严对欧美社会风行的“性自由”深恶痛绝。她曾问过两位美国教授，那些渲染性感的电影究竟好处何在，对方答以“为了自由”。华严指出：“过分的自由使自由失去了意义。”华严不愧为东方的女性。她主张写男女间的感情，应当含蓄，挚情应该是意会而不必言传，对心与心的交融作露骨的描写反而落俗。

然而在写作题材方面，华严并不保守。她认为只要是人生社会共同的问题，都值得去写，关键在于如何去表现。

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华严不相信写作要靠灵感。她说：“灵感，不是坐待天降，而是一连串的摸索碰壁之后，走出来的坦途。”

在接受台北《民生报》记者宋晶宜的采访时，华严曾这样表达自己对人生、对创作的看法：“好的小说是让人了解故事背后蕴涵的哲理，而且能引起共鸣。

“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有种本事，就是看人生要看全面，要看深，看远，而不是只是目前的这一点。……”

“小说要引人走向精神文明，不是相互嫉妒，相互残杀。人如果能站在人类之外看人类，就可以更清楚一些。看看英国王子的婚礼，但是同时在世界另一角落还有印度的大饥荒。”

在30年的写作生涯中，华严已有将近20部长篇小说问世。其中《智慧的灯》、《生命的乐章》、《玻璃屋里的人》已出版了英译本。这些著作使她闻名遐迩。她历任中山学术基金会审议委员、台湾文艺基金管理委员会评审委员、台湾文建会文艺委员会委员等职。她曾应邀访问过澳洲，并于1964

年出席在泰国举行的第二届亚洲作家会议。1981年，世界艺术文化学院颁授她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4年参加东京国际笔会。1986年，荣获国家文艺奖中的小说创作奖，并担任金钟奖颁奖人。

在写作态度上，华严一向是严肃认真的。她反对“长篇小说是短篇小说加上水分”的谬论。她认为长篇小说一定要比短篇小说更精简，更言之有物，每一段每一句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下笔，方能扣人心弦。若只是在原来的汤汁中兑上水，写出的势必是不像样的东西。因此，她的每一部作品的构思都是谨严的，文笔是考究的，并总留有余韵。她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摘取断层，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显示其内心和动机，以表现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观察体会。

《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在《剪影话文坛》一文中，曾指出华严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一直在探寻自己的新路子，写作很专心”，能“突破自己以往的文体”。以她的成名作《智慧的灯》来说，她花了整整三个年头，六易其稿，才让它与读者见面。

做任何事，都需要负责的精神，写小说，当然也不能例外。华严这种对写作坚韧不拔、刻苦钻研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称许和学习的。

1990年10月7日

（原载《海峡》，1991年第2期）

## 澜沧江畔一对菩提树 ——黄豆米和她的丈夫

说来也真巧：3月间，萧乾正准备陪中央文史馆五位画家前往阔别经年的云南时，《工人日报》总编室主任王小龙来访说，他刚从昆明出差归来，那里有位女作家黄豆米，新近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山红谷黑》，想请萧乾写个序。萧乾很怕写序。正犹豫时，小龙早已从挎包里掏出一本《边疆文学》，印在红底白字的封面上的第一篇《伟哉！滇缅公路》，顿时就将他拉回到半个多世纪前。

1939年他曾以《大公报》记者身份沿着正在修筑中的滇缅路采访了三个多月，历尽艰辛，写出《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一系列报告。黄豆米在信中说，她正是在此文的启发下，才沿滇缅路往返奔走了67天，行程2000多里，走完新的昆畹公路，又走完了已“退隐”的老路，寻找当年那些修筑、保卫过此路，至今还留在此路上的无名英雄的。她在这篇报告文学中，还引用了《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中的一段话：“有一天你旅行也许经过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橘子和糖果，你对美景吭歌，你可别忘记听听车轮下面咯吱吱的声响，那是为这条路捐躯者的白骨……”

于是，萧乾爽快地答应下来了。在飞滇之前，他把在《伟哉！滇缅公路》的基础上写成的《山红谷黑》的原稿30万字，从中国工人出版社要了来，通读一遍，并将序言写好了。

动身的前夕，我正忙着打点行李，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一个清脆的年轻女性的声音传入耳际：

“喂，我是昆明……”

我打断了她，说：

“你是黄豆米吧？”

“噢，你怎么知道？”

“不但知道，连你的大作我也在跟着拜读哪。序言已写好初稿。明天就带去。”

这时，萧乾正在住所另一间屋里看电视。

20日我们飞抵昆明，住在有“睡美人”之称的西山半山腰。吃罢晚饭，正从设在另一栋平房中的饭厅走向客房所在的主楼时，只见一辆米黄色小汽车正沿着坡道缓缓倒车。原来黄豆米和她丈夫何金武已坐候在大厅中了。我们把这对年轻夫妇让进了客房。黄豆米穿着粉红色连衣裙，腰扎宽宽的黑皮带，越发衬出身材苗条。未烫过的长发松松地束在脑后。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脑门宽，目光炯炯，神情欢快，充满机智。何金武是棕色脸膛，头发浓密乌黑，谈吐干脆，笑声响亮，显得颇有魄力。

这半个多月来，除了同行的几位，黄豆米和她的丈夫要算是我们接触得最频繁的朋友了。这对伉俪使我联想到挺立在澜沧江畔的两株枝叶茂密的菩提树。

黄豆米原籍云南省易门县。她父亲从小是个孤儿，是一位比他大十多岁的姐姐把他拉扯大的，将他带到昆明落脚。至今这位姑妈还备受黄豆米一家人的爱戴。对黄豆米影响最大的是她的外婆。她姓萧，是黑井镇人。那是恐龙的故乡、腊玛古猿产地禄丰的一个小镇，自古产盐。外公是做小生意的，

当黄豆米的妈妈两岁时，他死于旅次中。外婆那年才 21 岁，上有老母，膝下还拖着两个娃娃，全靠做女红（绣花、纳鞋底）来养活这四口之家。女儿长大后，跟一个从外地来的剃头匠的徒弟一见钟情。她不顾寡母的反反对，与他结了婚，并在昆明安了家。解放后，她当上一名女工，丈夫也参加了工作，成为一位干部。但因生活条件艰苦，接连生了两个娃娃都夭折了。生于 1957 年的黄豆米是第三胎。

外婆不忍心让女儿的孩子生一个死一个。她闻讯后把黑井镇的老房子处理掉，换得一点盘川，背着小包袱，徒步走了一个多月（她是小脚），赶到昆明来照料小外孙女。所以黄豆米认为自己之所以活下来，是由于哥哥姐姐用生命为她铺下了路。外婆不但把黄豆米和她弟弟拉扯大，还当了二十几年的居委会委员，负责照料五保户，这一带的老弱病残无不受到外婆体贴入微的关怀。至今众多老人只要路途相遇，都必向黄豆米诉说外婆生前所做种种好事。黄豆米不禁为九泉之下的外婆感到骄傲：人死后多年，还不断有人挂念，也不枉活了一世。

高中毕业后，黄豆米进了一家建筑公司。她被分配到离昆明最远的一个工区——宣威。站在宿舍后身的山坡上，“走泥丸”般的乌蒙山峦尽收眼底。一年四季，又大又密的云朵总是低垂在宿舍的屋顶上。傍晚下工后，她喜欢独自躺在坡顶上欣赏云彩。那是她练习写作的开始。

1982 年，她考上云南大学函大汉语专业，1985 年毕业后调到昆明的一家小工厂，重操办小报的旧业。这个时期，她在爱情的海洋中折腾来折腾去，给自己平添了不少烦恼。

黄豆米自称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她一直坚信，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能够为之赴汤蹈火的男子汉。关于这位“白马王子”，她没有具体的想法，只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论在精神境界还是学识方面，“他”都必须胜她一筹。本着这一信念，她屡次谈恋爱，不管在感情上陷得多深，最后都告吹了。

1988 年的一天，为了把小报办得生动活泼一些，她向厂领导提出到兄弟厂矿去取经的要求。她把采访心得写成一份总结，并送到《云南日报》理论部。那里的编辑劝她改投北京的《工人日报》。这样，她就来到与《云南日报》毗邻的北京《工人日报》驻云南记者站。接待她的正是该站负责人何金武。

何金武是在昆明相当有名气的记者。黄豆米还在云大就读期间，这位资深记者就曾前往讲课。黄豆米的同学们听过他的课，她却没去，所以他们二人这还是初次相见。

黄豆米的那篇“办厂报总结”，终于还是没能刊出，但以此为契机，她却与何金武迅速地接近起来。当时何金武在新闻界已工作了 30 年，黄豆米完全是抱着拜师的目的和这位老记者交往的。

何金武的身世凄苦。他的祖父是滇中人，读过私塾。因家乡闹旱灾，只身逃荒到中缅边境镇康的一座小镇——德党镇。那是滇缅路上的一个驿站，佤、傣、汉族杂居的山寨。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办起私塾，教了几年书。他为人质朴，被当地一大户人家看中，把闺女嫁给了他。他还做过文牒（即文书），陆陆续续添置了不少亩地，共生五个儿子，金武爹是老五。祖父死后分了家，金武爹分到了几十亩地。他们住在原始森林旁的山坡上，金武呱呱落地后才几个月，父亲就患疟疾而死。当时缺医少药，不出一年，金武妈也因病去世。丢下七个孩子，最大的也才十三四岁。金武家有个佤族长工，

在他家已干了七八年。他有个汉化的名字：杨老大。他发现，一岁多的金武哪里晓得妈妈已咽了气，还趴在她怀里讨奶吃呢。侠义心肠的杨老大决定留下来，支撑起主人家的门面。那时杨老大已丧妻，他把自己唯一的女儿春果寄养在亲戚家。金武的父母留下的田产被人侵吞。只给孩子们零零星星撒下点不毛之地。勤劳憨厚的杨老大起早贪黑地上山砍柴并垦荒，养活这一大群孩子。五个女孩儿勉强到了能结婚的年龄，便一个接一个地嫁到缅甸去了。金武的一个哥哥则在家里干些杂活儿。金武记得，他六七岁时，养父终于把春果姐接回来了，养父省吃俭用，送金武到小学读书，却没叫春果去读。金武不解，问养父（当时他还以为那是他亲爹呢）为啥不叫姐姐上学。回答说：“你是男孩子，这家要靠你读好书，改换门庭。”到了1948年，国民党要抓养父的丁，他便带着儿女们，跑到缅甸投奔金武的大姐大姐夫去了。当时金武才10岁。

1950年云南解放了，养父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乡，分了土地。那时师资极缺，金武因学习成绩优异，初三刚念了一学期，就被挑选到大山沟里去教书。1954年他就当上了六年制小学的校长，还附设一所农业中学。学校没有经费，他和老师们便带着学生开荒，逐渐扩充起来。起初只有7个学生，不出几年就发展到500名，老师也有了13位。由于办学成绩显著，县里看中了他，将他调到县委去做工会工作。这期间，他抓紧时间把高中的功课补完。1958年，镇康县的妇联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先进集体，由金武写成书面材料，上报到国务院。县妇联派代表到北京去领回周总理亲自颁发的奖状和国务院赠送的锦旗。在本县，这自然是一件大事。《云南日报》看中了金武，便把他调去当记者。1981年转调到《工人日报》驻云南记者站。

何金武对佤族养父怀着比血缘关系还深的感情，他同其他少数民族相处，也是如鱼得水，亲密无间。他会讲佤族话和傣族话，善于在少数民族当中开展工作。各种荣誉纷至沓来，远的不说，1990年他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1991年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金武与黄豆米结识后，曾以采访退休老人为名到她家去拜访。她的父母之朴实，弟弟的纯洁好学，给了他很深的印象，觉得不但能和她本人，也能与她的家人和睦相处，于是自然而然地就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情。黄豆米也意识到，她终于遇见了能够与之白头偕老的人。

尽管已过了而立之年，原先黄豆米只在翠湖、滇池一带转。其间也曾乘半天的火车到过乌蒙山，但那半年，除了厂房就是宿舍，活动范围极其狭窄。和金武结缡后，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何金武的建议下，他们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蜜月旅行。他们动身前往西双版纳自治州首府允景洪，找到了老友老周。老周想要在城郊曼景兰旅村订几桌傣族风味的酒席，为这对新人庆贺一番。他们说：正是为了逃避城市里的俗套才来这里的。他们要求老周领他们到原始一点的地方去拜天地。

于是，次日一早，老周便伴随这对新人搭上叶船长的小机船，沿着澜沧江航行100多里，傍晚驶抵距中缅边境只有一里多路处——澜沧江与罗梭江的汇合口。那是金三角的起点，傣人称它作南柯南巴葱。

船上只有米和酒。叶船长率领五六个年轻水手，一个猛子扎进江里，活捉了六对鱼。长胡子鱼、墨鱼、缅甸鱼、青鱼、鲫鱼和鲤鱼，刚好都是一公一母。黄豆米寻思：这大概是鱼儿谈情说爱的季节。大家在沙滩上燃起一堆

篝火，烤的烤，煮的煮，办起鱼宴。再加上从附近摘来的杜鹃花、耳朵叶子菜和水蕨菜，几道清香可口的凉拌菜便齐备了。酒足饭饱，祝贺的人们纷纷回船安歇，一对新人则入了大家七手八脚用芭蕉叶和野竹为他们搭起的“洞房”。

天明后，他们在相距不远的野竹林中发现了比牛粪还大的粪饼以及各种形状的野兽脚印。老周这才说，大象、马鹿、野牛，大多在夜间经过此地下江饮水。昨夜，他和船长又悄悄地下了船，通宵达旦地守护在沙滩上，以防众兽闯进那座芭蕉叶窝棚去“闹洞房”。下半夜果然瞧见三对闪闪发光的绿眼睛，是三只马鹿在这一带徘徊，所幸离得较远。

这是多么真挚深厚的友情！

当天，黄豆米坐在沙滩一块大石上，将散文《南柯南巴葱的婚礼》一气呵成。

黄豆米本名张丽萍，自1987年发表处女作《梦绕镜泊湖》以来，曾署名张若冰。她刚好与作家张恨水同姓，且又喜爱冰心老人的作品，这便是这一笔名的来历。写完《南柯南巴葱的婚礼》，当她照例要署上“张若冰”这个笔名时，新郎何金武说：“不要老跟在名人后面跑，你应该闯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今后你就叫黄豆米吧。”

金武接着解释说，黄豆看上去不起眼，然而它浑身是宝，能制出各种营养价值十分高的食品，还能炼油。她和她一家人都使他联想到朴实无华的黄豆。

《南柯南巴葱的婚礼》一文最早发表在《西双版纳报》（1989年5月12日）上，后又由《昆明日报》（1989年7月25日）转载。一位前来西双版纳旅游的台湾记者看中了它，带回去加上插图，刊载于台北的《中时晚报》（1990年5月27日）。黄豆米意犹未尽，又写了它的续篇，广州《清远报》把它连同正篇，分两期刊载（1992年1月22日、25日）。

此文在年轻读者当中不胫而走。热爱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的青年男女，简直不敢相信本乡本土也有如此神秘瑰丽的所在。其实，黄豆米所写的仅仅是头一天的经历。第二天，她就跟着丈夫上了山，在傣族的竹笆房里一住就是半个月。接着又下了山，跟傣族生活在一起，参加了傣历六月的泼水节。黄豆米还裹上傣族的淡蓝色筒裙，出水芙蓉般立在温泉小溪里拍了一张照。旁边是两个人才围抱得过来的菩提树（当地叫大青树）。绿叶婆娑，雾气濛濛，光线幽暗，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这张照片刊在对外宣传本省风光的《云南旅游画报》上，广为流传。那一次，她还参加了一场斗鸡。由于傣族妇女向来不斗鸡，她便受到在场的中外尤其是港澳台记者的瞩目。她那只鸡获得了冠军，记者们便把她围起来，又是摄影，又是采访。记者们连珠炮般地问她这只鸡是怎样饲养和训练的，她便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对答如流，谁也不曾怀疑她不是傣族妇女。当然，功劳应归于鸡的主人，所以还鸡的时候，她把奖金50元也交给了那位傣族同胞。

黄豆米和何金武是很般配的一对。他们有许多共同点，首先是对事业都有执著的追求。婚后，何金武凭着自己丰富的经验，从各方面对年轻的妻子给予了帮助。

结识金武前，黄豆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已发表了十来篇散文、诗、评论、杂感。组织起小家庭后，经金武建议，她索性辞去工作，专心致志地从事创作。她开始立足于较高的精神层面上审视人生，在现实和历史中捕捉艺

术的对象。由于她对人类的生存、命运、人生不断地关注和探索，她的作品就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伟哉！滇缅公路》问世后，引起了社会反响。云南省公路局为该文召开了讨论会，《春城晚报》、《昆明日报》等纷纷撰文评介赞赏。《文艺报》也刊出王玮所写“走向深邃——评黄豆米的《伟哉！滇缅公路》”（1991年3月30日）一文，指出：

作品讲述的是一个遥远的几乎已被人遗忘的故事，而且并没有炫人眼目的惊人之语，但作品却自有动人之处。它的独特的魅力在于作者是以情感来把握作品并感染读者，从中我们或许可以体会到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更加深邃的新的境界。……黄豆米在展示人物情感世界，创造作品的情感力量方面做出的努力不是没有价值的。

今年5月下旬，黄豆米的《伟哉！滇缅公路》又荣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励基金会颁发的“首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三等奖。6月2日，我们在黄豆米家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这位年轻女作家在颁奖大会上上台领奖的场面，并由衷地向她表示祝贺。我们访滇期间，黄豆米还曾陪着萧乾到已经现代化了的滇缅路（现名昆畹路）去拍照留念。

云南省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有24个少数民族在此繁衍生息。黄豆米扎根于这块美丽富饶的神奇宝地。她的作品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这位才华横溢、异常勤奋的年轻女作家，必然会做出惊人的成就。

1992年6月5日  
于昆明西山滇池之畔

附记：本文原题《黄豆米和她的丈夫》（《人物》1993年第2期），这次收入集子，做了删节修改。

## 一代宗师姚茫父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时，鲁迅先生曾愤而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第五节、《死地》、《可参与可笑》、《纪念刘和珍君》等四篇文章。著名书法篆刻家姚华（茫父）先生当时虽早已离开女师大，面对杨荫榆助虐军阀段祺瑞所制造的这一暴行，也义愤填膺，挥毫写下《二月六日雪》诗一首：“留得一冬雪，春来两度看。为因埋战血，较觉作花寒。未霁仍将积，施消若已残。不成惠连赋，愁思动长安。”同时又作《二女士》诗，献给死难的女师大同学刘和珍、杨德群两位烈士：“宣和不闻陈东死，南渡胡为死东市？千年夷夏祸犹存，碧死又渍绿窗史！呜呼，刘（和珍）、杨（德群）二女士！”他这些慷慨激昂的诗词，不屈于军阀的铮铮傲骨，与以鲁迅为首的进步人士的哀悼声一致，十分难能可贵。

1933年鲁迅出版《北平笈谱》时，曾在致郑振铎信中写道：“后者先则有光绪间之李毓如，伯禾，锡玲，李伯霖，宣统末之林琴南，但大盛则在民国四五年后之师曾，茫父……时代。”注中介绍说：“茫父，即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筑人，清朝光绪时进士，书画家。”这位有气节的现代文化名人是我的姻亲。最近茫老的孙女姚伊和孙女婿邓见宽来信说“1996年岁逢两子，是姚华先生诞辰120周年，贵阳文化界将举行学术性活动，以资纪念”。改革开放后，活跃于本世纪最初30年代的文化名人姚华愈益受到重视，80年代陆续出版了《姚茫父书画集》、《姚茫父画论》、《书适》、《姚茫父纪念集》、《姚华评介》等。茫父在书画、文学及学术各方面的辉煌成就越来越广为人知。

刘海粟曾在《姚茫父书画集》序中写道，茫父“自奉甚俭，布衣蔽裘，蔬食薄酒，友人有难，慨然解囊。见一名拓，立掷千金”。聊聊数语，茫父的为人行止，跃然纸上。仅从他的年表看，1920年“黔灾甚重，画扇数百，售资助赈”。1923年“日本地震。售画数百件助赈，撰灾赋，作图记具事”。及至茫父因脑溢血疾复发，于1930年8月6日去世，遗族生活拮据。当年岁末各家店铺上门讨帐，遗孀罗氏藏于门后躲债，受惊而死。

萧乾很喜欢茫父的字画。1980年初，当邓见宽偕同我四表姐万玉卿的大儿子刘定一到我们家来拍摄姚茫父先生的书画时，我正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研究员和东洋大学客座教授在东京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他在家信中作为一件大事告诉了我。可惜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家所珍藏的四幅均未录入，只收了我弟弟文学朴家的《洞庭波伍兮木叶下》（1925）和《芝仙祝寿图》（1926），以及三表姐万德卿家的一幅《岁朝清供图》，那是茫父于1919年题赠给我大舅万勉之的。我大舅的专业虽然是农业，业余却酷爱绘画和书法，一度在北京艺专教工笔画。我们这一辈没有一个专门学画的，下一代却出现了好几个画家。四表姐的大儿子刘定一为国画家，二儿子建一为油画家，三儿子邦一为工艺美术家。定居美国的我大姐文馥若的二女儿频频开画展，她的油画为画廊所收藏。当大姐写信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没有忘记加上一句：“是二闺女的中國血统使她成长为画家的。”无独有偶，我们的小儿子萧桐赴美后，也成了油画家。当然，一个艺术家是多方面的因素造就成的，我无意夸大茫父那些书画对他们所起的作用。但是，至今出现在我梦境中的，总是我度过生命中最初26年的东北城小胡同里的那座四合院。墙上所挂字画清一色全是出自茫父之手。我由于从小看惯了茫父的书画，总希



望自己的孩子能对绘画发生兴趣。武汉画家陆扬在《萧桐和他的 剃头系列 》一文中指出，“萧桐多年来始终在致力于将中国的文化传统融入他的剃头系列”，他在自己的画里，“引入了汉字文化”。孩子刚懂事时，我们给他看的不是画得拙劣的小人书，而是茫父这样一些大师的精品，对孩子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茫父曾对徐志摩说，他之所以中风后还继续作画，是为了“吃饭”，“没法子”。但我个人认为，这固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却绝不是唯一的原因。茫父题赠给我父亲的两把扇子就是最好的例证。两扇分别作于1919年茫父过40岁生日以及1928年5月我父亲过35岁生日之际。后者是一幅《长夏江村图》，上款是：“戊辰五月莲花盒写意茫父残臂挥毫”，反面录了杜子美的三首五言诗，下款是：“访苏生日书此奉遗姚华”。两相比较，后者虽系“茫父残臂挥毫”，但书画均胜于前者。说明这位书画大师以无比顽强的意志克服病魔，他半身不遂后仍迸发的旺盛创造力，着实令人惊服。作书绘画已成了他的第二生命，只要一息尚存，他就放不下手中之笔。倘若纯粹是为了糊口，茫父就大可不必于1928年题赠给我父亲第二幅扇面了，因为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我相信，承蒙姚茫父先生惠赠残臂所作书画的，绝不只我父亲一个人。

尽管我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感情深厚，但至今每次填表，我都写上“原籍：贵州贵阳”。我的根毕竟是在西南高原的黔中。我尤其以家乡出了姚茫父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一代宗师而自豪。

（原载《银潮》，1996年第3期）

## 我喜欢的文学作品

是冰心的作品最早领我跨进新文学的门槛的。在那之前，四五岁上我就由姐姐口授，背会了几十首唐诗，但那只不过是鹦鹉学舌，除了“床前明月光”和“青草池塘处处蛙”这样的句子，我并不晓得背的是什么。

6岁时，一次偶然的机，我从姐姐的国文课本里读到了冰心的短篇小说《寂寞》，文中还附有精美的插图。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宛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时我已经上了孔德学校小学部一年级，平素也常翻看登着各年级学生优秀论文的《孔德校刊》，所以已认得不少字了。以后我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名著，但《寂寞》是第一篇使我受感染的作品，印象也就格外深。我反复读了好几遍，琢磨着作者的遣词造句，随着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主人公小小（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的原型就是冰心的三弟为楫）的感情变化，时喜时悲。

小学毕业后，我进圣心学校攻读英文。那时家道已中落，我知道学费来之不易，就刻苦用功，甚至步行上学的路上还背生字。就这样，17个月内我竟然就读完了四年的课程，能够从原文阅读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寓言体小说《瑞普·凡·温克尔》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了。这时，家里再也供不起我在这家学费昂贵的教会学校念书了。我就发奋补习中文，背会了《孔雀东南飞》、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以及韦庄的《秦妇吟》。还读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秋后，我进辅仁女中初三去当了一年旁听生，次年考入高中。

一位姓张的女教师教了我三年国语。在她的循循善诱下，我精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巴金的《家》、《春》、《秋》。我尤其喜欢《家》，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祖父统治下的我们那个大家庭。我出生时，他已去世11年，但我一直觉得他的阴魂不散。如果作者把高老太爷写成十恶不赦的罪人，这个形象倒苍白了。代表封建势力的高老太爷临死之前改弦更张，含着泪望望觉慧和觉民才咽气。作者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他本着纲常统治着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摧残着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还以为是在维护家法。其实他本人也是被礼教束缚着的傀儡。

在清华外语系读英语专业的那几年，我的恩师是温德和赵萝蕤二位教授。有一次，美国教授温德绘声绘色地讲起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来，足足讲了一节课。我虽然是1958年结识萧乾后才有机会初读这本意识流开山之作的，但上大学二年级（1947年）时，对书中主人公、都柏林的一个犹太裔广告经纪人布卢姆就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赵先生是燕京大学教授，在清华是客座，我上的是她的“文学批评”课。当时（1949年3月）她刚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执教。她风度翩翩，英语发音纯正流利。上她的课使我翱翔于知识的苍穹，探索人生的底蕴。尤其是她讲授英国诗人济慈的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使我大受启发。下课后，我追出去对她说：“在清华念了几年书，这是我上的最好的一堂课。”当天晚上我就到图书馆去，把查普曼所译的荷马史诗借来，认认真真读了几遍。

1954年和萧乾结婚后我才知道冰心、巴金和赵萝蕤（以及“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陈梦家）都是萧乾的老友。四十多年来，我多次有机会聆听他们的教诲。

90年代以来，我出版了一部纪实文学（《我与萧乾》），两部随笔、散文集子（《梦之谷奇遇》、《旅人的绿洲》）。《我与萧乾》着重写了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我认为，应该让年轻人了解那十年浩劫期间神州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免悲剧重演。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的《梦之谷奇遇》曾获1987年度“花地”佳作奖。在这篇散文中，我为一位早年参加革命，中年命途多舛，晚景凄凉的乡村女教师呼吁，曾引起社会上的重视，因而使她的住房也得到了改善。我喜欢有的放矢，从来不写粉饰太平的文章。

近来我不断地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和新创作。广西民族出版社推出的新人阙小兰的长篇小说《爱人》，反映了农村中至今仍存在的妇女受歧视等问题，发人深省。作者来自基层，她的作品散发着乡土气息。当然，更值得瞩目的还是竹林的《女巫》。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以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展开了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巫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浑然融为一体，而被严酷的社会现实逼成“女巫”的须二嫂走向大海这一结尾，暗示着人们不可知的命运，同时也巧妙地烘托出全书如梦如烟的迷离气氛。

新近刊载于《当代》，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单行本的《家族——你在高原》，更是张炜继《古船》之后完成的另一部力作。这里，作者大胆地做了新的探索，显示了他的笔底功力。整个作品像是长篇散文诗，又宛若一幅幅彩画连成的画卷。书末老宅被没收的描述最为震撼人心。这是写给那些关心民族的过去和未来的人看的，贯穿于全书的是一个大大的“爱”字。作者“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是淳厚的人性，这正是张炜永远也写不完的灵感泉源。

（原载《名作家与青少年谈写作》，湖南出版社1996年9月版）

## 萧乾的读书生活

萧乾总念叨自己读的书不多，其实，这并非谦词。他常对我说，小时半工半读，同学们在教室里上课，他却在织地毯或挤牛奶。下午才能上几节课，多半是音乐体操图画等无关紧要的功课。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跟上班的。他深知自己学无根底，所以写文章轻易不引经据典，只写自己想说的话。但他认为这个缺陷也有其有利的一面。例如他写《雁荡行》时，倘若曾熟读古代诗词游记，就大有可引的。然而他通篇只能写自己在奇山异水（例如散水岩）前的内心感受。

萧乾 16 岁上在北新书局学徒时，才真正用了点功。白天打包邮寄《语丝》或校对《兰生弟日记》，晚上借回几本书，在公寓里的微弱灯光下，如饥似渴地捧读。

1957 年后，萧乾曾对我喟叹说：要是他一直在织地毯多好！他后悔当上了读书人。有一天他去朝内大街修鞋，那位摆摊补鞋的师傅忽然喊了声：“哎呀，你不是乐子吗？多少年不见啦！”（尽管他是个遗父子，打从呱呱落地就成天乐呵呵的，从而他那位寡妇妈就给他取了“乐子”这么个小名儿）原来那是小时跟他坐在同一条板子上织过地毯的表弟，后来改行，做了修鞋匠。那位安师傅请他在东四一家酒楼吃了一顿，他也在家回请了一次。当时安师傅是东城区活学活用毛选的积极分子，十分风光。而萧乾则走到哪里都背着这口右派黑锅，他懊悔当初不该走读书这条路。他说，要是个文盲，不就成一张白纸了吗？那样，脑子也就空白了。

自然，这些都是当时的气话。

1961 年他从农场被调回北京，还不就是因为他是读书人，并懂得外语，才分配他到出版社，在编译所翻译有散文史诗之称的 18 世纪英国巨著：《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那是一部旁征博引、文字深奥的长篇小说。在翻译的同时，他着手写菲尔丁评传。于是一趟趟地跑图书馆，借阅无人问津的古老资料。看到他又兴致勃勃地忙了起来，我自是感到宽慰。

由于语种多，管理人员又不谙外语，出版社资料室的外文书库一向是开架的。萧乾进了书库，真是如鱼得水。他听说外文部正在出版一种《外国文学新作提要》（到“文革”前夕为止，共出了 11 期），只要看到合适的外国书籍，他便利用业余时间，主动写了好多篇提要，让我递交外文部主任。这位主任非但一篇也没刊用（说不定一古脑儿给丢进了废字纸篓），还把萧乾此举看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特地吩咐管理人员说：“萧乾作为尚未摘帽的右派（他是直到 1964 年 7 月才摘帽的），以后禁止他入书库，也不许他再借阅外文报刊。”当时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

1974 年，萧乾又同出版社的另外一些懂外文的“牛鬼蛇神”一道被编入出版局领导的一个翻译组，有个时期负责审读北京图书馆交换来的外国新书。每隔几天他必骑车去一趟北图。驮回成摞的新书。他能很快地就统统看完，还逐本写出数千字乃至上万字的内容提要，并做出值不值得翻译的评价。从而订下了《麦克米伦回忆录》、《1932—1972 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美国海军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选题。这些，他分别参加翻译或校订，在书荒的那些年月，销路都很好。

一晃儿 20 年过去了。

变化真大啊！如今他再也不愁没书看了。从全国各地，从新加坡、马来

西亚、台湾和英、美都经常有书寄来。然而，毕竟年岁不饶人，精力不逮了。有的精读，甚至写了评论，大部分他只能翻看一个时期，就送到现代文学馆了——那里藏有许多作者题赠他的书。

他对书的爱好很广泛。他小时在庙会里接触过各种曲艺，那是属于下里巴人的。最近中华书局的资深老编审冀勤送了他两卷自己校勘的《清车王府藏子弟书》，他视为珍宝，放在床头小书架上。他对相声尤其感兴趣，因为通过带有社会讽刺的幽默，可以了解到不少世态人情。另一方面，他最讨厌那种不痛不痒，只逗乐的相声，认为它们“失职”。他曾写试过讽刺文章（《红毛长谈》），而他译起《好兵帅克》、《里柯克幽默小品选》和《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来，也那么得心应手。从他早年就钻研过的乔伊斯、维吉尼亚·吴尔夫和亨利·杰姆斯等人的作品看，他更珍视“阳春白雪”的作品，认为这才是人类智慧的精华。

萧乾从不替人开书单。这主要当然是由于他自知书读得不多也不系统，没资格指点旁人。他偶尔提起一些不见经传的书，仿佛对他颇有影响。由于那些是我不熟悉的作家和作品，事后我也就淡忘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徐霞客游记》、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

我常听到他对来访的年轻人说，必须认真读古典作品，但下笔时要努力超过前人。

他认为读书人切忌急功好利。所以他最佩服乔伊斯的安贫。

萧乾精读某一本书时，爱折书角、画线、做记号，还经常做笔记。最典型的要算是那部奥德赛出版社1933年版的两卷本《尤利西斯》了。他不仅是熟读，简直是“虔读”（见他在该书内封上所做的题记）了。他在书中做了五种记号，并在内封上注明，那些用红蓝黑铅笔所做形状不同的记号，分别标志着“生字”、“待问”、“新用法”、“不知待查”、“不确定”。空白处写不下的，便密密匝匝记在纸上。夹在书中。真得感谢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资料室的同志们，当我于四年多前去借这部《尤利西斯》时，他们把这十张保存完好的笔记连同灰封面原著一道交给我了。

萧乾还有个习惯，喜在书上记载读时的情况。例如这个两卷本上卷的内封上就注明是“一九四一年初夏在剑桥开始读的，适值联军因比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战场”，并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巴黎失陷之次日读毕”。下卷则是“六月二十八日在北威尔士避难消暑时读完”的。

光阴荏苒，当初刚届而立之年的萧乾已成为80衰翁了，十几年前割掉左肾后，剩下的右肾功能也不全。然而当他重读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笔记后，又起劲了，就和我一道一鼓作气把这部“天书”译了出来。

为了写那篇长达两万字的《尤利西斯》中译本序，萧乾读了不下20本乔伊斯传记及《尤利西斯》评传；尤其是艾尔曼那部近900页的《詹姆斯·乔伊斯》，翻得都散了架。序言中容不下的部分，他正在零星发表。

近年来，外界不断地寄来一包包书，他简直有些招架不住了。然而不论多忙，他还是要认真真翻看的。80年代，当他陆陆续续收到长沙寄来的四套丛书（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杨德豫主编的《诗苑译林》，李全安主编的《散文译丛》，曹先捷主编的《世界著名学府》）时，随看随赞赏。进入90年代，看到出版社一切向钱看，文人下海成风，他有感而写了《长沙出版界四骑士》（见《读书》，1994年第9期）一文，赞扬80年代出版事业的真意无非是将90年代一军，看出版界能否坚持气节，让出版物放出异

彩。

任何人走进我们这四室一厅的套房，就会发觉到处都是书。除了十几个书架书橱外，萧乾还请木工做了个钉在墙上的书格子，这样就把过道和室内所有的空间全利用上了。哪间屋子的哪个书架、书橱和书格放哪一类书，他大致都有个谱儿，因此想看哪一本，伸手就能够到。

对于书，萧乾并不吝啬。他曾把书成批地送给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央文史馆、中国现代文学馆、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和内蒙大学中文系，以及他的母校北京市二十一中（即原崇实）。他也曾送书给街道上。然而残存的几部 30 年代的他的孤本，则珍藏在一个特殊角落里。

他常向人谈起《金银岛》的作者路易斯·斯蒂文森的一句名言：凡志在写作者，袋中应有两本书。一本是古今名著，另一本则是人生这部更大的书。

附记：本文系把《中华读书报》（1995 年 1 月 25 日）上所载同名文章修改补充而成。

## 文学姻缘

从打7岁起，父亲就使我养成了孜孜不倦地读书的习惯。当时我们住的那座四合院，有祖父、父亲和姐姐三代人买下的几屋子书，我们用不着去图书馆，就可以徜徉于书海中。

1935至1936年间，我大姐文馥若（又名文桂新）以修微的笔名写了三篇小说和随笔，寄给《国闻周报》。不但都发表了，还收到编辑写来的热情洋溢的鼓励信，这件事无疑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听姐姐说，《大公报·文艺》当时是年轻的作家兼记者萧乾主编的，《国闻周报》文艺栏也由他兼管，说不定那封信也是他写的。念高中时，又读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一次听到萧乾的名字是1953年初，那时我已经由清华毕业，在出版社工作两年半了。一天，编辑部主任突然跑进我们的办公室来说：“萧乾调到文学出版社来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暂时不来上班。如果有什么稿子想请他加工，可以通过秘书送到他家里。”

### 因译作与萧乾结缘

我提请萧乾加工苏联小说《百万富翁》的中译文。此书当时社会上已有了三个译本，这是第四个了。译文生硬，在校对过程中，不断发现不通顺的句子，校样改到第五次仍不能付梓。虽不是我发的稿，我却主动承担了在校样上逐字校订的任务。

50年代初，很多苏联作品都是像这样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改完后，仍不满意，因为原来是直译的，诘屈聱牙，尽管下了不少功夫，我只做到了使译文“信达”，以我那时的文字功底，“雅”就做不到了。

十天后，校样改回来了，我琢磨了许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经萧乾校订后，做到了融会贯通，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这么一来，这最后一个译本，才真正做到了后来居上，超过了前三个译本。

按照制度，校样得退给校对科，我便把原文和原译文以及萧乾的改动都抄下来，研究该怎样校订和润色稿件。后来听说萧乾终于上班了，就在我们的楼下办公。

一天，我捧着蒋天佐译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并带上原书，去向萧乾请教一个句子。那是再版书，译者不肯照我的意思改。我不认识萧乾，是请和他同一个办公室的郭姓归侨介绍的。

萧乾的答复是，这个句子原意含糊，我提出的修改意见有道理，假若是我自己翻译，完全可以这么翻。但译者愿意那么译，也不能说他译错了。这不是黑白错，属于可改可不改的问题，既然是别人译的，还是以不改为宜。

在认识萧乾以前，我常常以自己19岁时能考上竞争性很强的清华大学，在校期间成绩名列前茅，走上工作岗位后，对编辑工作也能胜任愉快而沾沾自喜。但我了解到他的生涯后，常常以他在我这个年龄已做出多少成绩来鞭策自己。

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很大程度上要靠本人的自觉。一个织布女工在机器前偷懒，马上会出废品；一个编辑加工稿件时马虎一点儿，毛病就不容易看出来。

## 阵地式译法

倘若说，和萧乾结婚以前，我已经以工作认真努力获得好评的话，在他的影响下，文字也逐渐变得洒脱一些了，好几位有名望的译者都对我加工过的稿子表示满意。

萧乾说，倘若他有心搞翻译，1949年至1954年之间，有的是机会。但白天累了一天，晚上想听听音乐，休息休息，不愿意再熬夜搞翻译了。

我们结婚后，他在我的带动下接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印了80万部，1980年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汉对照本，其他两本也都曾再版。陈毅夫人张茜就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陈毅曾称赞《好兵帅克》的译笔，说文字幽默俏皮，表达了原著的风韵。

我对陈毅元帅居然有时间看翻译小说感到吃惊，然而一时语塞。张茜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下面还有呢。陈毅还说：‘不像某些人的译文那样诘屈聱牙。’”

解放初期学习俄文蔚然成风。我之所以和俄语编辑张茜同过一间办公室，是因为1954至1957年间我曾在苏联东欧编辑室凭着半路出家现啃的俄语做过4年编辑工作。1958年资深者编审张梦麟生重病后，才把我调去接替他的工作，负责日本文学这一摊。

萧乾告诉我，他自己搞翻译是游击式的。就是说，并不抱住一位作家的作品译。但他更尊重阵地式的译法，就是集中译一位作者的全集，比如译契诃夫的汝龙和译巴尔扎克的傅雷。这么搞翻译，对作者理解更深，译笔也能更贴近原作。

## 反对死译和硬译

他反对死译或硬译，认为译文学作品，首先要抓住原作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怆的，译文却激发不出同样感情；或者原作幽默，译文却干巴巴，再忠实也是不忠实。

1957年7月他开始受批判，直到1979年2月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这漫长的22年，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困难重重，谈不上什么成绩。1958年4月他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去了，前途渺茫，但当时幸而我能继续留在出版社工作，尽管多次搬家，总比流浪到外地要强多了。

萧乾的最大志愿还是搞创作，没有条件从事创作时他才搞翻译。1961年春天，我听到一个可靠消息，说要把他从农场调回来翻译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便作为一条特大喜讯，写信告诉他。他的反应之冷淡，使我大吃一惊。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对翻译这部小说，兴趣不大。”

他是最早调回来的一个，后来从其他人的工作安排中，他才知道能够搞翻译，算是最可羡慕的了。

## 严守文学工作

1980年在香港回顾这段生活时，他是这么说的：“我从1957年被打成



右派以后……以为自己从此不能再搞文艺了……没想到还会有今天！当时要不靠那点外文，也许早就卖酱油去了。真的啊，1957年以后，重新分配工作时，不少人改了行。我始终没离开文学工作，只不过从创作退到翻译，靠的还是我懂得点蝌蚪文吧！”

1966年以前，向我约稿的还真不少，萧乾常劝我少揽一些。我说我是“有求必应”，练练笔也是好的，熟能生巧。50年代初期我译《日本劳动者》时，曾五易其稿；十年后，萧乾在农场期间，我为《世界文学》杂志突击翻译的《心河》（宫本百合子著），《架着双拐的人》（远藤周作著），都是一遍定稿，连底稿都未来得及打。

### 最有成果的时期

当然，萧乾回到北京后，我又产生了依赖心理，总想请他润色一遍再送出去。他也常说：“我这辈子就准备给你当ghost了。”指的就是做些默默无闻的工作。

1979年2月，情况变了。对我们二人来说，这段岁月是最有成果的时期。尽管这期间我们各出了七次国（六次是一起去的，另外，他单独去了一次美国，我单独去了一年日本），他还动了大大小小五次手术，他却把旧作全部整理出来，由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另外还新写了几十万字，大部分是由我誊清的。

其实，外面不难找到抄稿者，费用也不高，但是如果让别人抄，就得注意把字写得工整，免得人家认不得。这样，思维就受到限制，效率也会降低。不论他写得多么潦草，我都能辨认，而且总能找出一些问题，他说我有看家本领。

他常念叨要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我也感到惊讶，想不到他还真有股后劲。在美国的小儿子多次劝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提鸟笼逛公园的老人，做工作是饶的，不做工作是应该的。但我不能想象一个头脑完全静止下来的萧乾。他固然也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拳，那都是为了更好地写作。

近几年我才译了几部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日本作品，如泉镜花的《高野圣僧》，幸田露伴的《五重塔》等，但不再给他看了。我写的随笔、评论、序言等，则仍请他寓目。

三十几年来，我不断地向他学习写作方法。我没当过记者，但我知道他最反感的是那些对他一无所知的采访者。

1985年6月至1986年6月，我只身重返日本东京，研究日本文学。

### 夫妻合作无间

一次，香港《文艺》杂志约我写一篇远藤周作访问记。我事先把几家图书馆所藏的二十几本远藤的作品全看了，想好了问题，按照电话里约定的那样只采访了一小时，便写出一篇3000字的访问记《早春东瀛访远藤》，编辑部一字未改地予以发表了。

我们二人最喜欢用的字是“teamwork”（合作），每逢我们一方有了紧急任务，就共同协助完成它。老三桐儿还没正式学英文就听懂了这个字。他小时看见我成天伏案工作，就说：“我长大了，当什么也不当编辑，太苦啦！”

他确实没有当编辑，然而如今在美国费城，还是经常作画到深夜。

我有时想，倘若孩子不是生长在这么个环境下，而耳濡目染的是赌博、吸毒，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有时两三点钟才睡，萧乾则习惯早睡早起，我几乎刚躺下，他已起床到书房去写作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目前我们这套普通单元房里，依然像我小时那样，间间屋子都摆满了书。所不同的是，其中不少是我们自己所写、所译、所编的。三个儿女均不在身边，有一个去年夏天才成家。从人口看，我们家可以说十分冷清，含饴弄孙还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然而我们并不寂寞，因为我们有做不完的工作，并且生活在书丛中。

萧乾常说：“搞文字工作的人退休后照样能写能译。”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埋头笔耕。我们合译的《尤利西斯》问世后，我就投入了六十几万字的日本长篇小说《东京人》（川端康成著）的翻译工作。萧乾则继《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后，又写了几十篇“余墨”，为他即将出版的多卷集做注脚。我们的家就像是座文字作坊。

我于十年前退休后，一天也没闲，反而比在职时更忙了。萧乾则早在70年代初就曾被动员退休，本人也同意了，只因当时他在北京根本没有落脚之地，民政局不接受，只好继续呆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没成想，87岁的今天，他仍在任上，在写作之余，不时地还得接受采访，开会，总是忙个不停。

我们常常说，现在过的也许是平生最美好稳定的日子了。最主要的是两个人都还能工作，也真有的可干。只要有活儿干，又还能干，我就心满意足。我珍爱我们这个小作坊。

1997年4月15日

附记：本文原题《我和萧乾的文学姻缘》（台北《远见》杂志，1988年5月号），这次收入集子，做了补充修改。

## 泛读和精读

我是在一个世代书香的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小时住一座四合院。北屋满是祖父和父亲买的线装书，一个个樟木箱外头刻着《乐书》、《二十四史》、《唐宋八大家文钞》字样。前院三间南北屋里放的是姐姐们收藏的五四文学和英文、法文书籍。

我父亲反对生活上任何铺张，可是在买书方面他一向舍得。他还为我们几个小的在东厢房置办了个小型的儿童文库：有中文的《儿童世界》，也有日本的《小学生全集》，那是菊池宽编的，一共 88 卷。还有坪内逍遥译的《莎士比亚全集》。那其实是给成年人看的，可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把这部全集看完了。记得读到苔丝蒂蒙娜遇害的那一段，曾被感动得落泪。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期间我们的生活贫困，父亲为了给我们交学费，连房契都给抵押出去了，但是由于有这些书，精神生活却始终是丰富的。

1950 年大学毕业后，我出于对书的爱好，就投考了三联书店。转年 3 月，又分配到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此就与书打了四十几年的交道。尽管我 8 年前就退休了，但是搞文字工作无所谓退休。照样成天不是读书就是编书、译书。书同我确实已结下不解之缘了。

凡是初次走进我们家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嗨，你们家的书真多啊。”在我们这居民楼的套房里，除了几个书橱、书架之外，又在空白的墙壁上，都钉有书格子，密密匝匝挤满了书。甚至阳台上的柜子、壁橱、书桌底下，也都堆着书。每一类书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心里大概都有谱儿，特别是工具书，什么时候需要查看哪一本，马上就能毫不费力地伸手够到。

一般来说，读书不外乎泛读和精读两种。凡属经典作品都应精读，而普通的读物，就可以泛读。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对所译的作品必须精读而又精读，以至把它读透——连弦外之音也捉摸出来。像我们译《尤利西斯》的时候，就要求非这样不可。然而当我们为了加注去读《尤利西斯》涉及到的大量其他古今著作的时候，就只能泛读了。偶尔被有关的作品吸引住了，但是为了不耽误翻译进度，查出所要的资料之后，就把它撂在一边——自然，书名可以记下来，等空闲的时候再细细去精读。

因此，泛读和精读，并不是绝对的。有空儿就精读，忙的话，就先泛读。一本出色的新作就须精读，一般书籍就泛读。同一本刊物，重点作品，或吸引力大的，就精读，一般作品就泛读。阅读刊物势必结合个人兴趣。喜欢诗的，对诗歌部分读得就细，而喜欢小说散文的，对诗也许就只浏览一下而已。

近年来我个人喜欢的作品有宗璞的《南行记》，戴厚英的《人啊，人》和《诗人之死》，竹林的《女巫》和《挚爱在人间》，叶文玲的《无梦谷》，铁凝的《玫瑰门》。至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谯容的《人到中年》，我不但读了原作，还读了日译本。这两本书的日译者林芳是我的好朋友，她精通日语，能用委婉的文笔来表达原作所蕴含的微妙韵味，以及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典雅情趣，没有翻译腔。到了老年，觉得人的物质要求是极其有限的。但是通过读书来得到的精神方面的享受就是无限的了。一部《红楼梦》，我从 14 岁起，不知读过多少遍。不同的年龄来读它，就有不同的体会。连有关《红楼梦》的评论，我也碰上就读。最近在《书屋》创刊号（1995 年 8 月）上读到朱健的《人生荒原迷津渡——秦可卿生死谜》一文，就很受启发。

总之，书是精神食粮。物质不外乎衣食住。天地间许多事物（如花草、宠物）都是人类的朋友。可是最好的朋友还是书。因为它不但增加我们的知识，还能扩大、充实我们的精神领域，提高我们的修养和素质。

## 我所知道的钱稻孙

明知说今不如昔犯忌，业务挂帅尤不可取，然而在我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的这三十年中间，却时常感到像早年的一些本国学问底子厚，文笔好，而对所译作品又理解得那么透彻的“大师级”老译者，今天可真难觅到！怀着这种遗憾，我写过周作人，现在再谈另一位大翻译家：钱稻孙。在日本文学翻译的成就方面，这两位是不相上下的。他们的学问都非常渊博。钱稻孙懂得音乐、戏剧、美术、医学，还精通日、意、德、法文。早在30年代，他就用离骚体从意大利文译过但丁的《神曲》，并编过一部日本语法讲义。

我之所以在写过周作人之后，又来写钱稻孙，首先是由于我同这两位老前辈在编辑业务上都打过七年交道，而同钱稻孙，还有过一段难忘的师生之谊。考虑到他们两位在政治上均失过足，我迟迟未敢动笔。但是，我又一直觉得，不应因此而完全抹杀他们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

1950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当一名校对。次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我被调去做编辑工作。自1958年11月起，就从生了重病的老编审张梦麟手中接过日本文学这一摊。当时的情况是：日文译者虽然很多，但是能胜任古典文学名著的译者，却是凤毛麟角。例如江户时代杰出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一种说唱曲艺）就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译者。起先约人试译了一下，并请张梦麟先生（他病愈后，改任顾问，不再编稿了）鉴定，他连连摇头。我就改请钱稻孙先生译了一段送给他过目，这回张先生读后说：“看来是非钱先生莫属了。”于是只好请钱先生先放下已翻译了五卷的《源氏物语》，改译近松的作品和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井原西鹤的选集。同时，钱先生还在补译《万叶集选》，出版社并且希望他能将旧译《伊势物语》和《日本谣曲选》也整理出来。

1962年的一天，我听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在隔壁的办公室对总编室主任郑效洵说：“派文洁若去把钱稻孙那套本事学过来吧。”接着，楼社长就向司机班要了一辆车，陪我到西四受壁胡同的钱家去。

一进门，楼社长就说：“钱先生，我给你带来了个女弟子。”

出版社自1958年起，每月原预付给钱稻孙100元生活费。交稿后，由稿费中扣除。那天商定，由于我去学习，占了他的时间，自即月起，调整为每月150元。从此，我每周上午去他家三次。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生有过不少位老师，然而没有一位可以称得起恩师的——就是除了一般课程外，还给我特殊指导的。现在回顾起来，钱稻孙先生确实是我在日文及日本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位引路人。

钱稻孙的毕生志愿是完成《源氏物语》的翻译。那时，这部日本平安时代的名著已改约丰子恺先生翻译了。于是，楼社长带我去他家那次，他就不无遗憾地提出这个问题。楼社长回答说：“像这样一部名著，完全可以有几种译本。将来您还是可以重新翻译嘛。”

今天回想起来，当初请钱稻孙放下《源氏物语》，改译近松门左卫门和井原西鹤的作品，还是做对了。像和时间赛跑似的，丰子恺于“文化大革命”前夕总算把91万字的《源氏物语》译完，该书已于80年代初分三卷出齐。倘若仍滞留在钱稻孙手里，以他的速度，至多能译出全书的一半。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丛书》30卷中，总算有了钱稻孙的一卷完整

的译文：《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而且这两部作品难度之大，绝不亚于《源氏物语》。钱稻孙的译文填补了我国对江户时代文学翻译介绍的空白，而且这是无人所能代替的。

自1962年至1965年，我在钱稻孙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了四年日本古典文学。他生活清苦，保姆动辄就辞工。比他大4岁的老伴儿，又患了肠癌，经常还得由他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学者去服侍。为了不给他增添负担，我便决定把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他译什么，我学什么。这样，实际上也就是起了帮他整理稿件的作用。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鸳鸯殉情》、《情死天网岛》、《景清》、《俊宽》这四出戏的译文，就是这样由我帮助整理出来的。

1962年秋，我请他和他的老伴儿到我家来吃过一次火锅。那天，他送了我一套在日本上演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所灌制的唱片。来回都是我护送的。不久之后，他突然到出版社来找我。说他好不容易买到一只山鸡，非要请我和萧乾次日中午去吃饭不可。（那时刚闹完三年“自然”灾害，市场上副食品还很短缺。）那天他穿着陈旧的大衣，是自己乘无轨电车来的。我猛地联想到，我请他译的那篇《木偶净琉璃》（有吉佐和子著）中的老艺人卯三郎差点儿被汽车撞倒的故事。我反复劝他，千万不要再轻易独自跑这么远，并送他穿过马路，扶他上了电车。

第二天我们准时赴约，萧乾还特意给他带去一瓶名酒。我知道钱先生的酒瘾、烟瘾都很大，他曾诙谐地对我说：“我无恶不做。”（“恶”指的是对烟、酒、茶的嗜好。）萧乾早年读过钱先生从意大利文翻译的《神曲》，对那“离骚”体的译文，甚为钦佩，两次晤面，二人都谈得很投机。除了薄薄的一盘山鸡肉，饭桌上只有钱先生最爱吃的清蒸白菜芯和两样小菜。量虽小却十分精致可口。那天我们两个人都没好意思吃饱，走出胡同口，又进了西四小吃店，每人各要了一碗煮红小豆。这家店铺还是钱先生介绍给我的。那年头大家肚子里都缺油水。钱先生说，红小豆格外滋补，他吃得出里面放的是真正的白糖，不是糖精，而且才两毛钱一碗，一两粮票，很实惠。他常常走到胡同口外去吃上一碗，作为早点。

萧乾曾感慨地对我说：“你要是能多抽出一些时间，帮助他尽量抢救出一些译稿，该有多好！像他这样精通日、意、法、德各种文字，并且除了中国古典文学，还懂得美术、音乐和医学的大学者，今后上哪儿找去啊！”

尽管钱先生有十个儿女，他们大都分散在全国各地，留在北京的两个，工资也低得帮不上父母的忙。倒是远在台北的五女儿偶尔辗转汇些钱来。至今我还记得每次钱先生在收据上颤颤巍巍地盖章的神态情景。

有一次，我向母亲要了十个自家养的鸡下的蛋，装在一只饭盒里，送给钱先生。他很感谢，却又在饭盒里装了几个月饼来还礼。那阵子，买月饼是要用点心票的，所以我坚决不肯收。于是，钱先生只好把月饼又放回点心匣，顺手还将巴在饭盒底儿上的月饼渣子也一点点捏起来吃了。此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并使我联想起一个落魄的旗人捡芝麻吃的故事。

我发现钱先生深为柴米油盐所苦，便试着向他建议说：“您学问这样好，至今没出过像样的书，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其实，您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出版社预付的稿酬，未尝不是好事，这样就促使您非动笔下去不可。只要交了稿，我就一定让它尽早出版，成为传世之作。”

然而那些年，出版社对一个年轻编辑的要求十分严格。除了学习及业务，每年还必须参加一两个月的体力劳动，此外，又有各种季节性劳动（如到郊

区抢收麦子等），尽管楼社长说过：“到钱先生那里去学习，也是工作。”可我还是不得不加班加点来补上每周三个上午离开岗位所耽搁的编辑业务。1963年，我约钱稻孙译了一篇有吉佐和子的《木偶净琉璃》，当时他正在翻译净琉璃，而日本这位女作家的这个中篇，是以当代木偶净琉璃艺人生活为题材的，除了钱稻孙，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译者。钱稻孙只花了两个月就把全文译出来了。我因为12月份又要去劳动，用铅笔在原稿上做了些改动，送到他家，并说过了年再去取。月底劳动结束后，我到办公室去了一趟，发现钱先生已把译稿连同我借给他的两本杂志一道送回来了，还留了一封信，信中说：

人形净琉璃稿看过一遍，改得很好，稍微加了一点工。那译稿因为（1）期限恐怕过了，没有好好检点；（2）近来生活烦苦，精神疏忽。复看一遍，甚多自惭之处。加工也未满意。铅笔改处，大抵都好，没多意见。净琉璃四篇，总算完了。现在写着《前言》。至于注，相当繁琐，也尚须时日。其中曲调所关，参考无书为苦。打算天暖一点，去音乐研究所查阅《音乐大事典》。这一两年，总算学习了一番戏剧方面的古文和史事，其实还不够通的。

我于1965年11月到河南林县参加“四清”，直到1973年7月，才从干校返回办公室。其间，译者来信十之八九都已丢失了，惟独钱稻孙这封短信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这封信一方面反映了钱稻孙对待翻译工作的认真态度，同时也说明年近八旬的他，还得挤公共汽车去查阅资料，老伴儿又生着病，以至“生活烦苦，精神疏忽”。

钱稻孙曾告诉我，他当时所住的受壁胡同九号这座房子，是他的父亲购置的。他本人的工资除了养家糊口，全都用来买书了——绝大部分是日文书籍，堆满七大间屋子，早年他曾计划建立一座图书馆。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以汉奸罪关入监狱，书也全部被没收。后来因病保外就医。50年代，他多次到北京图书馆和王府大街的科学图书馆去查找这批书，始终也没有下落。他书架上的几十部工具书，都是1949年以后岩波书店陆陆续续送给他的，所以他才能够从事翻译工作。

1963年，我还把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第一卷整理了一遍。那时钱稻孙已患了白内障，看字吃力了。我便念一段《源氏物语》原著，再读丰子恺那段中译文。钱稻孙完全靠听觉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就这样，终于整理出几十条修改意见。我是复写的，一式二份。毕竟只是钱稻孙口述的，他并未过目，我怕没有把握，又送去请周作人做了鉴定。在周作人1964年的日记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一月二十三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来访，请为鉴定《源氏物语》校记。辞未获免。

二月二十七日

开始阅《源氏物语》校记。

我估计周作人是看在老友钱稻孙的情面上才答应下来的。1959年我就碰过周的钉子。《石川啄木诗歌集》的选题原是他自己定的。后来我另外又选了几首请他补译，他当面未置可否，可当天下午就写信推辞了。

周作人既然接下这项任务，还是认认真真鉴定了一遍，并发现了我们漏掉的一些问题。可惜在“文革”期间，他原来的墨迹已全部丢失。幸而我已把修改意见全部誊清在复写的另一份校样上，所以80年代在发排阶段，还是用上了。两位老先生和我本人，总算没有徒劳。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稻孙先生，是在1965年11月6日。我因为即将赴河南林县去参加“四清”工作，放了三天假，在家整理行装。一天，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突然来访，要我赶译一篇关于世阿弥的《花传书》的手稿。我对日本古典戏剧音乐一窍不通，只知道这是关于音乐的艺术论著，“花”是要求具有感动观众的最高水平的表演技巧。用了两天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将全文译出。但总觉得没有吃透原文的精神。第三天上午，我就跑到西城去向钱稻孙先生求救兵。

照例还是我把原文先念一遍，再念我的译文，并提出疑问。他要我从书架的第三层抽出一部戏剧辞典，翻开某一项，念给他听，然后发表他的修改意见。就这样，只花了两个小时，问题全迎刃而解了。我从他家赶到社会科学院去交了卷，还说明这是经过钱稻孙先生校订的，并要求从我的稿费中扣除一部分，付给他作为校订费。

次日，我就登上了开往河南林县的火车。我想起了钱先生告诉我的一段往事。他曾给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担任过口译。饭前，日本人一口气讲了两小时，钱做着笔记。饭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译了出来，也足足用了两小时。举座皆惊。我估计那是钱先生壮年时的事，而我去求教于他的那次，他已78岁了。据从中华书局调到文学出版社来的老编审张梦麟告诉我，他参加过一次欢迎日本代表团的座谈会，周、钱都在座。他认为钱稻孙的口语比周作人地道而纯熟。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周作人当然远比钱稻孙重要。单就翻译成就而言，我认为两人各有千秋。周作人译书，从来不打底稿，总是考虑成熟后，用毛笔一挥而就。钱稻孙则是用钢笔写蝇头小楷，一遍遍地修改。他的视力之所以衰弱得厉害，与此不无关系吧。钱先生为人亲切谦和，对于我这个比他整整小40岁的年轻编辑，始终完全平等相待。相比之下，周先生可没那么容易接近。他不苟言笑，总是抱着矜持的态度。他们两人的造诣及背景确实有些相似：都受过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精通以日语为首的数国外语，同是学者、教授、翻译家，在政治上又都失过足。然而钱稻孙的贡献主要在教学及翻译方面，而周作人首先是五四以来卓有影响的作家。

钱稻孙尽管目力较差，身体却很硬朗，我原以为他能像萧伯纳那样工作到90多岁，然而中国的事态却注定他只能活到79岁。1966年的红八月中，他被红卫兵抄家，连床都抬走了。老人被殴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上呻吟，当他的二儿子端义闻讯跑去探望他时，他嗫嚅着说“什么都不需要”。事实上，他已咽不下东西，没多久就被迫害致死。

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比起周作人这样折腾到1967年5月才咽气，钱稻孙倒是死得更干脆，也应该说是幸运多了。

80年代初，钱稻孙的政治问题终于得到平反：日伪时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事，不作汉奸论，但那时他的十个子女，已有一半去世。五女儿亚满和二儿子端信在台北，三儿子端礼则去了日本。大陆上只剩下一儿一女。孙子辈还有不少。对于跟着爷爷背了多少年黑锅的他们来说，平反无疑是一大喜讯。



钱稻孙于 1887 年生在世世代书香之家，祖籍浙江吴兴。祖父钱振伦曾注释过六朝诗人鲍照的诗和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骈文。父亲钱恂著有《史目表》等书，曾任清朝政府派到日本的留日学生监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是他的叔父。钱稻孙是长子，9 岁时，随父赴日，毕业于成城学校、庆应义塾中学和高等师范。回国后不久，又随着担任公使的父亲到意大利和比利时。在此期间学了意大利文和法文，并自修美术。另外，还在大学里专攻医学，读德文。民国初年任教育部视学，同时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日籍教授做课堂翻译。日籍教授回国后，即在医学院教人体解剖学课。以后又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日文和日本史。后升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接着又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讲授东洋史，业余研究日本古典文学，着手翻译《万叶集》等日本古典作品。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各大学纷纷南迁。钱稻孙受清华大学委托，留京保管校产，未随校南下。北平沦陷后，汤尔和任伪北京大学校长时期，钱任秘书长。汤死后，钱接任北大校长兼文学学院院长。政治上失了节，但总算保全了清华、燕京、北大三校的文物。

抗日战争前，钱稻孙原是位备受学术界尊重的名教授、学者、翻译家。50 年代初期，他作为有历史包袱的留用人员先被分配到山东齐鲁大学去教医学。他感慨系之地对我说：“我是自己扛着铺盖只身去赴任的。但那总比坐牢强多了。”后来他被调回北京，在卫生部出版社当一名编辑。1956 年退休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译文》杂志（《世界文学》的前身）曾发表过他译的《万叶集》和《源氏物语》第一帖，并附有译者对这两部日本名著的介绍，颇受瞩目。他还译了木下顺二的戏剧《待月之夜》、山代巴的小说《板车之歌》（作家出版社）以及电影剧本《罗生门》（北京电影出版社）等。

不同于周作人的是，以上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发表钱稻孙的译作时，从未要求他改用笔名。然而 1962 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明明是钱稻孙翻译的，书中却根本没署上译者的名字，仅由欧阳予倩在《叙言》中交代了一句：“我就请人代为翻译。”拿到赠书后，钱稻孙托我给楼适夷社长带去一本，他苦笑着对我说：“谁叫我犯有前科呢！”

全书约 36 万字，是钱稻孙平生所译的最长的一部译作了。作者就东亚各国——主要是中国，以及日、印、朝、缅、柬等国的古乐器，作了 41 篇考据论文，还有四篇附论。文中论述了“体鸣乐器”、“皮乐器”、“弦乐器”、“气乐器”中各种乐器的起源、沿革、乐律以及乐器名称的语源等问题。对于研究东方各民族的音乐和东方文化史的人们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除了钱稻孙，很难设想还有第二个人能把这么一部艰深的学术著作译得如此通俗易懂，而且文字优美。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跑了上百趟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有关参考书，真是做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

日本学术界对钱稻孙的译文特别敬重。1959 年，他译的《万叶集选》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在东京出版。日本著名学者佐佐木信纲为此译本写了“汉译万叶集选缘起”，语言学家新村出撰写“后记”。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也在“跋”

---

《东亚乐器考》一书，已于 1996 年 1 月重印，并在内封上署名“钱稻孙译”。人民音乐出版社在再版题记中说：“《东亚乐器考》的作者林谦三先生已于 1976 年去世。此次重印，经日本明治大学教授近藤耕人联系，获得了林先生遗孀、著作权继承人长野佐登女士的书面同意，又得到译者钱稻孙之孙钱永宜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中称赞译者道：“（中国人）对日本文学真正的关心与尊敬，始于本世纪。本书译者钱稻孙先生与其僚友周作人先生开了先河。周先生的业绩以《狂言十番》的中译本为代表，钱先生的主要成就当推这部《万叶集》的中译本……（钱）先生兼备中国、日本和西洋三方面的教养。惟其出自先生之手，此译本即使作为中国的诗作来看，也是最美的。”

钱稻孙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损失惨重。打砸抢后，一辈子的手稿均已荡然无存。亏得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和万叶和歌这三部选集的译稿，由于已交给了出版社，得以幸免于难。他花三年时间呕心沥血译成的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和井原西鹤的小说，已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日本文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了，并获得我国读书界的好评。

试看钱稻孙所译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鸳鸯殉情》中的这段文字：

露华浓，夏虫清瘦；  
情真处，配偶相求。  
好不俊俏也风流！  
粉蝶儿双飞双逗，  
这搭那搭，旖旎温柔；  
东风里，翩翩悠悠。  
人家彩染的春衫袖，  
却当作花枝招诱；  
并起双翅，悄立上肩头，  
恰好似，仙蝶家纹天生就。

译文韵字的安排，长短句形式的结构，以及化俗为雅、俗中有雅的风格，不禁令人联想到我国的元杂剧、明清传奇。

至于他译的井原西鹤作品，则具有明清小说风格。每段前的两个七字句，颇似我国章回小说的回目。像《日本致富宝鉴》中“水间寺放利生钱，江户城添暴发户”这样的回目，堪与《水浒传》相媲美。

老人去世已28年了。这期间我总算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出版后，获得各方面的好评，钱稻孙的名字又重新被人们记了起来。1992年，他生前所译的《万叶集精选》（共690首）也作为《日本文学名著选译丛书》的一种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这也聊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这位卓绝的学者和翻译家吧。

1994年1月18日

附记：本文系将《读书》（1991年1月号）  
上所载同名文章修改补充而成。

## 幸田露伴——一个有气节的日本文人

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年轻的明治政府为了在短期内走完西方先进国家花了几百年走过来的路，便急起直追，竟采取弱肉强食政策，靠侵略和掠夺邻国来完成本身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早在1892年3月，日本浪漫主义诗人北村透谷（1868—1894）就在他主编的《和平》杂志创刊号发刊词里，提出了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口号。两年后，日本政府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军国主义思潮席卷全国，《和平》杂志被迫停刊。那时，不仅报纸上充斥着炫耀“战绩”的报道，连过去写过一些好作品的作家们也出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动笔歌颂那场不义之战，举国上下，一时闹得乌烟瘴气。

就在这个时候，有位日本作家放胆直言了。他在1894年10月13日的《国会新闻》上发表了《关于战争》一文，提出文学不应被战争牵着鼻子走，而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无限愤慨地写道：“倘若有人强迫文学家或美术家去创作配合当前的战争等等的作品，那真是无知透顶，岂有此理！”

这位作家就是日本近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随笔家、考证家幸田露伴（1867—1947）。

露伴原名成行，别号蜗牛庵，生在江户（今东京）旧幕府的一个武士家庭里。幼时体弱多病，而异常聪颖。6岁上会田塾，受《孝经》的启蒙教育。8岁入小学，擅长算术，课余喜读《三国志》和《水浒传》。12岁进中学，但感到学校教育对自己是个束缚，次年即退学，成天到汤岛圣堂的东京图书馆去广泛涉猎经书、佛典乃至江户时代的杂书。14岁入东京英学校（即青山学院大学前身）习英文。后又辍学，每晚到汉学家菊池松轩开办的迎曦塾去攻读朱子学。16岁，他奉父命入电信技术学校，次年毕业，在筑地的中央电信局工作了一段，接着就赴北海道后志国余市，担任技师，热诚地教给当地人如何淘金、滤水和养蚕。在这穷乡僻壤，19岁的露伴结识了一位僧侣，并把庙中所藏经卷读遍。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刚从东京寄来的坪内逍遥（1859—1935）的《小说神髓》（1885）。在这部理论著作中，坪内主张小说家应着重描绘人物的内心活动并尽量客观地去描写，不可夹入作者本人的看法；更不可直接教训读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后年，露伴曾这样回顾《小说神髓》给他的巨大启发：“过去的小说家都是功利主义者，而且一味说教。从世人最敬重的马琴起，均以教训人为宗旨。近松以来就是如此。现在这一切都被推翻了。不论是我还是我的友人，全受了很大震动。”

露伴也接触到了一些为日本近代文学着先鞭的作品。他发现自从他离开东京后，那里已涌现出一批接受西方教育洗礼的、跟他同一辈的青年作家，大胆地尝试着用新技巧进行创作。

露伴卖掉几件衣服，将一箱书典当出去就不辞而别，经过一个多月的长

---

收入《露伴全集》时，此文改题《战时的诗人》，见第31卷，第50~54页，岩波书店1956年版。

即曲亭马琴（1767—1848），本姓泷泽，日本江户时代小说家，主张文学要有劝善惩恶的效果。

即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日本江户时代净琉璃（木偶戏）和歌舞伎剧作家。

见柳田泉著《幸田露伴》，1942年版。

途跋涉，回到东京。父亲责备他不该旷职，并命令他在自己经营的一片纸店里打杂。这个时期，他开始热衷于研究江户时代作家井原西鹤（1642—1693）的“浮世草子”（社会小说）。西鹤晚年的作品（如《家计费心机》）触及商人社会的阶级性质，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露伴在创作方法上，受西鹤的影响颇深。

露伴的同辈作家二叶亭四迷（1864—1909），幼时也攻读汉学，接受了中国儒家思想。他17岁时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俄文科学俄语，通过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别林斯基等19世纪俄国作家的作品，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887年，他的长篇小说《浮云》问世。作品借明治政府的一个下级官吏的悲惨遭遇，揭露了那个时代官场的尔虞我诈。后年他在《作家苦心谈》中写道：“我读了俄罗斯小说，特别讨厌俄罗斯官吏。……说不定我就是把俄罗斯的官尊民卑搬到日本来写的。……冈察洛夫在他的名著《悬崖》里写了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我把它运用到日本来了。”

其实，尽管俄罗斯文学和文艺理论对二叶亭的人生观与文艺理论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浮云》却是在那个特定时期的日本产生的。

《浮云》是以自由民权运动遭到挫折为时代背景。这场来自下层的民主改革运动始自19世纪70年代初，在明治专制主义政权的镇压下，并未真正取得成果，历时十余年后趋于没落。

在日本，二叶亭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首倡者。《浮云》问世的前一年，他曾发表文学评论《小说总论》，对日本文坛上风靡一时的娱乐文学和简单地模仿现实的创作方法表示异议，主张小说应该通过现象，描写现实的本质。他在《浮云》中反映了上述文艺观点。

露伴的短篇小说《风流佛》是在《浮云》出版两年之后问世的。他也对明治社会的世态炎凉提出了批评。主人公珠运是个手艺高强的雕刻师，有一次他到奈良去瞻仰佛像，半路上，在木曾山的客栈中与孤苦伶仃的卖花姑娘阿辰邂逅，一见钟情。二人正准备结婚时，阿辰的生父岩沼子爵突然派人将她接到东京去了。岩沼原是个落魄的武士，德川幕府被推翻后，他成了明治新政府的高官。他嫌珠运身分卑贱，要给女儿找个乘龙快婿，因而把珠运写去的信统统退了回来。阿辰走后，客栈老板劝珠运以她为原型，雕刻一尊佛像。珠运呕心沥血雕成的佛像，神情逼真，栩栩如生。一天，佛像被珠运坚贞不渝的爱情所动，忽然活了，用臂挽住珠运，二人双双腾空而去。

在那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下，露伴只能给小说以这样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

露伴接着又写了短篇小说《锻刀记》（1890），它与《风流佛》有异曲同工之妙。主人公刀匠正藏废寝忘餐，坚韧不拔，花三年工夫锻造出一把旷世宝刀。

1890年，露伴迁居到东京下谷区谷中天王寺町，以天王寺为背景写了《五重塔》，最初发表于《国会新闻》（1891年11月至1892年3月）。这部

---

有中译本，见《二叶亭四迷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见《二叶亭四迷全集》第9卷，第142~143页，岩波书店1953年版。

原题作《一口剑》，中译本译为《锻刀记》，见《日本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中译本，见《世界文学丛刊·苍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篇小说是露伴的代表作，它通过主人公木匠十兵卫筑塔的故事，写艺术强韧的生命力。关于暴风雨的那段描写，被公认为明治文学中的名文。

露伴用以上四篇小说来歌颂艺术家的顽强意志以及艺术的永恒不朽。珠运、正藏和十兵卫，对艺术都怀有无比坚强的信念，哪怕为之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奋发图强、人定胜天的向上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个人物都是旧手艺人。有些日本文学史家认为，露伴没有去描写迷恋欧洲的近代日本人，“却从作了欧化的牺牲品的民众心中发现了蓬勃的热情和前进的意志，并把他们刻划成理想人物”。这是露伴对时弊的一种反抗。但是由于他“未能走现实主义的路，通过与现实进行斗争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是赞美了艺术至上主义，构造了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神秘世界”，因而未能继承二叶亭四迷所建立起来的近代现实主义文学。

进入 19 世纪 90 年代，幸田露伴和尾崎红叶、坪内逍遥、森鸥外等人在日本文坛上日渐活跃，故有红露道鸥时代之称。这是露伴一生中，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露团团》、《对骷髅》、《奇男儿》、《一刹那》、《真美人》、《街头净琉璃》等短篇小说，以诗人与市侩之间的矛盾为题材的《有福诗人》，写主人公彦右卫门与恶浪和鲸鱼作搏斗的长篇小说《捕鲸人》，相继问世。

自 1893 年 1 月起，露伴的《风流微尘藏》在《国会新闻》上连载。这部长篇小说描绘了一百数十个人物，试图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现实，惜因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终于未能写完。1903 年，他又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滔天浪》。露伴原来打算让主人公逃到孤岛上去过鲁滨逊式的生活，借以对单纯模仿西方的所谓“文明开化”进行批判，又因日俄战争勃发，沉闷的政治气氛迫使他中途搁笔。

从此，露伴致力于写历史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取材于中国明朝建文帝事迹的《命运》（1919）。此外还著有《史记的作者》、《汉书的作者》（均 1894）、《元代杂剧》（1895）、《司马温公》（1896）、《读史后语》（1898）等。日本当代学者伊狩章认为，不论对中国古代思想还是古代文学的研究，露伴的“造诣之深，在同辈人当中是无与伦比的”。

但是，露伴并未把自己埋在故纸堆里。他经常发表些杂文，对文学、妇女、青年、教育、社会风气等等问题提出精辟的见解。日俄战争结束的 1905 年，他在《文坛诸问题·战后文学》一文中写道：“日俄战争开始后，曾有人鼓吹战争文学，但均归于失望。有些学者估计战后会出现伟大的文学作品，但即使有伟大的作品问世，我也绝不认为它会直接与战争有关。有人认为打过仗的文学家和小说家会写出纪念战争的杰作，然而文学家和小说家投笔从戎，恐怕并不会导致他们赞美战争或写出歌颂战争的作品。相反地，他们大概更会站在反战的立场上来写战争的另一面。只要看看历史上中国全盛时代的唐朝文学，就可以清楚了。”

---

见伊豆利彦等著《日本现代文学史》，第 50~51 页，三一书房，1954 年版。

见伊豆利彦等著《日本现代文学史》，第 50~51 页，三一书房，1954 年版。

见伊狩章著《幸田露伴和樋口一叶》，第 144 页，教育出版中心，1983 年版。

见《露伴全集·别卷上》，第 139~140 页，岩波书店，1980 年版。

1914年，他在《把力气使错了地方的现代日本人》一文中指出。政府的穷兵黩武政策给劳动人民带来了穷困。“日本的监狱经费比教育经费还多，真是愚蠢至极。……报纸上经常报道，有人过不了年关，故意犯罪，好去坐牢。……竟然使老百姓穷困得想进监狱和警察署的拘留所……这就是今天的现状。别的地方，有这样执政的吗？”

“政治上本末倒置，还要增设陆军，扩张海军，太不自量了。……照目前的状况下去，军备和监狱的经费不断增加，国库被滥用非生产性的事业上，日本势必患贫血症。其结果必然是穷人和暴民与日俱增。”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5月，袁世凯派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签订卖国条约，因而激起我国人民空前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次年5月，露伴发表《命运的钥匙——中国的命运》一文，委婉地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提出异议。他写道：“如今交通便利了，世界变得像一家一样。即便想避免和外国打交道，也避免不了。何况是弱国，自然无法靠本国来解决自家的命运。这正是中国的现状。然而，倘若某个邻国认为它有彻底为之打开局面的钥匙，那就错了。只有按照造物主的安排来使用钥匙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露伴学识渊博，文学造诣颇深，另外还写了《平将门》（1920）、《蒲生氏乡》（1925）、《武田信玄》（1927）、《日本武尊》、《今川义元》（均1928）、《太公望》（1935）、《连环记》（1940）等历史小说，评论《一国之首都》（1901），随笔集《澜言》、《长语》（均1901），剧本《名和长年》（1913）等。他的文学生涯长达60年，跨过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为日本近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的业绩。《芭蕉七部集评释》（1926—1947）是他的绝笔之作。

1937年4月，露伴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的第一届文化勋章。然而他并没有受宠若惊，却在祝贺会上发表感想道：“我认为作家与其受政府优待，毋宁是受虐待，才能写得出优秀的作品。”

他这句话既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行径表示了微弱的抗议，也包含着自责的意思。他一生不满于日本进行不义之战，但是又始终也鼓不起勇气来公然去反对。然而，考虑到同时代的某些日本作家甘当军国主义的吹鼓手，至多是消极地保持沉默，相形之下，露伴仍不失为一个有良知、有气节的文人。

（原载《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4期）

---

见《露伴全集·别卷上》，第476~477页。

见《露伴全集·别卷上》，第603页。

## 岛崎藤村的《破戒》

### ——一部为“贱民”的人权呼吁的小说

岛崎藤村(1872—1943)出生于日本长野县筑摩郡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原名春树。在汉学造诣深厚的父亲栽培下,他自幼就习我国的《千字文》、《三字经》、《论语》、《左传》等。9岁赴东京求学,15岁入基督教会创设的明治学院,一度曾信奉基督教。19岁毕业,遂任明治女学校高等科英语教员,并放弃了宗教信仰。1893年,曾与最早写过日本自由体长诗《楚囚之歌》(1889)的诗人北村透谷(1868—1894)等共同创办《文学界》杂志,鼓吹浪漫主义,二人成为至友。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新体诗,收入诗集《嫩菜集》(1897)、《一叶舟》(1898)、《夏草》(1898)和《落梅集》(1901)中,并汇编成《藤村诗集》(1904)。这些诗作以其清新的风格,备受当时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对日本现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贫瘠的岛国日本凭借不义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创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条件。日本政府以牺牲邻国中国及朝鲜为手段,挤入世界英、美、法、德、意等强国之列。由于扩张军备,刺激了产业的勃兴,促进了国际贸易,日本的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

然而在表面的繁荣背后,贫富悬殊却愈益加大,尽管政府进行镇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还是此起彼伏。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部分有识之士曾开展过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北村透谷少年时代曾积极参加。后来他脱离政治,决心通过文学途径来实现自己所抱的自由与民权理想。他是基督教反战运动的组织者,曾参与并主编日本最早的反战刊物《和平》。1894年5月,正当日本政府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北村透谷因所寻求的个性解放理想竟彻底破灭,愤而自杀,使岛崎受到很深的触动。

毫无疑问,透谷之死使藤村意识到:诗固然能歌颂青春,但人生还有许多东西不是能用诗的形式来表达的。于是,他决心放弃诗歌创作,改写小说。他在长野县小诸镇租了所房子,到一家义塾去执教。这段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在散文集《千曲川素描》(1912)中描绘了那里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致。他的代表作《破戒》也是在那里写成的。

藤村不是社会改革家,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幸德秋水(1871—1911)那样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日俄战争前夕组织平民社,创办《平民新闻》,进行反战活动。他也没有像友人田山花袋(1871—1930)那样上前线去当随军记者,并以日俄战争为背景,写下短篇小说《一个士兵》,把战场比作坟场。藤村却把人生本身看作一个大战场,声称他自己“也是人生战场上的一名随军记者”。在日俄战争期间,他以愤慨心情写出了揭露日本社会中部落民受歧视这一悲惨现实的作品。

部落民是日本中世纪“贱民”的后裔,原被加以“秽多”、“非人”等辱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曾于1871年宣布废除身分制,把原来的部落民改称为新平民,他们聚居的地方改称“特殊部落”、“未解放部落”。然而实际上,在本世纪初藤村写《破戒》的时候,这些同属于大和族的新平民却依旧喘息在社会最底层,只能从事屠宰、扫街、搬运等所谓“贱业”,受尽欺凌压迫。

藤村之所以能创写出《破戒》这样的作品，是与他深入基层的体验分不开的。《破戒》的主人公丑松的原型是长野师范学校的心理学教师，一个新平民出身、天资聪颖的知识分子。猪子莲太郎这个形象则脱胎于该校的讲师大江矶吉。大江由于也是新平民出身，被无端地开除教职，从此他就献身于部落解放运动，最终惨死在政敌手下。藤村作为一名教师，由衷地同情周围这些新平民出身的教师们的坎坷遭遇，对耳闻目睹的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感到无比愤慨，就实地做了深入的调查，还去拜访过住在小诸的一位名叫弥右卫门的新平民头目。岛崎在新平民聚居的小诸地区居住了七年，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在《破戒》中他怀着满腔义愤，生动凝炼地反映了新平民的悲惨境地。

《破戒》的主人公濑川丑松是在信州饭山镇小学任教的青年教师。他出身于未解放的部落。他父亲为了瞒住儿子的身世，不得不终生孤零零地隐居在深山里当牧羊人。他生前曾谆谆告诫丑松，千万不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分。

丑松最尊敬的前辈是出身于新平民的猪子莲太郎。猪子公开声称自己是新平民，并同社会的歧视偏见开展大无畏的斗争。丑松每逢捧读莲太郎的著作，聆听他的讲演，总深深感到自己隐瞒身分是虚伪可耻的。这时，莲太郎遭到暴徒的暗算而死。在莲太郎那光辉榜样的感召下，丑松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分。也就是说，破除了亡父的告诫——“破戒”。

小说以丑松动身去美国，在得克萨斯州一个友人经营的农场上开辟新天地作为结束。

《破戒》的初版是1906年3月自费出版的，仅印了1500部，但不出十天就销售一空，接连再版，经久不衰，成为不朽的名著。夏目漱石（1867—1916）曾称誉它是“明治时代的第一部小说”。岛村抱月（1871—1918）也竭力推崇此作品说：“《破戒》的确是我们文坛上近来的新收获。我不禁深深感到，小说界得此一篇，方达到一个更新的转折点。”

《破戒》以广阔的社会为背景，揭露了荒谬的日本封建身分制度和各种恶势力对人的桎梏。小说通过主人公丑松的思想演变过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逐渐觉醒起来的丑松同黑暗的封建社会之间的冲突，反映了日本新平民对人权的要求，堪称为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的作品。

继《破戒》之后，藤村又在长篇小说《春》（1908年脱稿，1912年出版）中描写了以北村透谷为中心的《文学界》同人的青春时代。此书的社会意义比《破戒》逊色，这和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分不开的。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并虎视眈眈地准备进一步蚕食中国。日本资本主义跨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权，就变本加厉地迫害国内的社会主义者。于是，发生了逮捕大杉荣等15名社会主义者的“赤旗事件”（1908），以及将幸德秋水等12名社会主义者处决的所谓“大逆事件”（1910年5月至1911年1月）。

岛崎不会不洞悉倘若沿着《破戒》的路子写下去，自己会落个什么下场。他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从《春》中北村透谷的原型青木身上可以看出，同旧事物进行斗争必然会以粉身碎骨告终。青木自杀前就曾说：“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想打碎世界，却反而把我的心打碎了。”在《春》的末尾，岸本（岛崎的原型）则说：“啊，像我这样的人，也得想办法活下去呀。”

岛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家》（1911）是以他的家族为题材的自传性作品。明治维新后，日本摧毁了幕府政权，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产业



与科技急剧地近代化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仍残存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这体现在家族制度上。《家》写的就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农村的两大家族 12 年间（1898—1910）逐渐没落的过程，以及在封建家族制度的束缚下的个人的苦恼。作品围绕着木曾马笼的旧驿站老板小泉和福岛镇药材批发店桥本这两个家族成员的活动，展示出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动态，以及道德和人性的悲剧。

血缘关系这一无形的纽带将这两个家族先天地维系在一起。主人公三吉是小泉家的幼子，他父亲未能适应明治维新后动荡的时局，致使偌大一份祖产败落，本人发疯而死，老宅院也毁于火灾。四个儿子虽已移居东京，各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惊涛骇浪中谋生，却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三吉的长姊阿种嫁到门当户对的桥本家，生意倒还兴隆，怎奈她丈夫一味耽溺于女色，最后弃家出走。她的儿子正太虽挑起了家业，又力不从心。他娶了丰世这么个贤妻，还是去寻花问柳，后来死于痨病。三吉的二哥也是由于荒淫无度而染上恶疾，成了弟兄们的累赘。看来作者在刻意强调淫荡对人的毁灭作用。在家中忍辱负重的则是阿种、丰世以及三吉之妻阿雪这些妇女。阿雪的痛苦又有所不同，她是被迫撇下意中人，奉父母之命嫁过来的。她和三吉的婚姻一开始就阴云密布。作者对这些妇女的内心悲痛所做的刻画，入木三分。

《家》可以说是一部凝聚着妇女的哀怨与呻吟的厚实深沉之作，描写细致入微，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特色，被誉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杰作。

1913 年，岛崎赴法国。1916 年回国，在早稻田和庆应这两所大学讲授法国文学。他还写了对他和侄女之间的乱伦行为表示忏悔的《新生》（1919），自幼至老的系列私小说《儿时回忆录》（1913）、《樱头熟了的时候》（1914）、《成长期》（1925）、《暴风雨》（1926）、《分配》（1927）等。暮年花七载完成了历史小说《黎明前》（1935）。岛崎在这部长篇力作中，通过一个山村驿站老板青山半藏的艰辛经历，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崩溃、资本主义的勃兴过程，涉及明治维新前后近 30 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对那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提出质疑。接着，他又动笔写《东京之门》，可惜尚未完成就因脑溢血而与世长辞。生前，他曾自编自选《岛崎藤村全集》12 卷。由于他的文学成就，1935 年被推选为日本笔会会长，次年因《黎明前》获朝日文化奖，1939 年被遴选为日本帝国艺术院会员。

岛崎藤村是一位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诗人和小说家。他集日本、中国和西方素养于一身，创作生涯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他曾这样概括当时的日本社会：

“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封建时代的遗事还活在我们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虽说是明治维新，但我们并未将过去根深蒂固的积习完全更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勿宁是封建时代遗事的近代化而已。”

正因为岛崎藤村对自己所生活的那个似新而实旧的社会本质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把具体真实的历史事件引进小说的艺术世界方面，他才能有出色的创造，并为后世留下像《破戒》、《家》和《黎明前》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尤其是《破戒》，作者用流畅、优美的散文笔调描绘了北信州的小诸与饭边一带的自然风光与农村生活，对高原的四季变化做了精致的刻划，再加上对方言运用自如，充满浓郁的地方色彩，为日本的乡土文学开了先河。不但于 1906 年就被改编成戏剧在东京公演，战后还于 1948 年被搬上

银幕。有些日本文学评论家甚至认为“通过《破戒》看到了日本现代新文艺的曙光”。它堪称日本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

（原载《日语学习与研究》，1996年第3期）

## 泉镜花——语言的炼金术师

日本新文学是在日本近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日本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营养，随着日本整个国家的成长壮大而发展起来的。我们更熟悉夏目漱石、森鸥外、岛崎藤村、谷崎润一郎，相比之下，泉镜花在中国没那么知名，然而他死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他的作品在日本却越来越受到重视。

日本近代短篇小说巨擘芥川龙之介说，泉镜花的“行文笔致兼备绚烂与苍古，几乎可以说是日本语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表现。……《镜花全集》（15卷）不仅是明治大正文艺，而是整个日本文艺所建造的巍峨的金字塔……为近代日本文艺史留下了最光彩陆离的一页”。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川端康成曾写道：“日本到处都是花的名胜，镜花的作品则是情趣的名胜。”当代的泉镜花研究家村松定孝教授曾称誉他为“语言的炼金术师”。然而至今中国读书界对他还是比较陌生的。

泉镜花原名镜太郎，1873年生在于石川县日本美术古都金泽市。他的父亲泉清次是个手艺高超的黄金象牙雕工，母亲阿铃出身于能乐（日本的一种古典乐剧）演员的家庭。镜花5岁时就对母亲收藏的附有彩色插图的草双纸（江户时代盛行的通俗小说）发生兴趣，还最喜欢听母亲讲解里面的故事，因而自幼就受到日本传统文化的熏陶。他7岁上小学，在父亲的鼓励下，课余经常临摹草双纸上的插图。两年后，不幸他母亲去世了，年仅29岁。镜花的两个妹妹先后被过继出去。这种亲人的生离死别，使他小小年纪就怀有孤寂心情，养成了感伤的性格。11岁入真爱学校（次年改称北陆英和学校），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1887年辍学，投考金泽专门学校未第，一度入井波私塾。从此，出租书店就成了他的课堂。他借了许多小说来读，尤其喜欢尾崎红叶的作品。1890年11月，他抱着当小说家的宏愿去东京，一心想拜尾崎为师，但是找不到门路。他过了将近一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了底层人民的痛苦。次年10月，才辗转从亲戚那里弄到一封介绍信，前去拜访住在东京牛込区横寺町的尾崎，当上了尾崎家的门丁。他在尾崎家一直勾留到1895年2月，在这期间，他专心致志地学习写作，并读了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1786）等神怪小说。他的处女作是《冠弥左卫门》，1893年5月起在《京都日出新闻》上连载，署名芋之助。这部作品有浓厚的褒善惩恶思想。父亲去世后，他一度回乡，因生活无着，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他多次把作品寄给尾崎，经尾崎修改后才发表。尾崎对镜花的热心培养，在日本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泉镜花的中篇小说《义血侠血》于1894年11月在《读卖新闻》上连载。次年12月经川上音二郎改编成话剧《泷白丝》，在浅草驹形剧场首次公演，成为日本话剧界保留剧目之一，至今仍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在文坛上奠定了地位后，1896年泉镜花在东京定居。1909年以来，先后结识夏目漱石、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久保田万太郎、水上瀧太郎等作家，1920年开始与芥川龙之介往来。1927年5月，以镜花为核心，成立了谈论文学的九九九会。由于他在文学方面功绩昭著，1937年6月被遴选为帝国艺

---

芥川龙之介：《镜花全集的特色》，见《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4卷，第83页，岩波书店1955年版。  
引文见村松定孝：《近代日本文学系谱·古典的浪漫作家泉镜花》第78页，东京社会思想社1980年版。

术院会员。他在 1939 年 7 月发表了绝笔之作《缕红新草》，9 月即去世，终年 66 岁。

泉镜花的作品，大部分是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没有一部是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其中以《义血侠血》中走江湖的女艺人水岛友和马车夫村越欣弥的遭遇最为感人。故事是这样：水岛友劝村越赴京学法律，答应接济他学费。几年后，村越快学成了，阿友预支的 100 元工钱却被飞刀师（一种流浪艺人，专门表演左一刀右一刀地往裸体女人身上飞刀子的惊险绝技）抢了去。阿友怕欣弥等钱用，急得拿起飞刀师丢下的刀子就去从一对老夫妇那里抢到了 100 元。老夫妇认出了阿友，她一时情急，为了灭口，就把他俩杀了。侦查当局凭着血迹斑斑的刀子逮捕了飞刀师。飞刀师招认抢了阿友的 100 元，刀子也是他的，但不承认老夫妇是他杀害的。阿友则一口咬定飞刀师并没有抢她的钱，她身上的 100 元是她原来预支的工钱。后来阿友和欣弥在法庭相遇。欣弥已做了代理检察官。他怀疑阿友是为了供他学费而犯的罪，但他为了忠于职守，仍要阿友如实招供。阿友出于对欣弥的爱，就彻底坦白了。欣弥把恩人作为杀人犯予以起诉。阿友被依法判处死刑。欣弥为了和恩人在来世结合，也用手枪自杀。

《义血侠血》像泉镜花的另外一些作品一样，写一个人为了忠于职守，不得不做出牺牲。日本评论家奥野信太郎和村松定孝均提出，根据《义血侠血》改编的《瀑布银链》可能受到我国京剧《玉堂春》的影响。《玉堂春》以大团圆告终，基调是浪漫主义的，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但是泉镜花周围的生活是那么冷酷，不容许他去粉饰现实，他就为人物安排了一个悲惨的结局。欣弥人为地结束了人生的旅途，只能指望在来世和恩人相聚。

同一年，泉镜花在《太阳》杂志上发表《恋爱与婚姻》一文，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的婚姻都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社会而缔结的。作为一个信奉儒教的国家，结婚是为了延续后代……父母教导女儿要一味谦恭、贞淑、温柔，却并不教她懂得爱情……还告诉她，婚姻乃终身大事，好女不事二夫。女子奉命而嫁，太可怜了。”

一个月后，他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想法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短篇小说《外科室》的女主人公是一位贵族小姐。她在公园里和一个医科大学学生一见钟情。他俩自然不能交谈，因为小姐不但由两个女伴陪着，前后还簇拥着两个男仆。九年后，医科学生已成了著名的外科大夫，但始终未娶；小姐则嫁给了一位伯爵，生了一女。由于命运的捉弄，伯爵陪着夫人到外科室来，请大夫给夫人动胸部手术。夫人说她心中有个隐秘，坚决不让给她上麻药。手术即将完成时，夫人突然抓住大夫执刀的手。大夫问：“痛吗？”夫人说：“不，因为是你……”又脉脉含情地望着大夫说：“但是，你、你、大概不认得我了！”大夫面色苍白，浑身发颤地说：“我没有忘记。”夫人猛地把手术刀往自己的胸部深处一戳，嫣然一笑，死在手术台上。大夫也于同一天自尽。

在充满儒教色彩的封建社会道德下，养在深闺里的贵族小姐必须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门当户对的伯爵，爱情只能隐藏在内心深处。爱情越

---

村松定孝：《语言的炼金术师——泉镜花》第 102～110 页，东京社会思想社 1973 年版。

《泉镜花集》，见《日本近代文学大系七》补注第 521 页，角川书店 1979 年版。

是被压抑，就越炽烈，以致甘愿在意中人手下挨刀，最后还用那把手术刀殉情。这里包含着对封建婚姻的谴责。

泉镜花对受尽欺凌压迫的下层人民怀有深切同情，他在早期的中篇小说《贫民俱乐部》（1895）中塑造了一个浑身侠骨的女乞丐阿丹的形象。她处处替穷哥儿们打抱不平，伸张正义。《瞌睡看守》（1899）则写一个老看守故意打瞌睡，好让囚犯们干活时能自在一些。他知道这些囚犯十之八九是穷得走投无路而犯罪的。

镜花关心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艺妓的命运。在镜花的那些以惨遭蹂躏的艺妓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写得最出色的要算是《汤岛之恋》（1899）了。原题《汤岛诣》，是到汤岛神社朝香之义。这部中篇小说结构严谨，故事是环绕着神月梓和艺妓蝶吉之间曲折的爱情展开的，对话和叙述中不时夹以往事的回忆，烘托出梓的内心矛盾。梓出身寒苦，母亲是艺妓。姐妹们用血汗钱供他念完大学。由于他长得英俊，学问又好，做了玉司子爵家的上门女婿。他的妻子龙子7岁就到法国留学，为人高傲，和梓格格不入。梓便从家里出走，与他贫穷时结识的蝶吉接近起来。蝶吉才19岁，出污泥而不染，对梓是一片痴情。然而梓又念念不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要不要帮助蝶吉脱离苦海，始终犹豫不决。蝶吉终于神经失常了，不断喊叫神月梓的名字，说他就是她丈夫。警察因而把梓传了去。和梓有仇的一家小报记者早已闻讯赶来。梓料到他将会在报纸上恶意地散布自己的丑行，断送他的前程。于是，就拼命抱住蝶吉，一道跳河殉情。两个人的坟紧紧地挨在一起。除了梓的生前好友外，做了寡妇的龙子也悄悄前来扫墓。她遇见他们后，苦苦哀求他们不要把此事告诉任何人，因为梓死后，子爵家已逼她离婚，墓石上刻的也是神月梓，而不是子爵家的姓。

1899年的新年宴会上，泉镜花和艺妓桃太郎结识，二人情投意合。《汤岛之恋》是当年12月出版的，在阿蝶身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桃太郎的影子。桃太郎原名阿铃，恰好和镜花的亡母同名。镜花为她赎身，跟她同居。但是由于老师尾崎红叶坚决反对，镜花被迫同阿铃分手。直到尾崎于1903年去世，镜花才和阿铃正式结婚。

镜花的《妇系图》（1907）就是以这一事件为背景的。主人公早濑主税同艺妓阿莺相好，但是师父不同意他与阿莺结婚。师父的女儿钟情于主税，师父却又嫌他门第低，把女儿嫁给了医院的少东家。主税揭发少东家的隐私，迫使他和他的两个妹妹自尽。艺妓阿莺最后病死，主税也自杀身亡。

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宗旨是反对门第婚姻，抨击社会上对艺妓的偏见与歧视。在现实生活中，镜花却与阿铃一道过了36年幸福的岁月，她不但是镜花生活中的伴侣，也是创作生涯上的助手，与她结缡后，镜花的作品在艺术上臻于成熟。

泉镜花的代表作是中篇小说《高野圣僧》（1900）和《和歌灯》（1910）。

《高野圣僧》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带有神话色彩。“我”在越前敦贺的旅店听一个云游僧讲述他过去的一段经历。事后“我”才知道这位僧侣是六明寺的高僧，名叫宗朝。宗朝年轻时，有一次从飞驒出发，要到信州。他迷了路，遭到蛇的袭击，天黑后好不容易才在深山里找到一座孤零零的茅屋。里面住着个白痴，还有他的美貌的妻子和一个老汉。美女带宗朝到瀑布下去洗澡，回来后，老汉说：“你怎么原样回来啦？”事后他才知道，凡是跟着美女去洗澡的男子，由于存心不良，回来的时候都变成了猴、马或其他鸟兽。奇禽

怪兽围着茅屋叫了一宵，宗朝不断念诵《陀罗尼经》。第二天，宗朝又上了路，来到头天的瀑布那里。他踌躇不决，想折回去找那位美女。这当儿，那个老汉来了，告诉他，美女神通广大，昨晚的那些鸟兽都是她用妖术变的，这就是那些不安分的男子的下场。宗朝亏得佛法保佑，才保全了自己。

日本当代评论家吉田精一认为《高野圣僧》所描绘的境界，是泉镜花心目中的人生缩图。飞驒那爬满了蛇的崎岖山路，象征着苦难的历程。美人和白痴结为夫妻，代表着封建包办婚姻。那些淫荡的男子受到报应，统统变成畜生，虔诚的云游僧则得以幸免。故事情节虽然荒诞，由于泉镜花的语言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用精炼优美的词句来描绘皎洁明月下的溪流和瀑布，阴森恐怖的小茅屋，神秘的美女和鸟兽，创造出一种迷离扑朔的环境气氛，读起来既离奇又逼真。

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鹤田欣也把《高野圣僧》和夏目漱石的《草枕》（1906，中译本改题《旅宿》）、川端康成的《雪国》（1935—1948）、安部公房的《砂女》（1962）相提并论，认为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过于迅速，敏感的作家们有点不能接受，便创造了这样一个梦幻的世界。

镜花笔下的妇女，大都是在封建残余的习惯势力下挣扎的弱小者，他对她们寄予同情，从而塑造了这样一个神通广大、任意摆布胡作非为的男人的女子形象。

《和歌灯》的背景是桑名的一家叫作湊屋的旅店。主人公恩地喜多八是个遐迩闻名的能乐演员。三年前，由于擅长谣曲的按摩宗山为人傲慢，喜多八狠狠地惩罚了他，宗山气愤而死。因此，喜多八的养父（叔叔）恩地源三郎将他逐出家门，禁止他再表演谣曲。喜多八只得到处漂泊。有一天，他又来到桑名。当晚，两位颇有风趣的老人在湊屋旅店下榻，召来一个艺妓。艺妓说她不会拉三弦，却跳了一段《海人舞》。原来艺妓就是按摩宗山之女，名叫三重，舞蹈还是喜多八偶然教会她的。两位老人是恩地源三郎和当代首屈一指的鼓手边见秀之进。他们一看见三重的舞蹈，就知道是谁传授给她的。于是，源三郎吟唱，秀之进击鼓伴奏，叫三重再度表演了一番。喜多八正在小店里饮酒，被鼓声所吸引，来到湊屋门前。宗山的亡灵也闻声而至，喜多八把这个鬼魂压在自己身下，配合室内传来的曲调低吟。

《和歌灯》的结构很别致，写作手法上接近于日本谣曲。作品把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和三年前的往事，交叉着展现在读者面前，情节是按照谣曲“序、破、急”的固定层次发展的。开头（序段）酝酿气氛，接着（破段）介绍情况，最后（急段），全文在迷离恍惚间进入高潮，旋即结束。

吉田精一认为，日本人应当以产生了泉镜花这样一位作家及《和歌灯》这样一部作品而引为自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泉镜花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来，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为强占朝鲜和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作了长期的准备。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那是一场不义战争，当时有些日本作家却跟着那股黑旋风转，鼓吹对外侵略，如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1898），国木田独步在报纸上连载的长篇报告文学《爱弟通信》（1895）等。泉镜花所持的立场则不同。甲午战争

---

见《彼方的文学·文学中的“彼方”》，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编，明治书院1985年版。

泉镜花：《和歌灯·高野圣僧》解说，第249页，新潮社1980年版。

结束后不久，他在 1896 年 1 月发表了《海城发电》和《琵琶传》。《海城发电》的背景是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我国海城。一个日本卫生兵在战争中做了中国军队的俘虏。在拘留期间，他发挥了自己的专长，救死扶伤，因而受到中国军队的表扬，给他奖状，并把他释放了。有个叫梨花的中国姑娘爱上了他，带病跑来找他，被一群在日本军队里打杂的军夫抓住。军夫的头子审问被放回来的卫生兵，说他一定有叛国行为，否则中国军队不会给他奖状。他坚决否认。头子便叫人把梨花带出来，当众将她强奸致死。大家走掉后，在场的唯一的英国记者马上给本国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

日本军队里，有因完成红十字会的义务，由敌人赠与了感谢状，而成为卖国贼的；也有的军夫出于敌忾心而逮住清国病妇，横加蹂躏，而成了爱国者。这是何等尖锐的讽刺。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泉镜花对刚刚露头的军国主义的深恶痛绝，饱含着多么伟大的正义感，也可以看到他的正直是超出国界的。

在《琵琶传》中，正面人物是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逃兵，而作为武士道化身的一个军官则是反面人物。逃兵被枪决，军官则在开枪打死自己的妻子（逃兵的情妇）的同时，被她活活咬断喉咙而死，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在举国上下被卷入战争狂热的时期发表这样同侵略性的国策针锋相对的作品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作者逝世后，岩波书店在 1940 年至 1942 年间出版的《镜花全集》里就未能收入这两篇，直到战后才重见天日。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作家们在继承本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从西方文学流派中汲取养分。二叶亭四迷的长篇小说《浮云》（1887—1890）就明显地受到俄国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夏目漱石则是从英国文学研究家起步登上文坛的，他从西方文学中取得创作经验，写出了《我是猫》（1905）、《哥儿》（1906）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明治维新的任务首先是日本的现代化，移植和吸收西欧的先进文化是十分自然的事，这些外来影响也丰富了日本作家的表现方法，有利于繁荣创作。

泉镜花不同于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之处在于，尽管他精通英文，熟悉西方文学，但从他的作品中却几乎看不出西方文学的痕迹。除了日本传统，他还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他的创作在形式上接近于江户时代的草双纸、净琉璃（创始于 15 世纪的一种用三弦伴奏的说唱曲艺）、谣曲、狂言以及中国的神怪小说。例如，日本评论家田中贡太郎就认为《高野圣僧》可能受到我国唐代小说《板桥三娘子》的启发。正由于这样，有些评论家曾经认为他的作品形式陈旧，将它们列为倾向小说或观念小说。这种小说的特征是：一、反映人生阴暗面。二、露骨地表明作者的主观倾向。

战后，由于美国文化的泛滥，外来语剧增，日语汇的混乱对文学创作起了不利的影 响，开始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在这种形势下，深深扎根于日本文学传统的泉镜花的作品越来越受到重视。村松定孝说，泉镜花“把日本近代文学所陷入的脱离传统的倾向认真地扭转过来，从而开拓出无与伦比的诗境。……他集日本古典传统于一身，开出灿烂的花来”。

泉镜花不侧重心理分析和刻画性格，情节的发展是通过对话和行动来表

---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三，卷二八六，写板桥店女店主给行人吃荞麦烧饼，将他们变成驴的故事。

《泉镜花集》，见《现代文豪名作全集》解说，第 386 页，河出书房 1955 年版。

现的。他的主要弱点在于视野不够开阔，在长篇小说《风流线》（1904）和《续风流线》（1905）中虽然写了工程师水上等人揭露假冒为善的富翁巨山，最后把巨山的宅邸放火烧掉的故事，但人物显得苍白无力，深度不够。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孤独、绝望的爱情至上主义者，总是以失败、自杀告终。他们通常只陶醉在空想世界中，缺乏改变现实的魄力。

泉镜花的创作生涯长达46年，横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家。综观泉镜花的一生，他早年家境贫困，对受压迫的下层人民深深寄予同情，痛恨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黠武者以及剥削成性的资本家。他歌颂了人间真挚的爱情，谴责了束缚弱小的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封建道德观念。他一生所写的小说、戏剧、随笔不下500篇，他的作品保持着优美的艺术风格，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富有神韵和色彩，有些篇章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芥川龙之介说他“为明治大正文艺开辟了浪漫主义大道，浓艳胜似巫山雨意，壮烈赛过易水风光”。他笔下散发着奇光异彩，意趣纷呈，给读者以丰盛的美感享受。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里见弴、川端康成、石川淳等均在文体上受到过泉镜花的影响，他那绮丽的风格至今仍有可借镜之处。

1988年8月

附记：本文原题《泉镜花及其作品》（《读书》1988年9月号），这次收入集子，做了修改。

---

芥川龙之介：《〈镜花全集〉（15卷本）推荐文》，见《芥川龙之介全集》第14卷，第46页。  
《泉镜花集》解说，第395页。



## 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

谷崎润一郎出生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然而少年时代家道中落。1905年他在亲友的资助下到第一高等学校学习，三年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求学期间，他接触了希腊、印度和德国的唯心主义、悲观主义的思想，对人生形成了虚无的享乐的观点。在文学上，又受到法国波特莱尔、美国爱伦·坡以及英国王尔德的影响。他于1910年退学，开始了文学生涯。他在《新思潮》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刺青》、《麒麟》（均1910），以及在《昂星》上发表的《少年》、《帮闲》（均1911）等，均备受唯美主义大师永井荷风的称许。永井在刊于《三田文学》（1911年11月号）的《谷崎润一郎的艺术》一文中，高度赞扬了他的才能。从此，“天才谷崎”的声名大振。

谷崎是一位多产作家，1961年中央公论社以豪华版出版了他的30卷集。其中不少作品早在30年代就有了中译本，如《痴人之爱》（杨骚译，北新版，1928）、《刺青》、《麒麟》、《恶魔》、《富美子的脚》、《二沙弥》（章克标译，开明版，1929）、《梦洞先生》（章克标译，水沫版，1930）、《神与人之间》、《前科犯》、《人面疮》、《春琴抄》（陆少懿译，文化生活版，1936），以及独幕剧《御国与五平》（李漱泉译，中华版，1934）等。

谷崎不但写小说，也写戏剧和电影剧本。创作之余，谷崎还在1934年到1941年之间，先后用了8年的时间从事《源氏物语》的今译工作。战后又花了几年工夫重新改译。日本文学评论家伊藤整说，小说《细雪》就是谷崎翻译《源氏物语》的副产品。

谷崎是以一个艺术至上主义作家走上文坛的，他又受到外国颓废文学流派的影响，所以创作倾向也是颓废的，甚至是他所自称的恶魔主义的。人物心理多属变态，作品里充满了不正常的爱情及性行为的描写。在他战后所写的长篇小说《钥匙》（1958）中，这种倾向更达到了极点，而此书在日本曾风行一时，三年内就印了25版。

在谷崎将近50岁时所写的剧本《颜世》里，一个人物师直有这样一段台词：“人想获得富贵权势、金银财宝，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终归是为了凭着权势和财宝，使天下的美色尽归己有，任意享受……说句老实话，但凡生为男子汉，难道有一个不这么想的人吗？”谷崎笔下的男子大部分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行动的。他们追求的最大幸福就是生活于“女人”的“支配”之下，“像奴隶服侍主子，人类崇拜神一样”来“崇拜”女人。但是这种对女性的“崇拜”，实际上则是把女性单纯看作发泄肉欲的对象，不消说是对女人的践踏。谷崎也自问过：“女子究竟是神，还是玩具呢？……”

这种荒谬的恋爱观不但贯穿在他的作品中，也具体表现在他的生活实践中。在《神与人之间》（1924）的最后几章中，他描写颓废派作家添田把妻子让给了挚穗积。1930年8月，谷崎自己就把曾与他共同生活了18年的妻子千代子转让给诗人佐藤春夫，转年4月和他的学生古川丁未子结了婚。婚后几个月，谷崎夫妇租住了根津太郎的别墅。根津的妻子松子和她的三个姐妹都长得很美，谷崎深为倾倒。1934年3月，他又开始和松子同居。后来他和松子分别与原先的配偶离婚，正式结为夫妻。

谷崎在长篇小说《各有所好》（1928）中写一对夫妇因感情不和，早就打算离婚。但因两人之间已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故犹豫不决。作者以细致的笔触，把这对夫妇复杂微妙的矛盾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

谷崎还写过几篇以杀妻案为主题的小说：《柳汤事件》（1918）、《被诅咒的戏曲》（1919）、《途中》（1920）等。尤其是《途中》，描写侦探通过周密的观察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侦查出一件用诡秘手段杀害妻子的案件，被视为日本侦探小说的滥觞。

长篇小说《颠倒黑白》（1929）的主人公水野是个作家。由于一连写了几篇杀妻的小说，老婆被吓跑了。他又写了以某一编辑为原型的一桩凶杀案。不慎把那个编辑的真姓儿岛透露出去了。于是，一伙歹徒便按照这篇在杂志上连载的小说的情节，杀死了儿岛。然而嫌疑却落到水野身上。故事以水野被捕、即将受严刑拷打而结束。这部作品也从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

谷崎青少年时代曾经历过贫困的日子，因而对小职员的苦难生活深表同情。在短篇小说《小小王国》（1918）中，作者以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外貌丑陋而才智出众的顽童形象，从而衬托出贫病交迫的小学教员的一副寒酸相。这篇小说笔致细腻而不烦琐，刻画有力而不落俗套，是谷崎笔下不多见的一篇揭露现实的作品。

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后，谷崎把全家由东京迁到京都，定居下来。因此，关西的风土人情成为他后半生写作的背景。

谷崎和松子结婚后，松子一度怀孕。但谷崎表示，松子一旦变成一个给娃娃喂奶、换尿布的平庸妇女，他心目中的那个“崇高的女子”的形象就破灭了。为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他劝松子做人工流产。松子忍痛照办了。后来松子从谷崎的日记中得悉，他对此事也深感隐痛。谷崎付出这样一个代价，以松子为原型，写了《盲目物语》（1931）、《武州公秘话》（1931）、《割芦苇》（1932）、《春琴抄》（1933）。

《春琴抄》曾引起巨大反响。作者着重描绘主人公虐待狂的变态心理。仆人出身的佐助在精神上受尽孤傲的盲女春琴姑娘的折磨。她被毁容后，佐助为了在脑海里永远保持她的姣美面貌，竟用针刺入自己两眼的瞳仁，也成为盲人。文艺评论家正宗白鸟高度评价这部作品道：“妙技入神，虽圣人亦无可挑剔。”批评家和小说家中村光夫说：“倘若从我国近代小说中遴选十篇杰作，其中必有此作。”英国文学研究家日夏耿之介曾称誉道：“这是日本民族值得引为自豪的瑰宝，把它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也当之无愧。”

谷崎著作等身，但其代表作当推《细雪》。这部长篇小说的主旨是描述近代社会怎样粗暴地侵犯传统的贵族阶层。这是为即将逝去的东瀛所唱的挽歌。

日本文学评论家伊藤整在《〈细雪〉解说》里认为《细雪》是一部以家族关系为主的写实小说。与《细雪》相近的作品还有宫本百合子的《两个院子》，这是以新的批判精神来描写一个家族的。伊藤整认为《细雪》更侧重的是从心理上描写人和人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细雪》更接近中国的《红楼梦》，是一部杰出的描写家族心理的写实小说。

谷崎在晚年写的《月亮和狂言师》（1949）接近小品，格调明丽，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令人联想到平安时代的随笔，显示出这位老作家不同凡响的艺术技巧。但是从他另外一些作品则可以看出，他年轻时代恶

---

有黎箬的中译文，见《日本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有钱端义的中译文，见《日本当代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魔主义的古态复萌。他在《钥匙》中，刻画了一个因纵欲过度而患脑溢血的老人的形象。1958年，他因患中风，右半身偏瘫，开始采取口述的办法来写作。《梦的浮桥》（1959）和《疯癫老人日记》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疯癫老人日记》自1961年起在《中央公论》上连载，转年5月出版单行本，立即销售一空，同年6月就印到第7版，被认为是1962年日本文坛最轰动的一部作品。谷崎前期作品中的那种颓废、偏重肉欲的描写，在这本书中又成了主要的特点。作品采取一个77岁的老人所写的日记的形式，因此，是第一人称的自述。它集中地表现了谷崎极端享乐主义的一面：追求官能的美，耽于变态性欲的描写。老人与他那个舞女出身的儿媳飒子的关系暧昧。老人患过轻微的脑溢血，他每次接近飒子，血压就会增高。但他还是一有机会就接近她。他生前拓下了飒子的脚印。在遗嘱中，要求把这脚印刻在他的墓碑上。这样，她的脚就可以永远踩着他了。

日本文坛上评论谷崎的文章很多，据文学评论家濑沼茂树在1960年所作的统计，专门评论他的生平和作品的单行本和零星文章就有124篇。伊藤整、正宗白鸟、芥川龙之介、广津和郎、十返肇、龟井胜一郎等作家和评论家都发表过关于他的评论。在日本资产阶级文坛，他被捧为“大谷崎”，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如果明治时期的文学以夏目漱石、岛崎藤村为代表，则大正时期的文学应以志贺直哉和谷崎润一郎为代表。但也有不少评论家指出他脱离政治的倾向。譬如，中村光夫在《谷崎润一郎论》（河出书房1952年版）里就说：谷崎自开始写作以来，一直就与时代背离，他对政治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趣。虽然他有着旺盛的创作欲，但丝毫也没有作为社会的一员的自觉。他接着说：“谷崎的文学是靠艺术上的完善来弥补社会现实性的缺乏。这是我国现代小说的通性，而他则是罕见的例子。但是如果只因为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没有社会现实性，他才能够达到艺术上的完善，那么单从这一点来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绝大讽刺。”

谷崎的汉学造诣很深。他曾在秋香塾攻汉文，十几岁时就能赋汉诗。1918年他只身到我国东北、北京、天津、汉口、九江及江浙等地游历，返国后写《苏州纪行》、《秦淮之夜》、《西湖之月》等。1925年他又来我国访问，在上海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作家结识，回国后写《上海交游记》。在他的中篇小说《鲛人》（1920）中，随父游历中国后又回到日本去的南贞助有这样一段感想：“我已经从中国回来了。我别了那为日本过去文明的祖先和渊源的尊贵的大陆，永久以日本人这样留在这里了。在我眼前的不是幽邃而冥想的北京，却是浅薄而丑恶的东京。……我生长在现在的这个日本——中了西洋主义之魔的日本。我想要从中发现美，可是纯朴的自然到处都给破坏了。在原比中国规模小而贫弱的这个国家的自然中，到哪里去找倪云林的山水与王摩诘的诗境呢？”这无非是因为作者本人对嘈杂的东京感到厌恶，而向往北京的“幽邃”、“诗意”。他还写过一部《玄奘三藏》（1917）。

1957年，他曾在《心》杂志2月号上发表《欧阳予倩君的长诗》一文。欧阳予倩逝世后，他以《忆旧友欧阳予倩君》为题，在日本文化交流协会编印的月刊《日中文化交流》（1962年11月号）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华以后“中日关系陷入了可悲的不幸的状态，日本军阀作威作福，迫害中国人民。我曾经有机会到中国去，但我不愿受军阀利用，更不愿意看到军人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所以再也没有到中国来。……知道了欧阳君逝世的消息，我充满了深切的悲哀。失去了良友，我衷心感到凄凉，谨在这里祈祝冥福。”

谷崎一向反对日本侵华的不义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时，他才8岁。野村尚吾在谷崎润一郎的传记中引用了谷崎关于这次战争的回忆：

关于日清战争，我最觉得奇怪的是，东学党的叛乱分明是朝鲜的事件，日本为什么非要出动军队不可呢？而且为什么要到朝鲜去和中国军队交战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就去问父亲，父亲便解释了一通。“说实在的，父亲的解释太深奥了，我年纪太小，并未能理解。”孩子的朴素的疑问意外地触及了事件的核心。

战后，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唐纳德·金、塞甸·斯帖卡、霍华德·希贝特等均积极翻译谷崎的作品。谷崎在致他们的信中写道，由于国外有这些理解并支持他的作品的人，使他深受鼓舞。英译本又被转译成德、意、法、丹麦、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瑞士等多种文字，译本共达34种，在当代日本作家中首屈一指。

谷崎生前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顾问。由于他对日本文学做出的贡献，他于1949年荣获日本政府授予的文化勋章。为了纪念谷崎的功绩，并鼓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央公论社于1965年创设了谷崎润一郎奖，每年颁发一次。获奖作品有小岛信夫的《抱拥家族》（1965）、黑井千次的《群栖》、高井有一的《这个国家的天空》（均1985）等。

谷崎于1965年7月30日逝世。当天的《朝日新闻》在报道这一噩耗时写道，“谷崎晚年的作品《钥匙》和《疯癫老人日记》尤其表达了这位文豪所达到的炉火纯青的境地，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注意，曾多次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作品。谷崎名副其实地是日本的瑰宝”。又说：“谷崎先生在海外享有盛名，《细雪》、《各有所好》等众多作品均被译成各国文字。……1964年他被选为全美艺术院和美国文学艺术学会的名誉会员，有‘世界的谷崎’之称，获得极高评价。”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现代著名的唯美主义作家。他从事创作达半个世纪以上，跨过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尽管在他的作品中颓废主义占了重要位置，然而他在一定程度上，对所生活的社会也进行过批判。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无疑是卓越的。他是我国抗战前介绍较多的、并对我国有些现代作家（如郁达夫）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一位日本作家。

纵观谷崎漫长的创作生涯，他集日本、中国和西洋的文学素养于一身，在作品中抒发了对人生和美的浪漫主义的憧憬。他不遗余力地探索日本人传统理想之精髓，终于从历史悠久的关西町人文化中发现了日本古典美，执著地加以追求，为后世留下了一些艺术奇葩。

附记：本文系将《日语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1期）上所载同名文章删改而成。

## 新思潮派的芥川龙之介

在比较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时候，鲁迅先生曾做过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

“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的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

用这两段话来形容日本大正时代的短篇小说巨擘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最恰切不过了。他的众多短篇小说，从题材到形式，每一篇都独具匠心，不落窠臼。他经常是以短短的篇幅三两个人物，高度凝炼地表达出主题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时代的某个侧面的本质。以《橘子》（1919）为例。这个短篇共只2000多字。作品中的“我”是个对“庸庸碌碌、百无聊赖”的人生感到厌倦的读书人。故事的情节十分简单。一天，此人坐在一列火车的二等车厢里。突然间，一个买了三等票的乡下姑娘，由于一时糊涂撞进了他的车厢。读书人感到不快，甚至鄙夷，他嫌弃这个才十三四岁的土里土气的姑娘。这时，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从车窗口丢下几枚橘子给到道岔来为她送行的小弟弟们。“我”恍然大悟：“她大概是前去当女佣”的。作者只点了这么一句，但是细心的读者不难推想到：姑娘准是个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佃农的女儿，为了交租子或还债，小小年纪就进城当佣工。在这种景况下，她还没忘记关心自己的胞弟们。正是劳动人民的这种朴实感情使“我”对这位姑娘由鄙夷而肃然起敬了。“我”这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就这么疏疏朗朗几笔，却包含着奇突而感人的内涵。它既写出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空虚苦闷，又刻画了贫苦人真纯的品格。用的是白描的手法，却能引起读者无限联想。

这就是芥川短篇小说的独到之处。他的作品使我们联想到雪舟的水墨画。

芥川龙之介于1892年生在京桥区入船町，原名龙之助，他自己后改为龙之介。父亲新原敏三，经营牛奶业。他生后9个月，因母亲精神失常，即过继给住在本所区小泉町的舅舅道章作养子，改姓芥川。芥川家祖祖辈辈都在将军府任文职，明治维新后，养父在东京府任木土科长。家中生活虽不宽裕，但养父母却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家庭里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艺术气氛。芥川自幼受到中国及日本古典文学的熏陶，他精通汉文，能赋汉诗。上初中后，芥川深受世纪末欧洲文艺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波德莱尔和斯特林堡的作品，对形成他的人生观、艺术观曾起了很大作用。

18岁时，芥川因成绩优异免试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1913年入东京大学英语系。读书期间，成为第三次（1914）和第四次（1916）复刊的《新

---

《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 小引》。

雪舟（1420—1506），日本室町时代后期的画家，擅长画人物、山水、花鸟。

思潮》杂志的同人。1915年发表《罗生门》，但当时并未引起文坛重视。大学毕业之前，在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上发表《鼻子》（1916年2月）。日本近代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赞赏这篇作品“笔端凝重，朴素平易，诙谐自然，情趣雅致；而且材料新颖，立意精辟，构思谨严，令人钦佩”，并预言他“要是再写上二三十篇这样的作品，定会成为文坛上首屈一指的作家”。

同年，芥川的《芋粥》和《手绢》接连问世，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新进作家的地位。大学毕业后，他在镰仓海军机关学校教过三年书。1919年3月入大阪每日新闻社，1921年以该社海外特派员身分到中国十余座城市游览，回国后写了《上海游记》（1921）、《江南游记》（1922）等。

芥川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新思潮派是从日本大正中期到昭和初年，继白桦派之后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又称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通常指第三次或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其代表作家有芥川龙之介、菊池宽、久米正雄和山本有三等人。他们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深受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影响，并得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启发。当这一派作家跻身文坛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已经衰落，起而代之的是白桦派文学。白桦派作家大多出身于上层社会，他们所主张的理想主义，作品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等，都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派的作家们认为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强调题材的多样性，并且十分讲究写作技巧，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他们认真地审视人生，把握现实，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赋予自己笔下的一切以新的意义，并理智地加以诠释。这个流派表现了本世纪初日本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而又苦于无出路的心情，在艺术上则突破了长时期作为日本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文学，正视社会现实，既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又具有现实主义倾向。

在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芥川写了148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以及不少评论、游记、札记、诗歌、俳句等。他的每一篇小说艺术构思上都各有特点，这是由于他在创作过程中苦心孤诣地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他才华横溢，作品文采斐然，机智幽默，精湛洗练。

下面分三个方面来谈谈芥川的创作。

一、芥川早期的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大多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借古喻今，以嘲讽的笔触针砭时弊。其中《罗生门》写平安时代末期，京都一带连年饥馑，一个被解雇的仆人在罗生门下避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去当绿林好汉。正在踌躇不决之际，他看见一个老太婆在拔死人头发，以做成假发出售。老太婆还振振有词地说：那个死人生前专门把蛇肉晒干，冒充干鱼来卖，所以拔她的头发也是活该。仆人悟出一个道理：原来人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他随即剥光了老太婆的衣服，逃之夭夭。作品的寓意在于揭露人剥削人的社会里损人利己的本质。

《鼻子》写老僧禅智内供有个长鼻子，酷似香肠，他苦恼不堪。后来找个偏方把鼻子弄短了，于是心里异常高兴。想不到这下讥笑他的人更多了，弄得他后悔不已。有一天鼻子忽然变得又跟原来一样长了，内供如释重负，暗自思忖道：“这样一来，准没有人再讥笑我了。”鲁迅先生指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

《竹林中》（1921）堪称芥川历史小说的代表作，构思巧妙，笔触简洁，不落俗套，而且寓意深刻，发表后获得好评，已在日本搬上银幕。樵夫在竹

林中发现了武士的尸体。武士那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以及凌辱她的强盗都分别供认自己是凶手，而死者的阴魂则借巫婆之口，说自己是愤而自杀的。樵夫、云游僧、衙役和武士的岳母各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案情提供线索。每个人都能自圆其说，但把七份供词对照一下，便发现此案扑朔迷离，让人摸不着头脑。作者要写的显然不是什么情杀案，作品也不着重于通过曲折情节，发现元凶。芥川在此作中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客观真理是不容易搞清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捏造事实。三个主要人物，只要有一个说的是真话，其他两个便是在扯谎。作者故意留下伏笔，发人深思。

《地狱图》（1918）带有唯美主义的倾向。恶贯满盈的奴隶主为了惩罚一个不肯屈从自己淫威的少女，竟当着其父（老画家）之面把她活活烧死。老画家先是无限悲痛，继而陶醉在艺术幻境里。独生女被焚烧的惨绝人寰的景象恍惚间给予了老画家灵感，他以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在屏风上画出了地狱图。老画家在完成这幅画的次日便悬梁自尽，以死来表示对强权的反抗。

芥川虽然不信神，却对早期的基督教徒所显示的崇高的道德情操非常向往。他写过一些天主教题材的小说，其中《教徒之死》（1918）写长崎的天主教堂收留了一名叫罗连若的少年，他品德高尚，无比虔诚。伞铺的姑娘怀了孕，说娃娃的父亲是罗连若。罗连若因而被逐，沦为乞丐。一日长崎大火，罗连若不念旧恶，为了抢救伞铺一家人，烧成重伤。姑娘遂坦率承认自己冤枉了罗连若，与她私通的是个外教人。罗连若弥留之际，人们才发觉他原来是个妙龄少女。通过这个作品，作者歌颂了宗教信仰所激发的自我牺牲精神。

二、芥川所写的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题材颇为广泛。在很多小说里，他都站在受凌辱的小人物一边，对那些压迫别人、作威作福的歹人加以鞭笞。

《猴子》（1916）通过一桩水兵自杀未遂事件，指出在日本海军中水兵的待遇连猴子都不如，“猴子可以免除处分，人却不行”。《将军》（1920）嘲讽了当时被封为军神的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日俄战争期间，他曾以不惜牺牲大量士兵的战术攻下旅顺口。小说第一节深刻地反映了普通士兵的厌战情绪。尽管当时日本政府对书刊控制得很严，一些关键性的字句已被书籍检查官删除了，但字里行间依然可以看出作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的。

《寒》写一个看道口的值班员，为了抢救一名小学生，自己却被火车轧死了。以身殉职的值班员的尸体上盖着草席，但除了保吉（芥川的化身）外，其他围观的人都一个个无动于衷。“站台上的那些人并不理会保吉的情绪，他们和保吉无瓜葛，脸上的表情好像都很快活。对此，保吉感到十分不耐烦，简直想发脾气。尤其是那些海军军官们，他们旁若无人、扯开嗓门交谈的情景格外使他感到不舒服。”这里抒发了作者对麻木不仁的日本社会的愤慨。

《保吉的札记》（1923）第一节写一个司务长侮辱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乞丐，叫他学狗叫。乞丐先是犹豫，怎奈饥饿难挨，他终于还是牺牲了人的尊严，学了几声狗叫，讨到一枚蜜柑。一星期后，保吉为了替小乞丐报仇，在发薪的时候问司务长：“司务长，我要不要叫一声汪？呃，司务长？”

在这些作品中，芥川对小人物寄予同情的同时，又用对照的手法，对自认有教养的军官、司务长之流的粗暴、虚伪和道德堕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三、芥川晚期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1927年初，发表《玄鹤山房》，通过半封建的家庭内部的纠葛，反映了人生的惨

状和人们的绝望心情，暗示了旧事物的衰亡和新时代的来临。《水虎》（原名《河童》，1927）是芥川晚期脍炙人口的寓言体小说，作者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口述他在水虎国的见闻，抒发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看法。发表后不久，作者就自杀了。作品描写的那个世界当然是虚构的，整个色调颇晦暗，反映出作者当时的精神状态。芥川借水虎国来讽刺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宗教以至风俗习惯，作品对资本家发战争财，士兵受虐待，当权者对文化艺术横加压制等等，予以揭露和批判，鞭笞了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通篇在谐谑中寓有辛辣的讽刺，有些日本评论家认为它可以和《格列佛游记》媲美。1927年4月，芥川通过《文艺的，过于文艺的》一文，与谷崎润一郎就小说写法展开了一场论战。谷崎认为小说必须讲究艺术构思，写得饶有趣味，芥川则强调最纯粹的小说不需要什么情节，它必须达到崇高的诗的意境。《海市蜃楼》就是根据这种理论写成的会心之作，它接近于散文诗，基调极为阴郁。

芥川在遗作《西方之人》中，认为《圣经》是艺术作品，把基督当作古代诗人。这里的基督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他借着对人们的愚蠢感到厌恶的基督抒发了自己的心境。遗作《齿轮》也跟《海市蜃楼》一样缺乏情节，充满了对社会的恐惧感。另一遗作《某傻子的一生》则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探讨现实人生中经历幻灭之后的颓唐和绝望。

芥川具有浪漫主义气质，但在探讨人生方面则持现实主义态度。他越是接触社会，越憎恨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实。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某傻子的一生》），认为“人生比地狱还像地狱”（《侏儒的话·地狱》）。

除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外，国内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也使芥川感到苦闷彷徨。他于1927年7月24日拂晓服安眠药自杀身死，时年仅35岁。他在遗书《给一个旧友的手记》中说，促使他自杀的动机是“对未来的朦胧的不安”。

大山郁夫把芥川比作彼特罗尼奥斯，说他们二人都有着本阶级最高深的教养，也感到了新时代的胎动，却未能跟着时代大踏步前进，因而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芥川龙之介在诗歌方面也颇有成就。吉田精一说芥川“诗作虽不多，但词藻典雅洗练，独具一格，闪耀着在他的小说中所见不到的激情……在俳句方面，他承袭的是芭蕉和凡兆的风格……所作佳句超过乃师漱石，是近代俳句诗人当中的佼佼者”。

芥川在继承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的宝贵经验，再加上他精湛的汉学修养，可以说是将古与今、本国与世界文学的精华融会贯通，从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从不无病呻吟，对艺术总是精益求精。他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对门下的弟子小岛政二郎、泷井孝作、掘辰雄等后起之秀起了极好的作用。

---

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的长篇小说，暴露英国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讽刺当时统治集团的腐败。

大山郁夫（1880—1955），日本社会主义者。

彼特罗尼奥斯（？—66），古罗马帝国的讽刺作家。

吉田精一（1908—），日本文学评论家。

芭蕉（1644—1694）和凡兆（？—1714）均为日本江户时代的俳句诗人。

《日本文学史辞典·芥川龙之介》，藤村作、西尾实监修，第6页，日本评论新社1956年版。



芥川平生同情弱小者，对暴君和黷武主义者则深恶痛绝。他曾这样赞扬过人民大众：“莎士比亚、歌德、近松门左卫门都将消亡，然而生育他们的母胎——伟大的民众，却是永生不灭的。即使一切艺术都泯灭了，必然还会从这母胎中重新诞生。”（《暗中问答》）

芥川辞世半个多世纪了，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中、英、法、德、俄、西、意以及世界语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和芥川同时代的有些作家，写了不少哗众取宠的东西，却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只有贴近现实，贴近人民，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附记：本文原题《芥川龙之介和他的创作》（《日本文学》，1982年第2期）。

## 傲霜的劲松：宫本百合子

今年1月21日，是日本卓越的无产阶级女作家宫本百合子逝世40周年。战后，正当她把文学当作武器为日本人民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时，却因白色恐怖在日本猖獗时期在狱中留下的宿疾转成急性脊髓脑膜炎菌的败血症而溘然长逝。像许多革命作家一样，她也是从一个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具有正义感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发展成为工人阶级作家的。她用自己出众的才智，为日本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她同小林多喜二是日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大先驱，因此，日本进步文学界在她逝世的那一年成立了“多喜二、百合子研究会”，定期出版刊物和召开纪念会。她的作品日益为广大的日本读者所热爱。

—

宫本百合子于1899年生东京。父亲中条精一郎是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工程师，后来自己开了一所营造厂。在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中，他是思想开明的自由主义高级技术人员的代表。外祖父是明治时代的启蒙学者西村茂树（后来成为创办“日本弘道会”的国粹主义者），著述甚丰。母亲毕业于贵族学校，对文学有兴趣，把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全部寄托在百合子身上。百合子在家庭影响下，小学五年级时就将日本古典名著《竹取物语》、《平家物语》、《方丈记》等译成现代语，六年级时曾模仿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源氏物语新释》写了一篇叫做《锦木》的小说。上中学后，她如饥似渴地阅读樋口一叶、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森鸥外等日本近代作家以及易卜生、罗曼·罗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欧洲作家的作品，为日后文学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她讨厌学校的清规戒律，经常旷课去图书馆看书。1916年入日本女子大学英文系后，因为连头发式样都受到干涉，她只读一个学期就辍了学，开始投身文学写作。

百合子从10岁时起，每年都到福岛县开成山的祖母家度暑假。由于受了近代日本文学作品和俄国作品中进步人道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她一向对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抱着深厚同情。在托尔斯泰的《哥萨克》和《哈泽·穆拉特》的启发下，她在15岁时写了中篇小说《农村》。次年又写了《久美和她周围的人》以及《贫穷的人们》。经日本前辈作家坪内逍遥介绍，《贫穷的人们》刊载在当时颇有权威的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1916）上，引起了文坛的重视。她母亲一心希望她能攀上一门好亲事，平步青云。

1918年9月，百合子随父亲赴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旁听生。为了摆脱她母亲在婚姻方面替她所作的种种庸俗的打算，20岁的百合子就仓促地在美国与一个研究古代东方语的日本访问学者结了婚。回国后，丈夫在以上层人物子弟为对象的学习院执教。百合子不久就对这种满足于现状、庸庸碌碌的中等家庭生活感到厌倦了。她在1922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需要有大家同心协力撼动巨石的决心，并且不只是为自己打算，而要追求人类应有的生活。”1924年，她和丈夫离婚。1927年，为了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她与研究俄国文学的汤浅芳子一道前往苏联，住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28年9月，百合子曾与高尔基会晤，她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感到深深的钦佩。1929年5月至11月，百合子到奥、德、法、英

等西欧各国旅游。1930年，与侨居苏联的日本早期革命家片山潜见面。片山劝她留在苏联工作。但她考虑到自己是个作家，脱离本国人民就失去了创作的泉源。她时时刻刻怀念那“有着100万失业者，人们成群结队反抗当局，顽强地进行斗争的日本”。当年11月，她回到白色恐怖下的故土，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共患难。

在苏联度过的三年，对百合子一生的思想、生活和创作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回国后的次月，她就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转年当选为该同盟常任中央委员和妇女委员会负责人。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成立的时候，她被选为中央协议会委员和妇女协议会负责人，并担任该联盟发行的机关杂志《劳动妇女》的主编。1931年秋天，正当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变本加厉地对进步力量进行血腥镇压的时候，百合子毅然加入了当时处于非法地位的日本共产党。

1932年，宫本百合子和日本杰出的共产党员宫本显治结婚。婚后不久，宫本显治就因从事地下工作而被捕，并被囚禁达12年之久。1932年4月至1941年12月，百合子也五次被捕入狱。她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以大无畏的精神捍卫了党，维护了真理。直到1942年7月，百合子才因在狱中患了日射病，生命垂危，被释放出狱，她的身体已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百合子和她坐牢达12年之久的丈夫宫本显治重聚，并和战友们开始公开从事革命工作，除了坚持写作外，还参加了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当年12月底，新日本文学会成立，它是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据点，发起人有秋田雨雀、德永直、宫本百合子等9人。新日本文学机关刊物《新日本文学》次年创刊，卷头刊有宫本百合子的《歌声哟，响起来吧！——新日本文学会的缘起》一文，指出民主文学是每一个人为了推动社会和自身沿着历史的逻辑向前发展而献身的文学。

宫本百合子对我国人民也十分关怀。她曾写信给宋庆龄副主席，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刊登在1950年的日本《妇女民主新闻》上。她说：“你们——革命的领导者们和坚韧的中国人民，至今坚强地忍受了无比的辛酸和重大的牺牲。现在，当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胜利表示衷心的喜悦和友谊的感情时，不能不想起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多么凶暴地妨碍了中国的解放这一事实。但是，中国人民一定会以人民的感情理解，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破坏了日本人民的生活。”

## 二

宫本百合子长达35年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所写的主要作品有《贫穷的人们》、《宫田神官》（1917）和《乘风而来的可洛波茨克尔》（1918）。用百合子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见习时期”。1910年日本作家长冢节的长篇小说《土》问世。这是一部用自然主义手法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在作者笔下，农民似乎是由于本身的愚昧才招致贫困，地主倒是善良的。宫本百合子在《贫穷的人们》中尖锐地指出：“……佃农的孩子还是以佃农终生，这似乎已经成了定律。作父母的好像是为了有人能顶替逐渐衰弱下去的自己，让地主的餐桌摆满丰盛的食品，

---

见《路标》。

才养育成群的孩子们的。”17岁的百合子答应要为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苦农民找到出路，她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忠实地履行了这个诺言。她于1918年所写的《宫田神官》比《贫穷的人们》对现实挖掘得更深了。主人公农民宫田在救了地主婆的儿子一条命以后，反而大难临头。地主婆发现他善良可欺，就用卑鄙的手段霸占了他的田地，害得他家破人亡。作者通过宫田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对日本农民所受到的残酷的封建剥削提出了强烈的控诉。《乘风而来的可洛波茨克尔》所写的是日本作家很少接触到的题材：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伊努族的命运。主人公阿伊努老人依连卡通被他过继来的大和族的儿子丰娃欺凌压迫的情景，使人不禁对迫使日本这个少数民族趋向灭亡的社会制度感到愤慨。

从赴美留学至动身去苏联，是百合子创作生涯的第二个时期。《午市》（1922）、《心河》（1924）、《伸子》（1926）和《一枝花》（1927）均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品。小说的背景从农村转入城市，而作者所关心的依然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命运。当时日本老作家永井荷风所写的一系列反映妓馆生活的《比手腕》（1917）、《五叶箸》（1918）等作品，大多蕴含着缠绵悱恻的色情趣味，在社会上掀起了享乐主义思潮。宫本百合子作为一个女作家，在《午市》中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们寄以深切同情，对公开允许卖淫的社会制度予以鞭笞。在《心河》中，作者以细致生动的笔触和深入的心理刻画，反映了中产阶级矛盾重重的家庭生活走向破裂的过程。《伸子》是百合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她尚未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前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这是百合子的自传体小说。女主人公伸子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和自己选择的男人结了婚。婚后，她发现这种中等家庭的狭隘、闭塞的生活和她所憧憬的辽阔自由的生活完全是两码事。那种苟且偷安的小市民的日子她过不下去，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焦灼和苦闷。几年之后，她终于离了婚，去寻求更充实、更美好的未来。

《伸子》刚问世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战后，日本人民有了记载着人民权利字样的宪法，大家开始理解男女平等的意义。直到这个时候，百合子在20年代写的《伸子》才广泛地获得了各阶层的读者。

日本文艺批评家小田切秀雄写道：“长篇小说《伸子》是大正文学最优秀的古典之一。……它是作者深刻地探讨自己的痛苦经验的成果。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对日本的家庭和存在于婚姻生活内部的种种问题；作者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有所突破、大踏步前进的人物形象，从而把日本近代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与未来结合起来。岛崎藤村的《家》、田山花袋的《生》、《妻》、《缘》，夏目漱石的《道草》，都无比尖锐而真实地反映了日本的家庭内部令人窒息的状况，《伸子》的女主人公却在这样的家庭里，不知疲倦地寻求人生的欢乐，并与阻碍她的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百合子从苏联回国至日本战败，是她创作生涯的第三个时期。不论就日本人民的历史还是百合子个人的经历来说，这都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时期。百合子本人在1946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说：“自1932年春天到1945年10月，我作为一个日本作家，只有3年零9个月的时间能发表作品，其余9年的岁月，过的是狱中生活，而在1938年后的一年半，以及1941年1月起，到撤

销治安维持法的时候为止，又过了漫长的禁止写作的生活。”

但是这个时期，她还是抓紧一切机会和反动统治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写了三十几篇介绍苏联的论文，以及一系列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优秀作品。其中《一九三二年的春天》（1932）和《时时刻刻》（1951）是姐妹篇，均以进步文化人士在警察局的拘留所里和反动政府所进行的斗争为题材。后者写于1933年，但因遭到查禁，直到作者逝世后才发表。短篇小说《小祝一家》（1934）描写生活贫困的小祝一家人参加革命文化运动后逐渐提高阶级觉悟的过程。写于1939年的《那一年》和《杉篱》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时期，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所持的态度。《那一年》原是1月间为《文艺春秋》写的，被内务省删除得面目皆非。作者把它改写后，题作《小纸旗》登在《文艺》（1941年1月）上，战后才恢复原貌第一次发表。小说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本国农村的一片凄凉景象：“大约一年半之内，村里被征去四十余人。有的已经变成遗骨，装在白木匣里送回来了。……应征人数之多，几乎达到挨家挨户的地步。”老百姓对政府发出咒诅，甚至闹水灾，人们都传说“这是在中国打炮太多了，造成的”。当时还没有一个日本作家敢于如此尖锐地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予以抨击。

《杉篱》里描写两个年轻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夫妇情愿过清贫的生活，拒绝到“满洲的什么炼钢公司”工作，为这场不义战争推波助澜。他们绝不“随波逐流”，“不愿如履薄冰，东一脚西一脚地寻求立足之处；冰随时都会破裂，人也就被冲走了”。作品是用极其含蓄的手法写的，在淡雅中潜藏着感情的旋涡和回流。当政府所造的配合侵略战争的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百合子的这篇小说指引了日本人民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面影》和《广场》是作者根据旅苏时的经历写成的。她离国后，日本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迫使百合子的弟弟年纪轻轻地就自杀了。此事使她联想到作家有岛武郎和芥川龙之介也曾自寻短见。这就更加坚定了她返回祖国，与同胞一道为美好的明天而斗争的决心。

战后，百合子进入了她创作生涯的第四个时期，也是她最成熟、最有成果的时期。

日本战败后，根据《波茨坦宣言》，1946年公布了新宪法，规定保障基本人权，保障出版、言论、宗教信仰以及结社集会的自由。百合子及时抓住了战后在日本出现的新局面，写了《播州平野》和《知风草》（均1946）。这两部作品猛烈抨击了侵略战争和治安维持法所象征的法西斯政府蹂躏人权的罪恶行径。

《播州平野》是战后初期日本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所产生的第一部杰作。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失败后，本国也化为一片焦土，社会秩序混乱，人心荒废，整个国家民族茫然若失。在这种状况下，《播州平野》如一把火炬，照亮了日本人民前进的道路。作者以在白色恐怖下始终坚贞不屈的革命者的立场，洞察了历史前进的方向，通过这部长篇小说给人以复兴日本的信心。作品通过主人公横越日本大动脉地区的经历，以清新明澈的文笔写出了战后各阶层人物的动态，并对战争造成的灾难提出了控诉。主人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能够唤起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人们奋发向上。日本绝大多数文学史家均认为这是一部为战后日本进步文学着了先鞭的作品，是战后文学的真正起点。《知风草》是《播州平野》的续篇，写战后日本共产党

的重建活动，以及在长期侵略战争中付出惨重代价的日本人民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主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这两部作品问世以后，以它们的思想 and 艺术力量，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获得每日文化奖。

1948年，作者又发表了《两个院子》。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在《伸子》出版21年后才写的。在这期间，百合子对生活的认识和艺术上的造诣经历了一段成熟的过程。从表面上看，作者在《两个院子》里所运用的手法和《伸子》差不多，不同的是在这个续篇里，作者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标志着作者对社会更犀利、深刻的认识。

《两个院子》里刻划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伸子所生长的那个中上层家庭，一个就是她自己开辟的生活。作品描写了她怎样在时代和社会的波澜中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年轻女子走上革命的道路，把自己从生活环境所养成的羞怯、孤独和自相矛盾中解放出来，走向人类必然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的。

在《两个院子》里，作者成功地刻划了三个日本中等家庭妇女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通过三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妇女和她们的历史命运，写出残喘在半封建的日本社会里的妇女们的反抗。这三个叛逆的女性采取的方式不同，只有女主人公伸子走的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她投身于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争取全人类的解放中，来探求妇女本身的解放。《两个院子》是一部把妇女作为时代和社会的典型，在未来的展望中描述她们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它在明治以来的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百合子时常在作品里写到中国，在《两个院子》里，她又描述伸子参加中国女学生访日代表团招待会的情形。这些女学生那种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的文明国家的迫切心情，使伸子很受感动。看到她们同一个对中国缺乏正确了解的日本评论家进行争论，也使她感到钦佩。她想起前些日子在报上读到的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光复上海的壮举。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中国革命群众大肆屠杀。那以后，在广东等地也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事变。伸子想起了被屠杀的人们当中也有革命的女学生。这时候，伸子所关怀的已不再是个人的小天地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日本国内文学界或日本妇女经济独立的问题了。通过她和中国女学生的接触，她对1927年中国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有所向往。

宫本百合子的许多作品写的都是她个人的经历，但是她所描绘的绝不限于个人的小圈子。她自己就积极参加现实的斗争，活跃在生活的前哨，因而，她所创造的人物——比如伸子，也都是足以反映时代和环境的典型人物。作为百合子三部自传体小说的第二部，《两个院子》写的正是女主人公伸子一生所走的历史道路的转折点。无论为了了解宫本百合子这个无产阶级文学界的巨擘，了解一个日本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或是作为30年代日本中层社会的一幅画像，这部作品都是极其重要的。同时，在《两个院子》和以作者旅苏和游历西欧的见闻为题材的《路标》里，衬托着人类远大而辽阔的前景，作者描绘了日本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对革命坚定不移的信念。百合子本来还打算创作《冬天里的春天》和《十二年》等长篇，一直写到日本战败为止，主题是探求改造社会与改造自我的问题，以及日本人民的觉醒和他们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她已经做了札记，并和人谈过，可惜由于猝然病逝，未能动笔。

### 三

纵观宫本百合子的一生，她自觉地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参加革命活动，走上了一条遍布荆棘、充满牺牲的道路。在日本人民所经历的最黑暗的岁月里，她像一棵傲霜的劲松，巍然屹立，始终保持了高风亮节。自 1936 年至 1951 年间，尽管在她精力最旺盛的十几年，曾不断被捕入狱，写作也遭到当局查禁，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留下小说、文艺理论、政论和杂文等大量优秀作品。

宫本百合子继承了日本传统的语言典雅、笔意含蓄的民族风格，长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善于描写性格，于平淡中见新奇。作者也从西方文学中吸取了创作经验，她早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从批判现实主义出发，创作了富于人道主义色彩的作品。晚期则在日本现代文学斗争和发展过程中经受了实践的考验，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献身于文学事业。她的作品突破了批判现实主义，内容的现实意义和生活气息都比以前加深，笔调简洁朴实，感情深厚，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实属突出的成就。

作者逝世后，她的朋友们组织了“宫本百合子全集编纂委员会”，于 1953 年由河出书房出版了包括 760 篇作品的《宫本百合子全集》（共 15 卷），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58 至 1959 年间出版了《宫本百合子选集》（共 4 卷），收集了她一生中的主要作品。自从本世纪 10 年代《贫穷的人们》问世以来，宫本百合子的作品已影响了几代人，有些篇章堪称日本现代文学宝库里的璀璨明珠。

附记：本文原题《宫本百合子和她的创作》（《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 年第 2 期），这次收入集子，做了修改。

## 记者型的作家井上靖

日本当代杰出的老作家井上靖总是及时地抓住发生在日本社会上的重大政治或社会事件，用小说的形式把它们真切生动地表现出来。15年的记者生涯使他的作品总是紧密地贴近现实，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大多富于社会意义。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井上靖小说全集》（东京新潮社）1974年就已出版到32卷。他的小说涉面极广，日本甲南大学教授永丘智郎写道：“井上靖的功绩，在于他把日本战后经济成长的结果所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毫无遗漏地写进了文学作品。因此，倘若将他的作品系统地介绍到国外去，就能使人借以深刻地认识日本战后的历史。”

战后，日本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过去受军国主义镇压的日本进步力量空前壮大，这一事实曾使美军占领当局大为震动。1949年7月，日本发生了国营铁道总裁下山失踪后被发现轧死在铁轨上的事件。井上靖以这桩轰动全国的事件为主题，写了长篇小说《暗潮》，在《文艺春秋》（1950年7至10月）上连载，令人信服地阐明了下山是自杀的。当时社会上另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舆论，认为下山是被进步力量暗杀的。考虑到那个时期日本还接连发生了三鹰、松川等一系列离奇案件，弄得人心惶惶，井上靖在小说中做出那样的判断，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冰壁》（1957）是井上靖根据1955年1月发生的“尼龙索事件”写成的。若山、石原等三个大学生登前穗高山时，若山因尼龙索折断，坠入深谷身死。制造尼龙索的厂商为了维护自己产品的声誉，不惜嫁祸于石原，硬说是他弄断的，而日本报界也对石原关于若山的尼龙索是自行折断的证言表示怀疑，含沙射影地说是石原为了陷害若山而故意毁坏的。一时社会上飞短流长，若山的父亲甚至威胁要控告石原以杀人罪。

这时，一向捍卫真理、有正义感的井上靖挺身而出，写了《冰壁》。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石原改名为鱼津。这个青年为人光明磊落，和东邦化工厂的董事、工学博士八代的卑鄙自私形成鲜明的对照。断了的尼龙索是佐仓制绳公司用东邦化工厂生产的尼龙制造的。佐仓公司委托八代做了登山尼龙索抵抗冲击的模拟试验，结果尼龙索未断。报纸上大肆宣扬这一消息，鱼津只好哑巴吃黄连。其实鱼津想弄明事实真相，倒不是为了洗清自己，而是希望今后杜绝同样的悲剧。入春后，鱼津进山找到了尼龙索断头，经一位技师检验，证实尼龙索并非是人人为地割断的。但当初抢先散布莫须有的谣言，使鱼津背上黑锅的报界，如今却拒绝发表这个新的检验结果。鱼津心中苦恼，独自去登山，遇到山崩，罹难而死。《冰壁》出版后，日本山岳会副会长、以山岳为题材写过12卷小说的深田久弥称赞道：“作者用登山这一特殊题材写了如此富于魅力和戏剧性的作品，我衷心表示钦佩。”

以上两部作品的情节都是以实际发生的事件为基础的，但作者运用了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方法。由于构思新颖，情节安排得巧妙，他在故事里穿插进去的男女爱情的纠葛，与主线浑然融为一体，写得别致，真切可信，引人入胜。

---

《井上靖的文体》，见长谷川泉编《井上靖研究》，东京南窗社1974年版，第399页。

《东京新闻》，1957年11月20日。



《暗潮》和《冰壁》的创作，既显示了作者的诚实耿直，敢于揭露真相的大无畏精神，又表现出他通过材料的取舍，在情节上以假衬真，从侧面迂回地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的高超艺术技巧。

井上靖曾以公害为主题写过三个长篇。他采取的是一个崭新的角度，不落窠臼。《夜声》（1968）就是其中之一。主人公镜史郎沿着《万叶集》中所咏过的路线漫游，去寻觅一个理想之乡。但由于到处都在大兴土木，伐林筑路，昔日诗情画意的风景早已破坏得面目皆非。这使他怒不可遏，深深地陷入幻灭之中。整个作品是用揶揄的笔调来写的。日本评论家佐伯彰一认为镜史郎是当代的堂·吉诃德。作者本人也在“自白”中写道：“《夜声》的主人公是狂人，我所以选狂人作主人公，是因为惟其是狂人，才能纯真地对现代社会、风土人情以及世态肆无忌惮地加以抨击。主人公狂人出于悲愤，采取行动。他的思考和行动都是单纯而激越的。在《榉树》中，我选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作主人公。主题也是对大自然遭到破坏表示愤慨，却由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地出面来纠正错误，提出改进办法。换言之，在《夜声》中，我叫主人公狂人发泄怨恨；在《榉树》中，则让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用批判的方式表示愤怒。”

《榉树》（1971）描写主人公慨叹榉树以及各种树木被随意砍伐，在他的带动下，成立了“保护榉树协会”。《方舟》（1972）的主人公认为大洪水即将到来，就在琵琶湖畔造起当代的方舟。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这个时代，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真是难以区分。100年前，这个主人公显然会给说成是疯子；但是现在呢，尽管他明明是疯子，我们却不能对他转的那些念头嗤之以鼻。我们所处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

恩格斯曾经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在上述三部作品中，井上靖都没有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倾向”，而让它蕴含在冷隽的客观描写之中，因而思想和艺术的感染力就更为强烈。

在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席卷日本全国的反美爱国斗争的影响下，井上靖还写过以原子弹受害者为题材的《城堡》（1964）。这部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透子一家是长崎原子弹的受害者。她的父母因原子弹后遗症，撇下她和弟弟先后去世。透子从小体质羸弱，身上潜伏着原子病症状。她拚死拚活把弟弟拉扯大了，但始终觉得他们姐弟俩是被囚禁在一座没法逃脱出来的“城堡”里。弟弟成为音乐家，精神上有了寄托。透子呢，虽然爱上了一个考古学家，却由于认识到自己绝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地结婚和生儿育女，便想投海自尽以寻求解脱。最后还是退休老人桂正伸赶到海边来，把她劝阻了。

战后，日本曾有不少以原子弹为题材的作品问世。它们大多致力于赤裸裸地描写原子弹所造成的灾害，原子病所引起的生理上的痛苦以至死亡，其中最典型的是原民喜的《夏天的花》（1947）和大田洋子的《死尸之街》（1948）。井上靖在《城堡》里的写法不同一般，他着重挖掘美国丢下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的心灵所带来的深刻创伤，它使生命中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长篇小说《海魂》原在《世界》杂志上连载，1977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一至三卷。据作者说，1984年他将开始写四至六卷。

---

《井上靖小说全集》，第30卷，东京新潮社1974年版，第463页。

《致敏·考茨基》，见《马恩列斯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海魂》前三卷出版后，获得好评。日本评论家佐伯彰一在《海》杂志（1978年6月）上发表评论《论海魂》，对这部作品给予很高评价。佐伯认为，《海魂》的主人公桑一郎这一代人，是在“日俄战争后成年的，具有日本上升期的开朗和自信，对文明开化与教养，对世界主义怀有强烈的渴望”。佐伯还写道，小说以广阔的日美关系史为背景，出色地写出了日本人在美国的经历，“它为我国现代小说开拓出并达到了新的领域。篇幅同样大、内容同样丰富的作品，也就只有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了。这两部作品的对象、写作方法、结构和题材虽大相径庭，却又有相似之处。故事都是悠然地娓娓讲出来的；光阴缓缓流逝，形形色色的人物以不同的方式度过岁月，身上留下了时间的烙印”。

提起《细雪》，几年前我曾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动手翻译这部日本近代文学名著。但是只译了一万余字，我就打了退堂鼓。原因不仅是原作中京都腔所蕴含的微妙韵味用中文难以表达，更重要的是思想上无法接受女主人公的生活情趣。当译到几位京都女子为了其中一位的日本宽腰带吱吱作响而笑成一团的细腻描述时，我就搁了笔，并接下了该社的另一选题：井上靖的长篇小说《夜声》和《道路》等五个短篇。

相比之下，《海魂》的视野广阔多了。作品是以日美两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为背景，描绘日侨在美国八十多年的经历。作者巧妙地把主人公桑一郎的生活、工作和恋爱交织起来，写得饶有兴味。就时间而言，他从1869年日本东北地区的农民第一次迁移到美国，一直写到1948年。桑一郎是以作者的舅舅为原型写的。井上靖在短篇小说《弃老山》和《道路》中均写过这位舅舅，他晚年失掉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带着妻子回到日本，死在家乡。

随着桑一郎的足迹，作者忽而把读者带到京都、奈良，去欣赏日本古代佛教的建筑和雕塑；忽而又引到伊豆半岛乡间，去观摩富于地方色彩的狮子舞等神乐表演。就连对美国的风土人情，作者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搜集素材。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去年我曾有机会在美国依阿华、纽约、圣迭戈、旧金山等城市逗留七周，接触了当地的一些老华侨和日侨。虽然作品写的是几十年前的事，当几位日侨讲述他们的家史时，也印证了《海魂》所反映的情况的真实性。我不得不对作者概括现实、塑造典型的高超的艺术手法感到钦佩。

这部长篇小说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作者通过桑一郎及其同窗鬼怒田的眼睛，反映了日本北陆道的小镇金泽几乎挨家挨户都有人在日俄战争中充当了炮灰，从而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穷兵黩武政策给本国人民带来了何等深重的灾难。

井上靖作品的题材非常广泛，除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他还写了不少历史小说。仅以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而论，他笔下的人物就有画家、记者、公司经理、职员、企业家、掮客、奸商、学者、教师、学生、医生、拳击家、老板娘、少奶奶、登山运动员、流浪汉、司机、农民、工人、士兵、考古学家、作曲家，几乎包括社会上的各种类型，其中有不少纯朴可爱的人物形象，写得有血有肉。作者善于通过渲染意境来烘托时代气息，人物呼之欲出。

井上靖语言丰富，驾驭文字的能力非常强，小说既富诗情，又有戏剧性，

---

见《井上靖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见《夜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同时还具备通讯报告的科学态度和准确性。日本最近还出版了一部《井上靖文学语汇辞典》，收集了他的作品中对人生、爱情、命运、大自然等各方面的语录。

三十几年来，井上靖通过自己那些具有强烈社会性和现实感、民族色彩颇为浓郁的作品，描绘了一幅幅日本人民生活的图景。正由于他能够十分精炼地形象地概括历史上和当代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他的作品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的过去和现实的生活。

井上靖于 1907 年生在日本北海道旭川町。幼年时曾寄养在故乡静冈县祖母家里，这段生活使他认识到日本的农村社会。大学毕业后，他在每日新闻社大阪总社编辑部先后负责宗教、美术等栏，并撰写佛教经典的解说和美术评论。他还经常到日本古代文化发源地大和以及京都采访。15 年的记者生涯给他提供了广泛接触社会现实的机会，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素材，为他日后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他在动笔之前，总还是要大量查阅资料，并做实地调查。他的写作态度十分谨严，一丝不苟。

井上靖曾多次获得日本文学奖。他有 20 来部小说已被改编成电影。1964 年他被推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1973 年他的故乡静冈县建立了井上靖文学馆。1976 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同时被推选为文化有功人士。他又是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笔会会长，是中国人民多年的老朋友，是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建有井上靖文学碑、井上靖文学馆。据不完全统计，英、法、德、苏、意、芬、波、罗、捷等国都先后翻译出版了井上靖的主要代表作。他的小说已译成中文的有《天平之薨》、《井上靖小说选》、《斗牛》、《夜声》；此外，《敦煌》、《楼兰》、《冰壁》、《射程》等作品的中译本也将相继问世。我们相信，井上靖在文学创作上还将有惊人的建树。

1984 年 3 月 20 日

附记：井上靖已于 1991 年 1 月 29 日去世。本文系《海魂》译本序，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年 8 月版。

## 松本清张与社会派推理小说

早在江户时代（1603—1867），通俗的大众文学便在日本风靡一时。井原西鹤就曾仿效我国宋朝桂万荣的公案小说《棠阴比事》，写过一部《本朝樱阴比事》（1689），成为日本侦探小说之滥觞。他的“浮世草子”（社会小说）《家计贵在精心》（1692）和式亭三马的“草双纸”（通俗绘图小说）《浮世澡堂》（1812）都是当时家喻户晓之作。

在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时期，大众文学一度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文学。那时，日本正兴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占优势的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纯文学。直到1935年直木奖（大众文学奖）创立后，通俗文学才在日本奠定了位置，从而得到了长足发展。于是，有写武侠的，有写历史的，更为风行的题材则是家庭伦理及凶杀侦探。其中，层次较高的属50年代出现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因为这种作品不但以情节取胜，并且能揭示剖析一些生活黑暗面，从而起到了改革现实的作用。松本清张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杰出的创始人。

松本清张生于1909年，只念过八年书，主要靠自学和深入生活获得渊博的学问和文学素养。1950年，他以历史小说《西乡钞票》走上文坛。接着，又以《某小仓日记传》荣获日本纯文学奖——1953年度的芥川龙之介奖。然而他的最大成就还在于在《点和线》（1957）和《零的焦点》（1959）等作品中，运用推理手法，剖析日本现实社会的矛盾，从而开辟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道路，在日本大众文学领域里独树一帜。他的作品不仅题材广泛，风格新颖，更是大胆地反映生活阴暗面，探索现代日本社会一些消极现象的症结所在。他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生动的庶民语言，以表达人物的特征。他运用纯文学的创作方法，着重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刻画，把作品的趣味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地位。战后，由于松本清张等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以娴熟的艺术手法写出了引人入胜的大众文学作品，日本文艺评论家、大众文学研究会会长尾崎秀树认为，“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相互靠拢，两者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大众文学作家松本清张和宫尾登美子的作品具有较高艺术性。现在，我们应当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划个等号”。

《日本的黑雾》（1960）、《深层海流》（1961）和《现代官僚论》（1963）这三部是松本清张最富特色的推理小说，并都曾获得1963年度的“日本新闻工作者协会奖”。

《日本的黑雾》是作者对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冤案或暴行事件，逐一进行细致的科学分析写成的。问世后，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黑雾”一词，成了流行日本全国的口头禅。在《深层海流》里，作者把焦点放在日美议和后的日本政界黑幕上，尤其着重写为了接替美国占领军总部的情报机构而设立的“内阁调查室”。《现代官僚论》则暴露了官僚机构和官僚行政的内幕，描绘了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作品在《文艺春秋》杂志上连载时，有人曾担心这会影响到松本清张那位作为外交

---

见钱稻孙的中译本，《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见周作人的中译本，《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尾崎秀树、李德纯对话：《关于日本大众文学》，见《日本文学》，1986年第3期。

见小田切进等著《战后日本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官的女婿的宦途，但他本着作家的良心，还是义无反顾地将他所了解的政海黑暗揭示出来了。

1965年，我把《日本的黑雾》译成中文，当年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紧接着又译了《深层海流》，但由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搁就是20载，80年代才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接受。1985年我作为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赴日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转年6月，就在我回国的前几天，我和文艺春秋社出版部副主任藤井康荣女士一道去访问了这位资深老作家。请他为《深层海流》中译本撰写序言。他当场令人取来纸笔，为我写了序言。他笔迹苍劲，一挥而就，完全不像是出自年近八旬的老人之手。序言中说：“这部小说（《深层海流》）是用撰写《日本的黑雾》时所采访到的另一些素材写成的。虽然是小说，却取材于同一范围，因而没有一处是虚构和杜撰的。”正因为这两部书的素材根据的都是真人真事，所以写法上比较接近我国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作者敢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这充分显示了他的胆识。

在不少作品中，松本清张提出现代人最关心的问题：什么是产生罪恶的社会根源？他写了一些畸形人物，反映出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日本社会中，种种灭绝人性的现象：诸如谋财杀害亲夫以便嫁给情人的荡妇（《奔跑的男人》），为了贪图巨额保险金而处心积虑杀掉妻子的汽车推销员（《离家后发生的案件》），经过周密计划把放高利贷者暗杀后，成功地逃脱了罪责的面馆老板（《奇妙的被告》），生怕女管理员揭露自己搞同性恋的隐私，从而杀人灭口的女招待（《指头》）；还有女儿弑母案，因为那个做母亲的不但害死了患病的丈夫，还和女婿勾搭上了（《新开地的案件》）。这些作品，气氛阴森，情节紧张，并充满悬念。作者把犯罪动机与环境的影响结合起来，写出利欲熏心或精神上的空虚所造成的后果。

1983年5月，作者初次来华访问，曾赴福州、西安、兰州等地游历，还在北京与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作协副主席冯牧就文学问题交换了意见。当时松本提出：“文学首先应该写得饶有趣味，说教腔只会使读者厌倦。”对他来说，趣味只是吸引读者的一种手段。他更着重于挖掘促使人们犯罪的社会根源，探讨罪犯的心理状态。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发展，小林多喜二等作家创作了思想性较高、广大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日本文学评论家平野谦认为，“松本清张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理想在战后的体现”。另一位已故文学评论家伊藤整也认为，松本清张“成功地揭露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完成了无产阶级文学自从昭和初期以来想完成而未完成的使命”。

纵观松本清张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他始终高瞻远瞩，视野广阔，写出了一部又一部具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到1984年为止，文艺春秋社已出版《松本清张全集》56卷，几十年来，他的作品持续以最大的发行量风靡日本全国。曾有评论家称誉他为“日本的巴尔扎克”。记得几年前我在东京向他辞别时，他就曾表示：“只要活着一天，就争取多做一天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进入80年代后，我国出版的松本清张的长篇推理小说中译本已超过10部，中短篇的数目也不少（如《真与假》、《菊枕》等）。他的自传《半生记》也已翻译出版。松本清张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日本作家之

---

伊藤整：《纯文学能存在下去吗？》（《群像》，1961年11月）。

一，他的作品对于我国通俗小说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附记：松本清张已于 1992 年 8 月 4 日去世。本文原载《文艺报》  
1991 年 6 月 1 日。

## 五味川纯平和他的《战争和人》

五味川纯平（1916—）原名栗田茂，出生于一个侨居我国大连的日本商人家庭里。1936年入东京外语学校英文系。在校时因参加“唯物论研究小组”而被捕。在拘留所里关过两个月。1940年毕业后，又来到我国东北，在昭和炼钢厂任职。1943年被征入伍，在穆棱附近构筑阵地时，适逢苏联对日宣战。日军溃败，五味川成为逃兵，在敦化附近被俘，在苏军的俘虏收容所里呆了40天后潜逃。1948年被遣送回国。他曾这样谈自己早年的经历：“满洲事变开始的时候，我正上初中三年级，开始有了社会意识。战争结束时，我虚岁二十九，性格已经大致形成了。这期间，没有一天不曾发生事件、事变、战争。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与其说是从战争年代中生活过来的，毋宁说是靠战争吃饭的。……尤以我是在满洲生长的。父亲替陆军当承办商，日俄战争后立即赴满洲，直到战败才回到日本本土。我上初中之前，对自己所看到的成年人（父亲周围的那些人）的一言一行，当然不理解。但其中大部分人身上都散发着战争的气味，都是一些纯粹靠战争吃饭的人。……制造今天的历史的绝大多数人，即使是间接的，归根结蒂也都是协助过那次战争的。我必须从自己的角度重新评价那次战争，才能向前迈进。”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五味川于1956年8月至1958年8月之间撰写了一部以中国东北为背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及其在东北地区的罪恶活动为题材的长达六卷的小说《作人的条件》。

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南太平洋连吃败仗的1943年初。日本青年知识分子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搜刮中国人民血汗而经营的一家钢铁厂的职员。他写了一篇有关殖民地劳务管理问题的论文，获得帝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为了和他所爱慕的美千子结婚，并且逃避兵役，他到煤矿里管理劳务。作品通过被抓来在矿里做苦工的中国人、大学助教王享立对梶的批判等情节，写出根毛被迫协助侵略战争时的内心矛盾。梶反对矿山里的恶霸工头古屋。当日本宪兵杀害中国矿工时，他挺身而出，制止了宪兵的暴行。于是，他被剥夺了“免服兵役”的特权，押往东北北部边境去了。这时，他又勇敢地反抗军队内部的压迫，从而遭到迫害并坐了牢。日本投降后，他在逃亡的路上，为了自己活命，接连杀害苏军哨兵、中国民兵和老百姓。他终于被苏军所俘，在俘虏营里尝尽了重劳动和饥饿的痛苦。在那里，被俘人员照例恢复为原在日本军队的等级制度，流氓分子桐原杀死了一个年轻士兵。梶把桐原揍了一顿，将他丢进厕所，自己就从俘虏营逃跑了，后来他沦为乞丐，在原野上冒着严寒流浪，终于死在大雪纷飞的东北荒野上。

五味川在《作人的条件》的序言中，说他在这本书里“企图探讨在某种情况下作人的条件”。1958年2月，他向《朝日周刊》编者发表谈话，说他撰写这部小说是为了“清理一下战争期间自己的亲身体会”。

作者在这部作品里，试图创造一个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是通过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来表现这一主题的。但主人公梶的反抗是建立在强烈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上的。他否定一切权力，除了他自己外，对任何人一概都不信任。因此，尽管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他也做过一些仗义的事情，但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他就可以做出像杀害无辜

---

见《图书新闻》，1965年9月4日。

的中国老百姓那样的事。

这部作品被视为日本战后出现的战争文学的代表作。日本评论家臼井吉见强调梶是现代英雄，说他“有理智，在极端困危中始终保持着‘人的尊严’”。另一评论家尾崎秀树认为《作人的条件》的主人公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五味川“在梶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也深深打上了作者本人经历的烙印”。

1965年至1981年间，五味川纯平的长篇巨著《战争和人》问世。全书共18卷，长达200余万字。小说以日本大财阀伍代一家的发展史为经，以日本军国主义在昭和年代的侵略扩张史为纬，用叙述史实的手法，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一直写到1945年日本投降。与日本统治集团全面扩大侵略战争的历史交错，描写了五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伍代由介是新兴的伍代财阀的家主，伍代公司总经理。他坐镇东京，派他的胞弟乔介窜到我东北，设立了伍代运输公司。乔介雇用一批流氓、走狗，打着经营运输业的幌子，肆无忌惮地干着偷运鸦片的勾当，并进行恐怖活动。他与关东军的强硬派串通一气，搜集政治情报，参与各种阴谋活动，企图凭借武力扩张伍代家族的实力，从而成为“满洲伍代”的实力人物。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沈阳郊外的柳条沟附近炸毁了满铁的火车，并反诬中国军队蓄谋挑衅。于是发生了所谓“满洲事变”，即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战争爆发后，“死亡商人”伍代家大发横财。由介的计划是首先开设炼铁厂，然后一步步地打进关内。他还把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大儿子英介也派去。

伍代财阀家的次子伍代俊介是全书的主人公，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是个关心社会、同情贫苦工人的进步青年。他13岁上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就不同意他的叔叔乔介的这个主张：“如果张作霖军队使住在满洲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遭受威胁，就采取让关东军出兵解除张作霖军队武装的强硬手段。”俊介说：“人家不是本国军队吗？……又没有跟日本宣战，凭什么解除人家的武装呢？”乔介训斥他道：“你心肠这么软，必将被赤色分子所利用。”俊介后来还与有革命思想的穷画家灰山浩一来往密切。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占领了东北，还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华北以至大半个中国。1939年，俊介再也无法逃避兵役。他被征入伍，参加了诺蒙坎战役。他曾死里逃生，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再度被抓去充当炮灰。

通过这部作品，作者提出这样一个课题：个人在战争中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像俊介这样一个人，尽管他不要战争，却不得不被卷进去，成为侵略军的一员。

这部作品的构架基本上是按照史实写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却是作者自己设计的，气势宏伟，展现了大规模的艺术图景。活跃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的中日各阶层的众多人物中，塑造得最成功的是伍代家的兄弟姐妹四人和他们周围的男女青年。五味川纯平写小说的手法是通过情节描写人物，他不大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作人的条件》和《战争和人》故事生动，有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在日本颇为畅销，并均拍成了电影。

关于罪恶的侵华战争，由于众多的日本人民也被迫或受骗参加，并遭到灾难，因而在战后，大多数人总想在大梦初醒后寻求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

---

《五味川纯平文学入门》，见《作人的条件》（下），第334页，河出书房1973年版。  
昭和元年为1926年。



于是，战争文学便应运而生。然而由于作家的世界观的局限，那些蓄意为帝国主义的罪恶进行辩解的作品自不用说，就连五味川纯平这样对侵略战争抱反省态度的作家，其作品也难免存在缺陷。《战争和人》中，对某些举世皆知的历史事件，却做了片面的描写。关于济南事件，作者竟然说什么日本出兵山东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大肆渲染山东人民屠杀日本侨民的所谓暴行。

作品尽管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南京等地大举屠杀当地和平居民，以及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中国土地上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大量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均有所揭露；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描写卢沟桥事变后，冀东保安队在通县杀死日本居民的场面。作者还用荒谬的逻辑替日本士兵烧杀、抢掠中国人，强奸中国妇女的禽兽行为辩护，说这些士兵是用每张一分五厘的明信片征集来的。他们的地位还不如军马；说既然日本士兵受到非人的待遇，他们也不可能把被侵略国的人民当人看待。

然而总的来说，在《战争和人》里，作者还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罪恶，反映了法西斯统治下中日两国人民的痛苦生活，以及日本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反抗情绪。这部长篇巨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场的一幅历史画卷，它一幕幕战争场面和生活情景，绘声绘色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可以说是战后在日本出现的众多战争文学中集大成的作品。

五味川纯平于 1978 年因患喉头癌，割除了声带。四年后，替他与外界沟通的爱妻，又患急病去世。但他不曾被重重不幸所压倒，仍以非凡的毅力，笔耕不辍。

今年适值“九·一八”事变 60 周年，这部长篇巨著的中译本的出版，可以帮助读者重温一下这段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从而进一步加强我们奋发图强的努力。

1991 年 10 月 14 日

（《战争和人》译本序，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 用作品揭露侵略者罪行 ——具有良知的日本女作家三浦绫子

在我接触过的日本作家中，再也没有比像北海道的三浦绫子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更深恶痛绝的了。

1982年10月，正当我国舆论界为了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而哗然的时候，三浦绫子曾给我写来一封信，并寄来一本当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绿色棘刺》。信中说：“我是有意把日本对贵国犯下的罪行穿插进去写的，虽然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此书的中译本已于1987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今年正值太平洋战争结束50周年，本文想重新回顾一下这位具有良知的日本女作家这部力作的深远意义。《绿色棘刺》的时代背景是70年代中叶的北海道旭川。主人公大学教授康郎今年50岁，儿女均已成家，有个可爱的外孙女。他生活优裕，有自己的漂亮楼房。但战争的阴影总是缠着他。儿媳妇夕起子长得很像他的头一个妻子绯纱子。绯纱子和康郎同龄。她是停战前一天，因所乘的船只触地雷而葬身海底的。

全书的高潮在最后一章：《殉难碑》。这一天，康郎陪着中国评论家张平德教授从旭川驱车20多公里去参观“中国人强制押送事件殉难碑”。康郎是历史学家，因此，1972年建立这座殉难碑时，有关方面还征求过他的意见。1975年旭川市的出版社出了一本关于此事的书，康郎也参与了写作。当张教授提出要去参观此碑，有人请他去作向导时，他就一口答应下来，还把儿媳妇夕起子也带去了。

然而，当芦别岳险峻的山容隐隐约约展现在遥远的南面时，自然景色越是秀丽，康郎心里越感到痛楚。悲惨的往事像走马灯一样浮现在他的脑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南京大屠杀为首，日本在中国犯下了不胜枚举的残杀暴行，而且还不限于在中国大陆，甚至在日本国内多处也犯下了惨不忍睹的暴行。有一桩就发生于旭川近郊东川。

当时，随着战火的扩大，凡是全须全尾儿的，几乎都被驱赶到战场上去了，因而国内男劳力奇缺。卡车和公共汽车司机统统由女人来顶替了，但煤矿和土木工程仍急需补充男劳力。东条内阁就于1942年11月27日制定了强迫中国劳工来从事苦役的方针。当时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为岸信介，大东亚殖民事务大臣为青木一男，财政大臣为贺屋兴宣。

还明文规定：“华工除由经过训练的俘虏与投降的士兵中挑选之外，并可通过招募来补充。”

实际上被绑架来的华工竟有50开外的，其中还包括普通的市民等非战斗人员。而且在文献纪录中，公然把拉伏的办法说成是“猎兔”，甚至沿用了过去拐卖人口的招数。据说像捕鸟一样，把网向群众撒去，凡落入网中的，一古脑儿捕捉了来。

这些被押送到东川村的中国人，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挖贮水池。流经东川村的忠别川，发源于大雪山，但冲过溪谷的激流，水温太低，不适于农田灌溉。必须把这股河水先引入贮水池，待水温上升后再用以灌溉农田，不然就指望不上稻米增产。这个贮水池工程是将一般水田深挖1.8米而成，作业并不算十分艰苦，但因饥寒交迫，仅仅一年半的施工期间就有88个中国劳工

累死了，达总数 338 名的四分之一以上。当时，在日本全国，这样强制押送去的华工达 38935 人，其中死掉的有 6830 人，去向不明的为 88 人。这个数字足以说明，他们曾受过何等残酷的私刑。做工时，日本工头不停地用八号粗钢丝抽打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挖掘河床时，浑身浸泡在水里，冻得瑟瑟发抖。在严寒地区干活儿，连手套也没有，打赤足，趿拉着一双草鞋，简直令人难以生存下去。据记载，私刑致死者也不少。

回想到这里，康郎抬头一看，只见漫长的山冈绵亘东西。左前方是大雪山，晶莹耀眼，眼前展现着低缓的山坡，簇生着落叶松的一片幼苗。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迫害中国人的情景又兜上康郎的心头：

9、10 月间，中国人被分成两批悄悄地在夜里用卡车强制押送到这里。从中国动身路上就死掉 15 人。9 月底，北国已寒气袭人，中国人穿的却是单衣，大多数人因营养不良而出现浮肿，还有好几个人冻掉了手指。

汽车开到面积约五公顷的贮水池跟前。水蓄得满满当当，蓝天和山上的绿树倒映其中。

康郎向张教授低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那时这里的强制收容所和工地，是用高墙圈起来的，墙上还装了铁蒺藜。窗子安着木栏杆。几个特务科的警官每周轮流在出入口担任警卫。专门镇压政治运动的特别高等警察被派来监督。动用私刑和苦役是司空见惯的事。中国人有在工地上累死的，也有病死在窝棚里的。死后在沟里放上好多天，才一批批地抬出火化。

张教授问道：“附近的老百姓，知道实情吗？”

陪他们来的高原教授立即说：“即使不用高墙隔开，那时候的日本人也不会对敌国人的死表示同情的。战争使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人性。”

康郎说：“假如我们日本人真正懂得做人的道理，就一定能觉察出高墙内的工地上正发生着多么严重的事，并起来反对。事实上，这里把人当作虫豸那样，周围任何反响都没有，这就是问题严重之所在。”

高原深深地低下头去说：

“张先生，很惭愧，这就是战争时期的日本精神。”

车子继续向东驶去。淡红色的虾夷山樱衬托着蔚蓝的天空，美不胜收。康郎却无心欣赏绮丽的景色。他只是惭愧地想着：为什么日本人的心那么残忍呢？否则怎么会屠杀这么许许多多无辜的生命呢？

车子终于开到殉难碑跟前。花岗石的殉难碑竖立在墓地入口处，墓地上排列着几十块墓石。殉难碑的基石长约 6 米，宽约 4 米。石碑再大，也无法抵消当年这些中国工人所受的苦难，然而能使人感到建碑者在良心上所受的苛责。张教授登上石阶，凝视着殉难碑。然后闭目低头，默哀片刻。他此时此刻心中起伏的思绪，如何沉痛，是可以理解的。康郎与高原相视会意，俯首默祷，夕起子在他们身后，恭恭敬敬地合十膜拜。张教授转到碑后，诵读碑文。三个人随着他一齐读了起来：

中国人强制押送事件的殉难烈士长眠此处。这次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罪行之一。具体经过如下：根据 1941 年 11 月内阁决定，在政府机关以及军方的直接领导下，把中国人强制押送到日本国内，使其在 135 处事务所从事劳役，以致造成众多中国人死亡。

1944 年有 338 人被押送到此地，在与江卸发电所的建厂有关的贮水池工地从事苦

役。包括押送途中，短期内共有 88 人殉难。贮水池作为提高忠别川水温的设施，至今仍灌溉着东川町和旭川市的良田。

我等国民作为日本国的主人，对于中国国民由衷地表示谢罪，吊慰此地殉难烈士之灵，并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矢志阻止军国主义复活，实现日中友好，确保日中不再战，确立两国人民永远的友谊与和平，特立此碑为证。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

中国人强制押送事件慰殉难灵碑

建立委员会（村桥久保撰文）

读毕，张教授问康郎，这些殉难者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分别为多少岁。康郎说，从 53 岁到两个 17 岁的少年。张教授恸哭起来，并且说：“这两个少年当中的一个是我弟弟。”

三天后，康郎带着怀有身孕的夕起子去散步。这位儿媳妇说，那天去瞻仰了一趟殉难碑，她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下子我才真正懂得了生命有多么重要和宝贵。爹，人生下来绝不应该是为了杀人或被杀，而应该是为了和睦相处。”

夕起子接着又说：“当我肚子上的娃娃生下来后，我迟早一定得跟他谈话，人是因为什么才出生的。我要带他到那座殉难碑前，从小就教导他，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应该打仗。”

去瞻仰殉难碑那天，夕起子的食指被灌木丛中榎木的棘刺扎伤了，当康郎问她疼不疼时，她说：“疼，有点儿化脓了。不过，这毕竟只是榎木的棘刺，比起人心上的刺儿来，算得了什么！”

一句话点明了全书的主旨：战争已结束了几十年，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却依然没有愈合。

三浦绫子 1922 年生于日本北海道旭川市，战后因发觉自己受了蒙蔽，教了小学生不真实的东西，愤而辞去教职，从此开始了创作生涯，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告诉读者什么是真正的爱国心，呼吁日本人民不可重犯过去的错误。她那真挚的、炽热的激情很是感人肺腑。我相信，只要有三浦绫子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作家在，只要有支持这样的作家的广大读者，日本就不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亚洲和平的前景就是光明的。

（原载上海《文汇报》1995 年 6 月 11 日）

## 山崎丰子和她的使命感

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女作家辈出，尤以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随笔《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为佼佼者。本世纪下半叶又涌现了大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以致有些日本评论家惊呼“这是平安朝的再现”。山崎丰子便是她们当中杰出的一位。

这位当代著名的女作家于 1924 年生在大阪一个经销海带的商人家庭。1944 年毕业于京都女专国文科后，入每日新闻社文艺部，在井上靖领导下工作。

凡是记者出身的作家，在作品中往往对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社会问题必然至为关切。日本文坛巨擘井上靖是如此，在他手下当过记者的山崎丰子也是如此。他们的作品均有深邃的思想内涵，大胆地干预生活，起到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

1957 年山崎丰子以自己出身的家庭为题材写了《花帘》。次年又以《花帘》获直木文学奖。它描写女老板多加惨淡经营曲艺场，为之奋斗终身的故事。接着，她又以一泻千里之势，手不停挥，写了《哥儿》（1959）、《女人的勋章》（1960）、《女系家族》（1963）、《花纹》（1964）、《白色巨塔》（1965）、《续白色巨塔》（1969）、《浮华世家》（1974）、《不毛地带》（1976）、《两个祖国》（1983）等长篇巨著。《女人的勋章》已于 1985 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这部小说反映了日本服装设计业的内幕。生于大阪富商家的小姐式子有设计服装的天分，却缺乏社会经验。她被心毒手辣的商人银四郎逼得寻了短见。作者对听凭男人宰割的日本妇女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由《浮华世家》改编的电影《华丽家族》，曾在我国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中译本于 80 年代初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这部长篇小说揭露了金融界尔虞我诈的腐朽现实。主人公阪神银行经理万俣大介利欲熏心，为了吞并别人的产业，不惜迫使自己的长子企业破产，以致自杀。他再也想不到，正当他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他的女婿美马却在幕后与永田大臣紧密勾结，策划吞并他的银行。作者在后记中特别说到她是通过“无数次采访”，才了解到“银行同政界、官界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白色巨塔》最初发表于日本《每日周刊》上，长达 20 个月的连载期间，曾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响。单行本出版于 1965 年，四年后续篇问世。小说通过某大学医学院的医疗事故和围绕着外科主任教授的选举活动所展开的一场复杂斗争，暴露了日本医学界的矛盾。此书已由王维平等译成中文（译林出版社，1994 年 9 月版）。

《不毛地带》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战后在西伯利亚被拘留 11 年之久的日本旧陆军作战参谋壹岐在西伯利亚回国，被卷入到一家外国飞机公司向日本执政党首脑行贿案的纠葛中去，反映了日本财、政界勾结的黑暗侧面。《两个祖国》描写了日裔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厄运。

山崎丰子的新作《大地之子》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在中国的一个日本战争孤儿的经历，自 1987 年 5 月起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为了写这部长篇小说，作者不止一次到我国采访，足迹遍及好几个省份和城市。1984 年 11 月 2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组放映她带来的《白色巨塔》录像，笔者也应邀前往观看，并参加了座谈会。

山崎丰子虽已年届花甲，却仍显得很年轻：乌黑浓密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敏捷的动作，在女性的端庄娴雅中蕴含着刚毅豪爽之气。她支持有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说作家必须有使命感，要敢于笔伐恶势力。那天偶然听到的一件小事，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接待她的我国某单位给她派去的一名口译人员，第二天就被她打发回去了；换了一个，也只干了两天。第三个才中她的意，和她一直合作得很好。原来她需要深入群众采访调查，倘若译员不是跟她一样认真热情，反应敏捷，是难以胜任这份差事的。

在文学上，山崎丰子私淑有胆有识的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石川的作品，倾向性鲜明。他在《活着的士兵》（1938）里揭露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屠杀我国无辜百姓的暴行，因而被日本军部起诉，判了徒刑。刊载此作的那一期《中央公论》杂志也被禁止出售。山崎丰子曾于1965年拜访过这位老前辈。关于《活着的士兵》一事，石川达三对她说，作家只要手中拿着笔，就应当具备起码的勇气和社会责任感。

石川达三已于1986年溘然长逝，但山崎丰子这样的作家接过前人的火炬，仍在一部接一部地创作着富于时代感的社会小说，也足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老前辈了。

（原载《日语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4期）

## 探索罪与罚问题的远藤周作

远藤周作是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1923年生于东京巢鸭。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毕业于上野音乐学院小提琴系。1926年，因父亲工作的关系，举家移居我国大连。他的哥哥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他则因成绩不佳，经常受其他孩子欺负，在他家帮工的一个中国少年一直袒护他。可惜他于1979年重访大连时，虽然当年住过的那座房子还在，却没有找到他念念不忘的那个善心的童年伙伴。

他幼时，母亲每天都练小提琴，一练就是数小时。严冬，提琴的弦勒破了手指，鲜血直淌，使他意识到艺术这条路是艰苦的。

他从小擅长讲故事，母亲便鼓励他长大了当小说家。

1933年，父母离婚，远藤和他哥哥跟着母亲回国，投奔住在神户的姨妈。在姨妈的影响下，母子三人都受了天主教洗礼。远藤当时只有10岁，不喜欢上教堂，但是由于爱母亲，他始终没有放弃宗教信仰。他进大学后，母亲因患心脏病猝然逝世。当时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1949年，远藤毕业于庆应大学法文系。次年7月，到法国里昂大学去研究法国现代天主教文学。他是日本战后头一个到海外去的留学生。根据这个时期的经历，他写了《在法国的外国学生》。这篇小说发表在《群像》（1951年9月）杂志上。这是他最早的一篇小说。1953年回国后，因短篇小说《白人》获得第33届芥川奖（1955年上半年），从此开始了文学生涯。

《白人》写一个法德混血儿在法国里昂市沦陷期间出卖自己的灵魂，为纳粹秘密警察效劳。他强奸了一位修女，企图套出一个从事抗德运动的法国神学院学生杰克的口供。尽管天主教是严禁自杀的，杰克生怕自己会为了拯救那位修女而情不自禁地把抗德组织供出来，迫于无奈，咬断舌根而死。主人公肉体和精神上的变态，阴暗的、兽性的本质，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小说也从各个角度揭露了纳粹的残暴。

1946年，麦克阿瑟在给住在美国亚特兰大南部的浸礼会会长利斯·牛顿博士的信中写道：“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在战争中变成一片空虚，所以目前是向日本人宣传基督教的良机。倘若美国的基督教领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就可以完成一场精神革命，它在发展文明方面将带来可喜的变化，会超过任何经济的、政治的革命。”他还写道：“日本若不成为基督教国家，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1946至1949年9月，共有2187名传教士来到日本。

远藤周作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走上文坛的。他在一系列作品中探索了“罪与罚”的问题。他的代表作《海和毒药》（1957）以战争期间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解剖八个活着的美军俘虏为题材，获得1958年度新潮社文学奖和每日出版文化奖，并于1986年搬上了银幕。

小说的艺术手法别具一格。在第一章的“引子”里，搬到东京郊区来的“我”请一位在附近开业的脾气古怪的内科大夫胜吕给打气胸。由于偶然的机，他晓得了原来胜吕曾参与F大学医学院解剖美军俘虏事件。主犯是个医学教授，已畏罪自杀，另外六个大夫均判了重刑。胜吕等三个医士罪行较

---

鲇川国彦编《麦克阿瑟书信集》，日本弘报社，1952年。

雷伊·穆尔编《天皇读 圣经 的日子》，讲谈社，1982年。

轻，各判了两年徒刑。

在正文中，作者细腻地刻画了医士胜吕、户田，护士上田信参与解剖事件的病态心理，以及事后的犯罪意识。户田试图狡辩，说这次解剖俘虏是为了取得临床经验，有助于治疗成千上万结核病患者，俘虏可谓死得其所。但他未能说服胜吕。

在短篇小说《架着双拐的人》（1958）中，远藤进一步探讨了人的犯罪心理，并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提出控诉。作品以50年代末期的东京为背景，写一个34岁的男子突然患了两腿僵直病，走路离不开双拐。经过精神分析医的多次诊疗，病人终于回忆起一段往事：这个姓加藤的病人当年曾在华中的一座小村子里杀死过一个无辜的中国年轻农民。当时农民的老母含着满腔愤怒盯视着他的这一暴行。加藤感到内疚，精神受压抑，便在十几年后患上这么个怪病。倘若医生能够告诉他，威胁他的这种罪恶感是毫无意义的，那是战争期间奉上级命令而为，不能怪他，也许就能消除他的病根。然而那位姓菅的医生是个耿直的人，他认为精神分析医不是神，没有权利宽恕这样的罪行。在一个下雨天，他把病人打发走了。

据远藤说，这是以他的一个当大夫的朋友诊治过的病人为原型的。

当然，并非每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兵都会像加藤这样忏悔自己的罪行。出现在《海和毒药》“引子”里的加油站老板，就大言不惭地告诉一个在澡塘中萍水相逢的人，自己曾在华中杀过中国人。他还说，住在附近的那个开西服店的，原先是宪兵，在南京干过残酷勾当。战后，这些家伙都若无其事地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了。

按照天主教教义，用脚踩基督像意味着叛教，构成大罪。封建幕府时期，统治日本的将军下令禁止天主教，强迫教徒踩基督像，违者处以极刑。远藤在长篇小说《沉默》（1966）中，与传统教义唱了反调。主人公葡萄牙神父罗得利各由于不忍心看到日本的教徒们被处死或受酷刑，就踩了基督像。这副作品旨在阐述人有赎罪的可能性。作者心目中的神，不是对软弱无力的人进行审判，并严厉地予以谴责的凶神，而是宽恕人、安慰人、以慈悲为怀的神。作品获得了第二届谷崎润一郎奖。

远藤的作品中影响较大的还有长篇小说《我所遗弃的女人》（1969）。战后初期，女主人公光儿离开农村，到东京谋生。半工半读的大学生吉冈玩弄她后，把她遗弃了。她被误诊为患了麻风病，被送到麻风病院隔离起来。后来查明不是麻风病，她却情愿留在医院里为病人服务。有一天，上街替患者兜售鸡蛋，死于车祸。到1982年为止，这本书印了28次。光儿可以说是日本旧式女子的一个典型：她非但对抛弃了自己的吉冈毫无怨艾，弥留之际还在呼唤他的名字。

远藤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白昼的恶魔》（1980）中塑造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新型日本女子的形象：精明强干，任意玩弄男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冷酷而卑鄙自私，与光儿形成鲜明的对照。此人姓大河内，是个医术高明的美貌女医。她的精神完全没有寄托，进教堂已有半年光景，也找神父交过心，但毫无裨益。她在一个靠救济金过日子的老妪身上做实验，验明某种治癌的新药对肝脏不会产生副作用后，再给病人吃。有个富翁被治好，答应每年捐款给医院。大河内不但未因在活人身上做实验而受惩罚，主任大夫反而在她的婚礼上大大表扬了她对医学的献身精神。她的丈夫是个大钟表店的少东家。婚前，她叫丈夫写了个字据，同意让她为所欲为。



远藤在《白昼的恶魔》中处理的是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这个主题。他在近著《丑闻》（1986）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探讨。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姓胜吕，是个65岁的小说家，曾写过一些宗教题材的作品，使年轻读者受启迪。一天，他去参加文学奖颁奖庆祝会，由于他已出了名，不论在街上，或走进咖啡馆，都众目睽睽。友人和前辈无不劝他自爱，既然已有了今天的地位，可不要做出什么蠢事，拆自己的台。

但就在人们致贺词时，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然而形容委琐的男子，却浮现在他眼前。于是他想，说不定在天主教作家这张脸后面，隐藏着他的“另一张脸”。

这当儿，产生了流言蜚语，说这位作家有外遇。一个专门写黄色新闻的记者便盯他的梢，想剥下他的外皮，揭露丑闻。记者并不是捕风捉影，那“另一张脸”确实存在，只不过那是主人公的“化身”，沉溺在罪恶世界中。

远藤在《狐狸庵轻狂日记》中写道，狐狸庵是他给自己起的外号。作为远藤周作，他在书斋里读书写作；作为狐狸庵，他于1971年组织了一个叫“树座”的业余剧团。该剧团曾到纽约公演，场场满座。他们把《蝴蝶夫人》和《茶花女》的情节穿插在一起，远藤本人扮演为茶花女看病的医生。1986年5月到伦敦公演，由英国电视台拍成电视。

远藤还于1984年创办日本电影艺术学院，自任院长。他聘请著名评论家尾崎秀树和女作家平岩弓枝等人当讲师。

远藤在评论方面也有所建树。他在《诸神与神》、《天主教作家的问题》（均1947）等文章中探讨了宗教和文学的关系这一问题，将日本的传统文化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欧洲的精神文明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并把日本的泛神论和西欧的一神论作了比较。他还发表了《武田泰淳论》（1949），并出版了《堀辰雄论》（1956）等。

远藤是一位多产作家。讲谈社出版的《远藤周作文库》收录了他的纯文学作品12卷，中间小说27卷，评论、翻译、戏曲6卷，随笔、游记9卷，共54卷。

所谓纯文学，是内容比较严肃的，远藤的宗教题材的作品都属于这个范畴。中间小说介于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也可以说是艺术质量较高的通俗文学。远藤的《傻瓜先生》（1959）、《丝瓜君》（1961）等作品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被列入中间文学。

远藤博览群书，知识面广。他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找到创作题材，是因为他熟悉各阶层的人物，善于探索人们复杂的心理活动，用浓墨重彩加以刻画。例如在《札过》（1979）这个短篇里，作者以倒叙手法，描写一个犹太血统的天主教修士在日本备受歧视，回德国后，被纳粹关入达豪集中营，代难友受罚而死。据作者说，这是真人真事。这样一桩别人听了也许会忽略过去的事，远藤却以他生花之笔，写成一个长篇——他的近著《女人的一生》的主题。第一部以长崎为背景，深刻地反映了战前日本天主教徒的遭遇。虽然不是写他母亲的身世，女主人公却是以她为原型的。第二部分别以二次大战期间的日本和德国为舞台。主人公修平，一半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柯尔贝神父则是《札过》中的那个绰号叫“老鼠”的传教士。作品探讨了日本的传统精神同以信仰基督为核心的欧洲有什么差异以及天主教能否在日本扎根的问题。他除了描绘长崎的风土人情以及教徒生活的侧面外，还以抒情的笔调，着重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三十几年来，远藤周作以敏锐的洞察力剖析了生活在过去和现在的日本社会中的人们的隐微心理，写下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作品。由于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除了担任日本笔会会长，他还于 1980 年被推选为艺术院会员。

1987 年 3 月 8 日

附记：远藤周作已于 1996 年 9 月 29 日去世。本文系将《远藤周作和他的作品》（《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 年，第 3 期）修改补充而成。

### 三岛由纪夫和他的四部曲《丰饶之海》

世界文学史上偶尔会出现这种特殊现象：一个在艺术上卓越的作家，在政治上却是反动的，例如为墨索里尼捧过场的意大利诗人邓南遮及美国诗人庞德。多产作家三岛由纪夫就是日本现代文坛上这样一个例子。通过作品，他不断宣扬对毁灭、流血、死亡与自杀的沉迷，并在《忧国》（1960）、《明日黄花》（1961）和《英灵之声》（1966）中，美化法西斯军人。他叫嚷：“必须复兴日本的传统，尚武和武士的传统”，还宣称：剖腹自杀是“死的美学的极点”。最后，为了煽动人们挺身而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他按照日本传统方式当众剖腹。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他于1925年生东京，原名平冈公威。其祖父曾任桦太（即库页岛，现名萨哈林岛）厅长官，父亲曾任日本农林省水产局局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和祖母一道过的。祖母夏子出身名门，经常带他去看能乐和歌舞伎的演出。后来他之所以能写出日本古典戏曲《近代能乐集》（1956），并在《春雪》（1965）中反映没落贵族的思想感情，是和这位祖母的熏陶分不开的。他6岁入学习院初等科，12岁升中等科。1938年，在学习院《辅仁会杂志》上发表第一个短篇《酸模》。他是个早熟的作家，16岁时，即以三岛由纪夫的笔名在《文艺文化》（1941年9—12月）上连载中篇小说《花儿怒放的森林》。1944年毕业于学习院高等科，由于成绩名列前茅，天皇奖赏他银表一块。同年10月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次年2月应征入伍，但因军医检查有误，当天就被遣送回乡。

1946年6月，经前辈作家川端康成的推荐，三岛在《人间》杂志上发表小说《烟草》，遂登上文坛。转年11月大学毕业，就职于大藏省银行局，不出一年就辞职，成为专业作家。他著有21部长篇小说，80余篇短篇，33个剧本，以及大量散文，其中有不少曾被译成欧美多种文字。他曾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作品有10部被改编成电影，36部被搬上舞台，7部得过各种文学奖。影片《忧国》是他根据自己的小说自编、自导、自演的，上映后，创造了最高票房收入的新记录，在1965年的“图尔短篇电影节”上获第二名。其主题是把剖腹自杀作为武士道精神予以肯定。主人公年轻军官武山因不愿奉命去讨伐“二·二六”事件中的叛军而剖腹自杀，新婚的妻子也陪他自刃而死。

“二·二六”事件给予三岛的影响是强烈的。他曾写道：“‘二·二六’事件的挫折，确实使一位伟大的神死去了，当时我是个年仅11岁的少年，只是朦朦胧胧地觉察到这一点。然而在12岁的多感年龄迎接战败之际，我意识到当时的神的死亡这一可怕残酷的实感，与11岁的少年时代所觉察到的，似

---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充当军国主义的吹鼓手。1926年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邓南遮成为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受到墨索里尼的奖赏。

庞德（1885—1973），美国诗人、评论家。由于政治思想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罗马电台每周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宣传，攻击罗斯福领导的美国的作战政策。1943年被控为叛国罪。1958年由于同情者的呼吁，取消其叛国罪的控告。

“二·二六”事件是发生于1936年2月26日的日本法西斯军人武装政变事件，企图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由于军阀集团内讧，政变于29日被平息。但其后执政的广田内阁使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乎息息相关。”

三岛对战后日本的现实十分不满。他感到：“照此下去，日本的文化、传统，将从意识上被破坏”，“应该考虑发动一次昭和维新”。1967年和1968年，他曾率领30多名右派学生去自卫队受训，并以“三岛小队”为基础，成立了由100多名“私兵”组成的“盾会”，自任队长。1970年11月，在东京举办了“三岛由纪夫展”，这个由照片组成的展览是三岛亲自安排布置的。展览结束后，他们21日率领“盾会”的四名会员，占领了离东京闹市不远的自卫队驻屯地的总监室，从阳台上向1000名自卫队队员发表演说，抨击日本宪法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禁止日本重新武装的条款给日本人带来了耻辱，企图煽动自卫队哗变。因无人响应，遂按照日本传统方式剖腹自杀。

三岛在预先写好并广为散发的《檄文》（原载《产经新闻》1970年11月26日）的最后部分写道：“我们要使日本恢复日本的本来面目，然后死去。……我们是由于深深期望具有非常纯粹的灵魂的各位作为一个男子汉，一个真正的武士而醒悟，才采取这一行动的。”

此事曾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尤斯纳在《三岛或空虚的幻影》一书中说：“倘若有一朝一日反动的国家主义革命在日本取得胜利，哪怕是暂时的，‘盾会’必将成为其开山鼻祖。”小说家井上光晴在《未能发表的 三岛由纪夫之死 和 何谓保卫国家》一文中写道：“不管怎样看，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也是污浊的。太平洋战争末期，我们曾陪一位朋友——即将出击的特攻队员坐了几个小时。我无论如何也忘不掉他那副语无伦次的样子，苍白的脸抽搐着，嘴唇发干。把以精心布置的舞台为背景而剖腹的三岛由纪夫，同那在‘保卫天皇’的吆喝声中被迫充当炮灰的青年这两者之死相比较，我感到极其焦躁和迷惘。我不得不联想到‘为了天皇陛下’而在战争中被杀死的成千上万丈夫、兄弟和儿子的悲惨命运。……三岛曾大言不惭地说：‘我毫无保留地否定战后天皇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这一举动。我甚至为此对天皇本人怀有反感。’究竟三岛由纪夫心目中的天皇和天皇制是什么样的呢？倘若他如愿以偿，凭着自卫队的武装暴动修改了宪法，地地道道的天皇制得以复活，那么日本和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人，将会落何下场呢？”

三岛死后近20年来，随着日本国力的迅速增长，他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为他的同胞所提及，也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注意。美国记者伯恩·伯鲁马在《纽约时报杂志》周刊（1987年6月7日）上发表《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一文，提到日本“精神运动”的领导人铃木邦夫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着极端民族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照片。该组织出版了一种叫作《光复》的月报，其目的就是要夺回已经失去的东西：纯洁的日本精神。三岛逝世15周年时，英国记者亨利·斯托克斯在《消失了的武士——战后日本的萎顿的灵魂》（日

---

见《英灵之声》中所收《“二·二六”事件和我》，河出书房1966年版。三岛曾说，他在两件事上对裕仁天皇感到不满。一是天皇下令镇压“二·二六”事件，二是1946年1月1日天皇发表了《凡人宣言诏书》，否定了天皇的神性。

玛格丽特·尤斯纳（1903—1987），法国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诗人。1980年当选为法兰西院院士，是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位妇女。《三岛或空虚的幻影》一书于1980年由葛利玛尔出版社出版。

引自涩泽龙彦的日译本，第83页，河出书房1982年版。

见《三岛由纪夫》文艺读本，第139页，河出书房1975年版。

译文见《朝日周刊》杂志 1985 年 12 月 6 日、13 日)一文中指出：三岛的目的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他正是因为对战后日本人萎靡的精神状态感到忧心忡忡，为了唤醒国人而自杀的。倘若他死后有知，看到由于日本取得了成功而带来大和民族主义的复活，他必然感到无比欣慰。

《丰饶之海》是由 4 卷连贯性的作品所组成，被誉为三岛作品的“顶峰之作”。前 3 卷《春雪》、《奔马》、《晓寺》分别出版于 1965、1967、1968 年，第 4 卷《天人五衰》“最终回”原稿是在作者剖腹自杀的当天上午交给出版社的。三岛曾多次说，《丰饶之海》是他的毕生事业。

系列小说《丰饶之海》从日俄战争一直写到 70 年代初，本世纪发生在日本的重大历史事件差不多都涉及了。作者用佛教轮回转生之说，将没有血缘关系的四代人联系在一起，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同时也写出了各个时代的特征。《春雪》无疑是 4 卷当中艺术性最高的。尤其是第 3 章中用庭园的美景来烘托人物的美，第 12 章中，主人公清显和聪子乘人力车去赏雪的场面，写得情思隽永，令人联想到《源氏物语》及《枕草子》中某些段落。说明作者不仅受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也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清显从小养尊处优，长成一个既任性自私，又优柔寡断的人。他明明知道早在青梅竹马时期就认识的聪子对他一往情深，但当他随时可以把聪子娶到手时，却不屑于承认自己爱她。待到聪子迫不得已和亲王正式订婚，并获得天皇敕许之后，为了尝禁果，他才去和聪子频频幽会，致使她怀了孕。正如他的挚友本多所说：“你一开始就去跟权力和金钱都奈何不了对手去较量。正因为那是不可可能的，你才被迷住了，对吗？倘若是可能的，就视之如瓦砾了。”（《春雪》第 38 章）日本评论家田中美代子认为：“他的悲惨命运并非像罗密欧和朱丽叶那样不可避免地来自外界，而是他自愿地招致和选择的。”这一卷以聪子打胎后削发为尼、清显心碎而死结束。

本多是贯穿四部曲的次角。他是唯一掌握轮回转生这一秘密的人，而当事人勋和月光公主，却至死被蒙在鼓里。第 2 卷《奔马》的主人公勋是作者最钟爱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他本人的化身。勋是在血腥的环境中长大的。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逐渐促使日本去扩大侵华战争。1932 年 2、3 月间，民间的右翼团体“血盟团”与青年军官合谋，先后杀害了前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的首脑人物团琢磨。5 月 15 日，一帮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学员又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尤养毅首相。勋便纠集了 20 名志同道合的小伙子，策划“昭和维新”，目的是暗杀一批要人，实行天皇亲政，维护皇道尊严。事泄被捕，但获释后，他又采取单独行动，刺杀了财界巨头藏原，随即剖腹自尽。勋暗杀藏原的场面令人联想到 1960 年 10 月 12 日 17 岁凶手山口二矢刺杀前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情景。山口事后也自杀。事实上，三岛曾公开称赞右翼少年山口是个“非常优秀的人”。

《奔马》通篇宣扬“日本精神”，武士道色彩最浓。勋代表着以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为国策的政府当局所刻意培养出来的军国主义少年。

在第 3 卷《晓寺》中，三岛借年近半百的本多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勋的死，迫使本多从中反省到了所谓纯粹的日本究竟是什么。除非否定一切，甚至否定现实的日本和日本人……除非杀人之后自杀，此外还有什么真正同

日本共存亡的道路呢？任何人都担心害怕，不敢说这话，而勋不就是舍身来证明这种看法的吗？……想起来，民族的最纯粹的要素，必定有血腥气味，必定有野蛮的影子。”（第2章）值得深思的是，本多用以形容勋的“年轻的日本精神在那么孤立的状态下进行战斗而终于自行灭亡……”（第2章）这句话，恰恰可以用来描述三岛本人。

在《晓寺》上半部中，地点转到 罗，时代背景是 1940 年，日本已与德、意缔结了三国轴心同盟，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东南亚。这在小说中也有所反映。第 10 章中有这样几段描述：

分店经理谈了本多不在期间，曼谷人心的恶化。他说：由于英美巧妙的宣传，这里的人对日本怀有恶感，还是多加小心为好。隔着车窗可以瞥见，街道上拥挤着一群群以前不曾看到过的老百姓。

这里谣传日本军队很快就要从法属印度支那打过来，各地的治安情况也不好，所以大量的难民拥到曼谷来了。

在曼谷，本多遇到了幼小的月光公主，偶然瞥见她的左边侧腹上有三颗黑痣，从而知悉她是由清显——勋——转生的。

下半部以战后初期的日本为背景。月光公主已成长为 18 岁的大姑娘，只身到东京来留学。本多从钥匙孔里偷看她与庆子（本多的女友）搞同性恋的场面，再度看见那三颗黑痣。果然，她回国后，20 岁就被毒蛇噬死。

最后一卷《天人五衰》以 60 年代末叶至 70 年代初为背景。倘若说清显献身于恋爱，勋追求武士道，月光公主则至少也还有肉体美。《天人五衰》的主人公透却说得上是战后在日本出现的“愤怒的一代”的变种。年近八旬的本多发现这个孤儿身上有三颗黑痣，也没有调查清楚月光公主的死的日期和他的诞辰，就把他过继为养子。他对本多百般虐待。庆子从本多那里了解到轮回转生的秘密，便当面戳穿了透是冒牌货，指出他完全没有 20 岁就死亡的迹象。透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自杀未遂，双目却失明了。

第 4 卷的末尾与第 1 卷的末尾遥遥呼应。60 年前，不论本多还是清显都未能见到刚刚削发为尼的聪子。如今年过八旬的本多重访月修寺，终于见到了出家 60 载依然保持着绝色美貌的聪子。阔别经年后，本多与老尼进行了一番禅语般的问答。老尼坚持说，她根本没听说过清显一名，并问道：“本多先生，你果真在今世见过这个清显吗？你现在能够斩钉截铁地说，我和你以前确实在这个世界上见过面吗？”

这下子可把本多闹糊涂了。他说：“假若清显君压根儿不曾来过世上，那么勋也不曾来过，月光公主也就不曾存在了。……而且，说不定连我都……”

老尼说：“这就要看您怎样去领悟了。”

本多感到迷茫，觉得此刻与老尼会晤，也成了虚虚实实的事。

最后引用一段玛格丽特·尤斯纳所做的《丰饶之海》题解作为结束。她写道：“这个题名原出自开普勒 和第谷·布拉埃 时代的占星天文学家的古

---

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和占星家。

第谷·布拉埃（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逝世前他把自己一生观测天文的资料赠给他的学生和助

老月理学。‘丰饶之海’指月球中央那片广漠的平原。该平原跟月亮这整个卫星一样，是既没有生命也没有水和空气的一片沙漠。此题名一开始就鲜明地表示出：促使那四代人依次活动的一连串沸腾的众多计划，以及与之针锋相对的计划，骗子获得成功，真实遭到破坏，到头来是一场空，也就是虚无。”

日本的文艺评论家松本鹤雄说，三岛的文学特征是：“日本浪漫派精神、贵族情趣和对王朝文化的憧憬的结合，转化为天皇神格化。”通过三岛这部巨著，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怎样试图恢复武士道精神，又是怎样借艺术形式来宣扬他这一反动观点的。

1988年10月15日

（《春雪·天人五衰》译本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12月版）

---

手开普勒，为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创造了条件。

见《三岛或空虚的幻影》，第55～56页。

## 在暧昧的日本

### ——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明治维新后，富于进取心的日本民族大力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本人也历来重视智力投资，培养人才。由于教育普及，文化水平较高，从人口比例而言，能写作的自然也就多了。作家们要么精通外语，要么通过日译本，广泛地阅读过各国文学作品，吸收西方各种文艺思潮，从而开阔了视野。他们在继承古典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时地写出散发着奇光异彩、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作品。

1994年10月13日，大江健三郎继川端康成之后，以《个人的体验》（1964）和《万延元年的足球赛》（1967）这两部长篇小说成为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然而当日本文部省即日召开紧急会议，表示要把文化勋章授予他时，他却在报纸上撰文，声明自己是“战后民主主义者”中的一员，文化勋章对自己来说不合适，从而毅然谢绝了。拒绝接受由天皇在皇宫颁发的这一体现国家最高荣誉的奖章，这在日本确实是破天荒的惊人之举。

大江年仅10岁时，适逢日本投降。他问老师：“大人们说要废除天皇制，是真的吗？”老师立即对他拳打脚踢，还把他的母亲叫来，狠狠地训斥了她一顿。大江生长在被原子弹污染了的土地上，他的长子又偏偏是个弱智儿。这样，他在作品里一方面对核武器发展以及日益严重的公害对人类生态所构成的威胁充满了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对残疾人表示了关切。

1960年5月，大江作为日本文学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我国，在北京慷慨激昂地做了支持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广播演说。回国后，大江以持刀杀害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少年山口二矢为原型，写了《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这两个短篇小说，均于1961年1月发表在杂志上。由于后者涉及天皇制的部分激怒了日本右翼势力，刊载它的《文学界》立即受到恫吓，被迫在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公开赔礼道歉。这篇具有时代意义的小说，至今未能收入大江的文集。

1994年10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对大江健三郎的授奖评语中说，他之所以获奖，是由于他在作品中“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生命与神话凝聚在一起，构成一幅当今人类困境中惶惑不安的图画”。当年12月10日，在授奖仪式上，评委会主席又指出，大江的作品“充满着崭新的观点和简洁的意象，有着诗一般的‘怪诞现实主义’。……在常常变形的众多人物和事件之中，最终呈现为纯粹的人文主义者形象，我们一切都关心和为之感动的形象”。

在授奖仪式上，大江以《我在暧昧的日本》为题发表讲话。他认为当年川端康成在获奖时所发表的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接着，他就在“暧昧”一词上大作起文章。他指出：“我觉得，日本现在依然在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在亚洲地区，……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指出，日本人“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染上了历史的污垢”。

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为《万延元年的足球》。这部长篇小说以四国的山峡森林为背景，写出了都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的矛盾。作品融知识、激情、梦幻与野心于一炉，入木三分地描绘了在混乱的世界里人与人的关系。日本评论家松原新一认为，大江的基本主题是把个人从“内在的地狱”中解救出来。

大江的长子光生于1963年，是个患先天性脑障碍的弱智儿。大江为之悲痛至极，根据亲身感受写了《个人的体验》。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因爱子患有残疾而闷闷不乐，自暴自弃，但终于醒悟过来，打起精神尽做父亲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探索，他和妻子已奇迹般地把先天不足的儿子培养成一位有成就的作曲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总把他个人的体验与民族及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

去年适值日本投降50周年，大江健三郎在美国《纽约时报杂志》（1995年7月2日）上发表了题为《否认历史导致日本无能》一文，一针见血地抨击了日本政府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不认罪的态度。文章指出：“日本要想在21世纪的亚洲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基础，使本国既能批评邻国，也能听取邻国的批评。为此，日本必须为其侵略行径道歉，并作出赔偿。这本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大多数有良知的日本人对这一点业已达成共识，然而竟遭到保守党派、政府官员和工商界领导人所组成的联盟的反对。……”

文章作者痛心疾首地说：“我的残疾儿子每遇到新的困难，我的家人和我就都热情地帮助他进行康复治疗。日本和日本人必须致力于亚洲的康复。在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在现代化达到顶峰的侵略战争中，我们丧失了成为亚洲一部分的权利，我们一直是在没有重新获得这种权利的情况下生存着。”“不进行这种康复治疗，我们就永远不能放弃我们对邻国所采取的暧昧态度，也不能消除我们与他们之间在关系上的不实在感。如果说我相信这种感觉可以消除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我预料到政府的态度会发生重大的改变，而是因为我发现，真正的反省已悄然而又深深地蕴藏在老百姓心中。”

美国文化批评家弗·詹姆逊认为：“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最尖锐的社会批评者，从来不认同日本官方的和传统的形象。”

1968年川端康成获诺贝尔奖时，已年近古稀。身体一向孱弱的他，在过多的荣誉面前感到吃不消了。获奖后，在传播媒介面前不断曝光，他的创作欲反而衰退了。三年多的期间只写了三篇无甚新意的短篇小说《长发》、《竹声桃花》和《偶田川》以及几篇随笔，就于1972年4月口含煤气管与世长辞了。

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获奖时是59岁。这位少年时代在日本四国农村的山谷森林中，浴着南方的骄阳长大的战后民主主义作家，精力充沛绝伦。获奖后的繁忙社会活动并没影响他于1995年把长篇巨著《燃烧的绿树》第三部（《成长之日》）照原定计划付梓。第一部（《救主竟被殴》）和第二部（《推

动》)已出版于1993年,如今他又雄心勃勃地着手写新作了。《燃烧的绿树》三部曲是以作者的故乡四国的山林为小宇宙,以大千世界为大宇宙。作者说:“在这部小说中,即使撇开宗教信仰,我也仍重视灵魂:描绘生活在希望与绝望峡谷之间的人的状态。”此作似略带宗教色彩,然而不是死后升天堂的宗教,而更像是为21世纪和“整个人类而进行的宗教式祷告”。

纵观大江健三郎近40年的创作生涯,他始终强调自己是个日本作家,是为日本读者而写作的,主题都是针对日本在二次大战后的社会问题。但由于日本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日本人当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发展、生态环境被破坏等问题也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他的作品因而为各国读者所重视。早在1989年,他就获得了欧洲共同体(EC)欧洲文学奖,1994年又以《疯狂告诉我们存活之道》获意大利蒙迪罗文学奖。在他的作品中,未遭到核污染的大森林很是突出。1994年,大江在斯德哥尔摩所做讲演的最后一句是:“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人类的医治与和解做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大江健三郎关心人类的前途,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不断地寻求突破,创造新的艺术高峰。

倘若考虑到,本世纪初,由日俄战争的发动者桂太郎任首相的日本政府曾以所谓阴谋暗杀明治天皇的莫须有的“大逆罪”,悍然处决了幸德秋水等12名社会主义者;而八十多年后大江健三郎这位持不同政见的日本杰出作家虽一贯公开批评天皇制,却还能在1993年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十大作家中的第五位,就不难看出战后日本局势的变化。这充分反映了大江从日本广大读者所得到的支持,同时也说明了日本人民对正义感的重视。通过阅读大江的作品,面对21世纪,他们势必也在反思过去,并对未来做出抉择。

1996年3月31日

(原载《读书》,1996年8月号)

## 才女有吉佐和子

在当代日本文坛上，有吉佐和子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位女作家。她于1961年第一次访华时，穿了和服站在周总理旁边照的那张照片给我们的印象最深刻。以后她又多次访问我国，其中，1965年还在我国住过半年。她曾深入我国各地农村，和社员直接交谈，同吃同住同劳动。她一贯主张日中友好，在《墨》（1961）、《年轻的母亲，劳动模范罗淑珍》（1965）、《孟姜女考》（1969）、《中国报道》（1979）等作品中，歌颂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介绍了我国的新面貌。她的许多作品被译成了中文，已经出版的有《木偶净琉璃》（1965）、《有吉佐和子小说选》（1977）、《恍惚的人》（1979）、《黑衣》（1979）等。另外，《世界文学》（1961年7月）还刊载过她的短篇小说《祈祷》等，我国文艺刊物《当代》（1980年1月）也在书讯中介绍过她的报告文学《中国报道》一书。

有吉佐和子除了东方教养之外，还受到西欧文化的影响，是一位有着强劲的民族思想和民主精神的作家。

本文想分四个方面来谈谈她的创作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 一 从摇篮开始的民族热情

有吉佐和子于1931年生在日本和歌山市。祖父是当地的大地主，父亲是高级职员。她的童年是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度过的，10岁回到日本。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者进军东南亚各国，开始了太平洋战争。在家庭的影响下，她从小认为日本在它所发动的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必败。广岛、长崎落下的两颗原子弹，深深刺痛了这位少女异常敏锐的心灵。在日本还没有从战争疮痍中恢复过来的1949年，她考入东京女子大学英文系。由于父亲病逝，1951年转入促成班，1952年毕业。大学时期，她曾立志当剧评家，并参加了歌舞伎研究会。1954年至1956年，随舞蹈演员吾妻德穗去美国，担任吾妻歌舞伎研究会的秘书兼翻译，协助公演事务。1959年11月，她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去美留学，在纽约萨拉·罗伦斯学院研究种族问题。1960年8月，她又到欧洲及近东13国去旅行，同年11月回国。通过外游，她对野蛮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回国后，她说：“到了美国，我特别感到自己是个东方人。”1968年，她到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旅行，并在新几内亚的部落里度过一个月。1970年，她又去美国讲学。1971年，她绕道欧洲，在伦敦和巴黎居住一个时期。

有吉佐和子的创作生涯开始于50年代中叶。1956年，她的成名之作《地歌》被列为芥川文学奖候补作品。小说以父女之间的不和为主题，描写骨肉之间感情上的纠葛，真实地表达了有吉对日本民族艺术的深厚感情。

地歌又名上方歌，是一种最初在京都一带流行起来的、由三弦伴奏的歌曲。小说的主人公菊泽寿久是日本古典音乐界权威，自幼双目失明。他不能容忍独生女邦枝与一个美籍日本人结婚，就和女儿断绝了关系。三年后，邦枝决定跟丈夫到美国去。她利用在国内参加最后一次演出的机会，到后台去向父亲告别。寿久正在调音，她悄悄地替他拨正了一根弦。寿久虽然看不见，根据弦音却辨别出是女儿调的，就故意把十三根弦全拨高了，以表示他至今没有饶恕女儿。演出之际，弦音过高的古筝却获得了意外的好评。邦枝整顿

行李时，发现她那在日本古式房屋里放惯了的三弦，因为不适应美国式公寓大楼里靠人工调整的温度而断了弦。这样就形象地表现了美国生活方式与日本传统艺术的格格不入。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失败，导致日本一系列民族的不幸。美军占领日本后，美国文化中某些不健康的東西涌进来了，对日本固有的文化传统产生了不良影响。有吉在青少年时代目睹了这一切，《地歌》就是她所经历的感受的归纳，成了她的民族感情的进发点。在这篇小说里，日本民族传统艺术与侵入日本的美国文化之间的矛盾被出色地加以典型概括。寿久不能原谅邦枝违背古老的传统，只有离别之情才促使父女和解了。

有吉佐和在《我从事写作的摇篮期——出于偶然》一文中这样写过：“回到东京后，我迷上了歌舞伎，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从事写作的契机。我从貌似美丽的殖民地回到处于紧急状态、开始荒废起来的东京，对战败后的祖国越发加深了幻灭感。这时，歌舞伎强烈地唤起了我对美的意识。”

有吉在这里所说的“歌舞伎”，实际上是日本民族艺术的代名词。“幻灭感”正是她对日本战败后的局面的痛苦感受。“美的意识”则是这种维护民族传统的意识的进发。

耐人寻味的是有吉佐和子的这种热爱日本民族传统的感情，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关于这一点，在她的创作中随处可见。尤其可贵的是她还看到了阶级的差别。

## 二 从肤色的不同到阶级的不同

有吉佐和子由于幼年在印尼生活过，大学毕业后又到世界各地学习并访问，她的视野比较广。她很早就对种族歧视问题作过调查研究。1963年，根据她在纽约哈莱姆黑人区的见闻写了长篇小说《并非由于肤色》（原文作《非色》）。作者还在书名后面附上了英文题名：“Not Because of Colour”。无论从题材的广阔性还是从思想的深刻性来说，这都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并非由于肤色》的女主人公笑子嫁给驻日美军中的一个黑人上士汤姆，来到纽约，住在哈莱姆区。她到一家日本餐厅去当服务员，逐渐熟悉了美国黑人所过的贫困、无文化的生活，体验到普遍存在着的种族歧视。她认识到，黑人之所以受歧视，并非由于肤色。就在白人的社会里，也仍然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的白人都看不起黑人；同时，某些白人又看不起另一些白人——白人当中的波多黎各人，其地位就甚至比黑人还要低。

笑子生下儿子萨姆以后，就辞掉餐厅的工作，到白人教授雷顿家去当女佣，教授夫人是日本人。住在美国这个“文明”大城市里，无数的事实使笑子感受了野蛮的种族歧视的滋味。根据多年的体验和观察，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使唤人的人，一种是被人使唤的人。它们之间的差别，比皮肤颜色的差别要大得多，强烈得多，同时也更是没办法的事。皮肤是黑的还是白的，那不过是偶然的事情；在被别人使唤的人们当中，黑人只不过恰好占大多数而已。这种差别，自奴隶时代以来，一直根深蒂固地持续着。”

笑子伺候的这一对夫妇，都对黑人问题感兴趣，而且时常招待来自世界

---

指当时处于荷兰殖民者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

各地的各种肤色的人。有一次，教授和他那在联合国工作的夫人谈起黑人问题，夫人发表了这样的见解：“我认为白人和黑人的差别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即使在日本，虽然战后由美国实行了农地改革，可是失掉了土地的地主和从前的佃户之间也还是不平等的。美国南部的骚动不是种族的斗争，而是阶级斗争。”

有一次，教授的日本夫人让笑子也参加了招待外国朋友的家庭宴会，被邀请的客人里也有来自非洲的黑人。笑子对黑种客人说：“我丈夫是黑人，属于下层阶级。我的孩子也是黑人。他们很穷，住在哈莱姆。黑人是在 100 年以前从非洲——也就是各位所居住的非洲——到这个国家来的。各位对于这些美国黑人，抱有什么样的看法？”一个肯尼亚青年回答说：“美国的黑人是美国的内部问题。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干涉内政。”另一个加纳青年则干脆说：“我认为美国的黑人问题应当由黑人认真考虑。他们显然不如白人。我觉得这也是由于他们懒惰造成的。当然，我不认为这问题和我们有直接关系。”

笑子知道，这些黑人本来就是非洲的上层人物。他们回国后是准备当总统、部长的。“为什么非洲的黑人如此轻视美国黑人——他们的同种人呢？”笑子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天的这些黑种客人，他们回国后是要作领导人的。他们不会把被人使唤的美国黑人看作自己的同类。这不是肤色的问题。雷顿夫人不是也说过吗？‘美国的种族歧视是阶级斗争！’”

在这部作品里，有吉佐和子通过笑子和雷顿夫人把她长期以来对种族歧视的看法表达出来了。然而我们不可能要求有吉根据唯物史观来洞察问题的实质，她的作品没有深刻、广泛地反映美国阶级斗争的现实，她笔下的黑人也没有挺身而出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抨击了种族歧视。

有吉在 1964 年所写的《波多黎各日记》，真实地反映了波多黎各人民所过的贫困生活。小说是以赴波多黎各进行社会调查的美国米尔布利基女子大学的两个学生（日本留学生崎子和美国人朱莉亚）的片段日记构成的。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比起《并非由于肤色》来，从揭露种族歧视开始接触到反帝反殖民的问题，并反映了波多黎各内部贫富悬殊的状况。

### 三 对日本受压迫者的深沉的同情

有吉是一位视野相当广阔的作家。她不仅关心国际上的种族歧视，也怀着无限的热情关心本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她对日本人民群众遭遇的深重苦难充满了同情，对压迫者的横征暴敛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有吉佐和子 1972 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出云的阿国》就是以 16、17 世纪之交的日本封建时代为背景，通过歌舞伎创始人阿国一生的艺术活动和遭遇，反映了在幕府将军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广大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涂炭之苦。

阿国于 1577 年出生在出云（现今的岛根县中部）。她父亲是个铁匠，当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斐伊河发大水，她的父母双双淹死。阿国从小喜欢跳舞，通过挑水等等生产劳动摸索出舞蹈节奏和动作。十几岁时，她率领一个舞蹈班子出外跑江湖，被当时的统治者丰臣秀吉的清客梅庵看中，把她们收留下来。恰好能乐演员三九郎也来投奔梅庵，两人就有了感情。但是，三九郎一心想利用阿国的舞蹈班子向统治者卖身求荣。后来，秀吉的爱妾西丸听

到阿国的名声，提出要看阿国的舞蹈。阿国舞毕，西丸说，为了在贵人面前表演，应斋戒沐浴，毕恭毕敬地跳，不得像阿国那样陶醉在舞蹈里。阿国听了很生气，就拒绝接受西丸赏给她的酒。阿国逐渐觉察到，西丸和三九郎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这些人，都只把她的舞艺当作奉承统治者的手段，而不是真正爱好艺术。阿国却要 and 人民群众一道跳舞，创造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由于艺术观的不同，她和三九郎之间的感情终于破裂。到了晚年，阿国离开京都到农村去，为农民表演，把自己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所积累的生活经验和对人生的全部思索都体现在舞蹈艺术中。有一次，一个封建把头看了她的舞蹈，问她要什么赏赐。阿国当着万余观众的面，要求他替下游的老百姓把斐伊河的水治好。封建把头被迫履行诺言。这对出云地方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无疑是一大好事，而阿国却在一次大雪中冻死于荒郊，连块碑石也没留下。

阿国的悲惨命运，富有深刻的典型性。她和小说中其他人物形象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日本中世纪社会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阵垒分明的图画。压迫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满。一个农村老婆婆说：“打仗的时候，让老百姓搬土运军粮，随便抢老百姓的大米黄酱，谁敢违抗就杀头。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恨透了将军啦。将军榨取老百姓的鲜血，难道还能官运亨通吗？”

应该说，有吉写这样一个要求摆脱封建束缚的历史人物，是为了表达自己追求民主、争取个性解放的理想。在这部作品里，阿国这个豪爽、倔强，对封建统治阶级敢于反抗，对劳动人民抱着同情心的妇女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1968年的明治维新，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场自上而下的不彻底的革命使日本进入列强的队伍，但也给日本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军国主义掠夺的灾难。一直到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失败之前，日本的地方阶级的封建残余还在盘剥着劳动人民。热中于军国主义的垄断资产阶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经历了战争灾难的有吉佐和子，以爱憎分明的态度，在长篇小说《纪之川》（1959）里描写了明治维新后六十多年的画面。

小说从1896年（明治三十年）一直写到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叙述了代表明治、大正、昭和的三代妇女迥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第一部写20岁上嫁到纪州大地主家的阿花，致力于巩固封建家庭的地位。在她的支持下，她丈夫参加政治活动，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第二部的女主人公文绪（阿花的女儿），是大正时期有一定觉醒的妇女。她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枷锁，到东京去念大学，并且拒绝按照父母之命嫁到大地主家。她当面批评她的父亲说：“地主究竟是什么？爸爸，你是地主，我的身上也有地主的血。我甚至引以为耻。世世代代把佃户流汗得来的收获，恬不知耻地收藏在自己的粮仓里，不劳而获地过着奢侈生活的，这就是地主。我对爸爸所属的政友会也抱着怀疑。那不是个特权阶级的政党吗？难道不是由拥有大量房产、山林和土地的人们所组成的吗？”

在第三部里，作者进一步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抨击。女主人公华子（作者本人的化身）是文绪的女儿。她小时随着父亲在印尼住了几年，回国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学生都被编入“学生报国队”，教室被改成缝纫厂。华子恨透了这种成无缝军衣的生活。她之所以对军国主义体制下的教育制度非常反感，是和家庭的影响分不开的。她父亲就曾说：“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军队所到之处，南方各国被蹂躏得一塌糊涂，简

直是‘大东亚共贫圈’。”这家人认为，“本土决战、一亿玉碎”的口号纯然是歇斯底里的狂叫。当华子那个在大学文科念书的大哥被征召入伍时，母亲文绪对他说：“可千万不要抢什么头功，无论如何也要活下来。”出现在有吉佐和子笔下的的是一个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抱有抵触情绪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典型。

战后日本经历的种种不幸，在有吉的创作里也有所表现。日本是唯一遭受原子恶魔轰炸灾难的国家。1959年有吉发表的短篇《微醺》和《祈祷》，对日本人民遭受的原子灾难进行了揭露和抗议。

《微醺》的主人公青田，在原子弹轰炸14周年纪念日来到广岛，正好赶上全市都在召集大会，开展种种活动。他在酒店里遇上一个广岛市民，酒酣耳热后，那个人对青田诉说了自己的身世。他和妻子都是原子弹受害者，孩子患有先天性白血病。为了纪念战后第二年焦土上就长出的绿色嫩芽，能说明大自然恢复生命力的顽强力量，这对夫妇给小女儿取名叫阿绿。但是他们不得不为体质孱弱、经常需要输血的阿绿的命运担忧，因为至今受害者还不断地死于后遗症。他只能借酒消愁，聊以排遣心头的苦闷。

《祈祷》描写的是在长崎被原子弹轰炸时成了孤儿并且染上原子病的道子的遭遇以及她婚后的家庭悲剧。道子的病情引起婆媳之间的不和，一个幸福的家庭闹得矛盾重重。作品在写到天真活泼的娃娃小诚突然生了无名病症时，达到了高潮。作者通过一家人的愁苦，有力地控诉了原子弹的暴行。

1961年亚非作家会议在东京举行紧急会议期间，她曾流着泪对我国作家代表团说：“日本人民不能忘记原子弹的悲剧。”是啊，有吉是一位富有良知的作家，她理解日本人民，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心愿。

#### 四 深切关心社会问题

在长篇小说《恍惚的人》（1972）中，有吉佐和子以一个中等职员的家庭为背景，描写老年人长期患病，得不到适当照顾，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少麻烦，来说明日本社会上老人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这个所谓“经济大国”、“福利国家”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存在着的深刻的社会问题。

60年代以来，有吉佐和子曾花了大量心血和精力来调查研究环境污染问题。除了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实际活动之外，她还以这个主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综合污染》（1975）。

当前，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日本，环境污染已成为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气中经常烟雾弥漫，河流湖泊水质污浊，食品潜藏着各种毒质，引起种种可怕的疾病，使广大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日本已成为典型的公害之国，日本环境厅用“爆炸性的公害”来描述今天日本的处境。

有吉佐和子多年来注意这个关系到千百万日本人民生存的重大问题，除了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之外，还于1974年11月参加在巴黎召开的“有机农业世界大会”。同年10月，她的作品《综合污染》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呼吁广大读者正视这一现实。

有吉的作品，一般是很讲究艺术形式的。她这部新作与其说是一部小说，还不如说是一篇她个人与环境污染作斗争的自述，其中包含了她多年来在这方面所做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发表这部作品时，有吉写道：“13年前我就希

望写一部以物质文明和人类的矛盾为主题的小说，并开始正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三年的准备工作，正好水俣病的问题真相大白了，我深深感到这个题材已经不是用小说的形式所能虚构的了。但我还是非写不可。在整个日本都仿佛经历着原子弹轰炸般的现状下，我不能沉默不语。”

水俣是日本九州的一个小镇，由于资本家一味追求利润，把大量含有甲基汞的毒水废渣排入水俣湾和不知火海，使鱼中毒，人吃毒鱼而生病死亡。

这个作品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作品中的“我”，就是有吉本人。一开始，作者用很大篇幅叙述了她参加市川房枝竞选活动的经过。竞选活动接触到她一向关心的环境污染、食物公害、先天性畸形儿增加的问题。于是有吉走访官厅、专家、农民、食品店，以她所调查到的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了遍及日本列岛的公害问题的严重性。她以犀利的笔锋，对资本家拼命追求利润、官吏的拖沓和政府机构的颞顽无能进行了抨击，并认为：人类一旦受科学的支配，就陷入物质文明的危机中去了。半个世纪以来，科学造成了严重的错误，人类只顾突飞猛进，忘记了人的限度，也忘记了石油、空气和水都有限度。日本由于战败，一度落后了。一旦从战后的废墟中恢复过来，就不顾一切地急起直追，以致造成了今天的后果。

由于这部作品触及资本主义经济恶性发展的日本社会当前所面临的严重的实际问题，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评论家瓜生忠夫说此书“是对‘走向死亡’的民族敲起的警钟”，并表彰有吉佐和子说：“本来应该由大报全力以赴地进行的工作，却由一个作家完成了”。

有吉佐和子的作品对日本封建主义残余进行了批判，具有鲜明的追求民主的思想内容；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表示强烈反感，对关系到千百万人命运的社会问题深切关心。在艺术上，她继承了日本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传统，擅长于精细入微地刻划人物的思想面貌，文笔委婉，生动活泼，表现出日本文学优美淡雅的特点，耐人咀嚼。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被誉为才女的中年作家并不安于单纯去雕琢文字，走唯美主义道路，而总是怀着满腔热情，大胆地去干预生活，她的很多作品都针对国内外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附记：有吉佐和子已于1984年8月30日去世。本文原题《有吉佐和子的创作》（《日本文学》创刊号，1982年第1期），这次收入集子，做了修改。



## 中日两部家族史

###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谷崎润一郎的《细雪》

巴金和谷崎润一郎同是本世纪中日两国家喻户晓并饮誉全球的作家。他们都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又都受过本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外国文学流派的影响。他们二人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和《细雪》，写的又都是家族史。然而在这相似的情况下，他们却又是如此之不同。这里既表现着这两位大作家主观的素质，又反映着各自环境的明显差异。

简言之，巴金是为人生而艺术，谷崎则是为艺术而艺术。

#### 一 时代背景

巴金和谷崎均出身于富有的家庭里，家道后来同样中落。巴金自幼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边。他写道：“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责任。”

谷崎却缺乏这样的社会责任感。除了在短篇小说《小小王国》（1918）中，他从未通过作品对穷苦的人表示过同情。日本评论家荒正人写道：“这篇作品对社会表示了关心，在谷崎润一郎来说是唯一的例外。”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巴金生在成都古老的官僚地主大家庭里。幼时给他影响最深的是为人善良、宽厚的母亲。她教他爱一切人，同情弱者。巴金从小喜欢和仆人在一起。从中“得到了那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得到了直爽的性格”。

巴金不满10岁时丧母，父亲也于三年后去世。家庭沉重的担子就落在他大哥身上。“五四”运动爆发时，巴金正在成都外专读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学生潮》等新杂志，增强着反抗礼教、解放个性的意识。他接受民主和科学思想，开始执着地追求光明。1923年，他冲出封建的樊笼——家，先后到南京和上海求学。1927年，他抱着研究经济学并成为一名学者的目的赴法国，然而在国外，他目睹的依然是人间的不平。1928年，他写成第一部小说《灭亡》，并于年底回到上海，从此走上创作道路。并于1931年起，开始写作《激流三部曲》。

《三部曲》的故事发生于1920年至1923年秋，地点是某省城，显然就是作者的故乡成都。作者根据亲身经历描写生长在旧式大家庭（这是虚伪的礼教的囚牢）的年轻一代接受了“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想，向老一辈的权威进行了挑战。这是作者用心血谱成的一曲青春的赞歌。他歌颂了新生力量，也揭穿了封建家长制的腐朽本质，指出了它注定要灭亡的命运。

谷崎润一郎于1886年生在日本东京，父亲是一位殷实的米商。倘若说，巴金

---

巴金：《家》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见《花城文库·序跋集》第214页，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有黎箐的中译文，见《日本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谷崎润一郎研究·总论》，第17页。

原载于《我与文学》（《文学》一周年特辑，生活书店1934年7月版），后作为《将军集·序》。

幼时听到的是同胞在长期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发出的呻吟，谷崎则是在席卷日本全国的战争歇斯底里中长大的。

《细雪》中的男主人公贞之助多少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而塑造的。直到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彻底垮台，谷崎总是像贞之助那样抱着谨小慎微的态度：“贞之助对于政治问题、国际时事颇感兴趣，但对报纸和杂志登载的一些事情只是浅尝辄止，任何时候也不超越旁观者一步。这年头稍不留心说漏了嘴，就会受到牵连，招致厄运。贞之助很有戒心，特别是在互不了解心情的外国人面前，他认定了不再发表任何意见。”

谷崎从小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早年在秋香塾攻读汉文，十几岁时就能赋汉诗。中学时代开始在《学友会》杂志上发表作品。由于父亲生意失败，15岁起半工半读。190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后因集资与同学合办杂志《新思潮》而交不出学费，被勒令退学，从此专门从事写作。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又扩大为太平洋战争。当煽动战争狂热的御用小说风靡文坛时，谷崎为了回避对法西斯的支持，耗时8年（1934—1941），将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译为现代语。脱稿后，自1942年起，他又着手写长篇小说《细雪》。

在一个意义上，《细雪》的写作可以说是对军国主义的一种消极抵抗。果然，上卷于《中央公论》1943年1、3月号上连载两期后，即遭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查禁，理由是：涣散军心民心，不能起支持战争的作用。谷崎坚持把它写完，并于1944年将上卷自费出版200部，分送亲朋。战后，中、下卷分别于1947、1948年问世。1949年1月，获得朝日文化奖。

## 二 与本国传统文化的因缘

巴金和谷崎与本国的传统文化均有着很深的因缘。1958年，巴金写道：“说到‘传统’，我想起了我们的短篇小说。我们也有同样的优秀的传统：朴素、简单、亲切、生动、明白、干净、不拖沓、不啰嗦。可惜我并没有学到这些。我过去读‘话本’和‘三言二拍’之类的短篇不多。笔记小说我倒读过一些，但总觉得跟自己的感情离得太远。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戏。我喜欢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

关于谷崎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因缘，日本学者长野尝一写道：“谷崎通晓日本古典文学，在文坛上首屈一指。所受影响，恐怕也说得上是首屈一指。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他就爱读汉文与和文的古典作品，把一点点零用钱都花在买《八犬传》、《太平记》、《雨月物语》、《西游记》、《弓张月》上。……他写了不少取材于东洋古典或借用其背景的作品，如《诞生》、《麒麟》、《信西》、《法成寺物语》等。他博览《源氏物语》、《大镜》、《紫式部日记》……并写了取材于这些古典作品的小说，恰恰说明了他对它们有着浓厚的兴趣。”

巴金在回忆录里谈到自己4、5岁时，母亲怎样教他背诵《白香词谱》。

---

周逸之译《细雪》，第9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见《巴金选集》，第10卷，第25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长野尝一：《谷崎润一郎——古典与近代作家·序章》，第7、8页，明治书院1980年版。

他把母亲诵读词章时那温柔的声音称作“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他还写道：“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不曾读过《红楼梦》。……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当时虽然不曾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中的人物和事情。”

《激流三部曲》像《红楼梦》一样，是描绘传统大家庭生活的一幅精湛的历史画卷，但它所反映的时代和社会毕竟不同了。尽管故事所发生的地方，是当时封建保守势力最顽固的堡垒之一，然而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和科学民主精神的逐渐普及，新思想已逐步取代旧的传统思想。在《红楼梦》中，作者只能借个别人物（如宝玉、黛玉）之口来表露对封建家庭的愤懑，而在《家》和《春》中，受“五四”运动洗礼的觉慧和淑英先后冲出家庭，在《秋》的末尾，留在家中的觉民、淑华，甚至觉新，都与代表邪恶势力的腐化的长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家》中可以看到《红楼梦》潜移默化的影响。钱梅芬的气质和遭遇与林黛玉有相似之处。她对瑞珏说：“然而近来，我的眼泪却少得多了。也许我的眼睛快要枯了。……近来虽然泪少了，可是心却常常酸痛，好像眼泪都流在心里似的。”《红楼梦》中，黛玉对宝玉也说过类似的话：“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往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

尽管钱梅芬和林黛玉都是多愁善感的人，经常以泪洗面，但前者只是一味地逆来顺受，后者却执著地追求爱情，有着敢于对现实社会进行抗争的一面。

巴金在《谈我的散文》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谈经典作品对他的影响，“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

谷崎是 37 岁上从东京迁到关西后，方写出富于日本传统特色的《春琴抄》（1933）和《细雪》等作品的。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后，谷崎一家人到京都避难。他迷上了保留在关西的历史悠久的日本文化，便在这里定居下来。他逐渐地摆脱了颓废主义，在关西文化中发现了日本古典美，关西的风土人情遂成为他后半生写作的背景。

日本文学评论家伊藤整在《细雪 解说》里写道，小说《细雪》是谷崎翻译《源氏物语》的副产品。他认为《细雪》是一部以家族关系为主的写实小说。他把《细雪》和岛崎藤村的《家》作了比较，指出《细雪》在题材上近似《家》，但后者是从阴暗、悲惨、恐怖的一面来描写一个家族及其亲戚们。《细雪》更侧重的是从心理上描写人和人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细雪》更接近中国的《红楼梦》，是一部杰出的描写家族心理的写实小说。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谷崎在作品中对他的时代并未发挥批判的精神，而只是陶醉在其中。另一位日本评论家折口信夫认为“《细雪》是大正、昭和时期日本中流社会的缩影，在这部作品里，作者给后世留下了正在崩溃中的没落阶

---

巴金：《忆·最初的回忆》，见《巴金选集》，第 10 卷，第 21 页。

巴金：《忆·家庭的环境》，见《巴金选集》，第 10 卷，第 53 页。

巴金：《家》，见《巴金选集》第 1 卷，第 220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红楼梦》中卷第 49 回，第 67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巴金选集》第 10 卷，第 263、264 页。

级的绚烂的幻影”。

《源氏物语》的女主人公紫姬和《细雪》的女主人公雪子，均为作者着力刻划的人物形象。

自古以来，日本妇女以忍让温顺为至上美德。紫式部笔下的源氏正妻紫姬和谷崎所塑造的理想女性雪子，都是玉洁冰清，为人娴静腼腆，是典型的日本旧式女子。

《源氏物语》反映的是 11 世纪初的日本贵族社会，《细雪》描绘的则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末的中、上层社会。女主人公雪子尽管受过西方教育（她是女校英语专科的高材生），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她只能在周围人的安排下，在门当户对的男子当中物色对象。这种婚姻，首先考虑的是门第、社会地位、教育和财产状况。由于相互间对相貌、人品、气质又有一定的要求，所以雪子直到 35 岁时才找到个条件相当的人。但在赴东京成婚之前，她“为这逝去的每一天感到悲哀”。因为她纯粹是照中产阶级的择婿标准而嫁，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爱情。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并未安排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他是这样写的：

婚礼后穿的便服也在这天送来了。雪子看见这些东西也嘟哝着说：“这些要不是婚礼的衣裳就好了。”不由得她回忆起了昔日幸子要嫁给贞之助时，也是一点也不高兴的样子，妹妹们问她，她回答说：“也不是件那么值得欢喜的事……”

这一天，雪子的下痢到底也没止住，在火车上还在继续着。

贯串着《源氏物语》的基调是“物之哀”，即由客观事物、大自然而引起的幽深情趣。谷崎恐怕也是为了赋与作品以悱恻缠绵的气氛，而使故事这样收场的吧。

### 三 生活与创作

巴金是带着使命感开始文学生涯的。他写道：“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

不同于他的中国同行，谷崎润一郎是以一个唯美主义者、艺术至上主义者，于 1910 年登上文坛的。然而当年 6 月，日本政府以莫须有罪名，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于次年 1 月，以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罪”，将社会主义领袖幸德秋水等 12 人处决，并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界的专制统治。

“大逆事件”使谷崎的同龄人石川啄木很受震动。他于 8 月间在《时代闭塞的现状》一文中写道：“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认清‘敌人’的时候了。”“敌人”指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

周逸之译：《细雪》，第 644 页。

周逸之译：《细雪》，第 644 页。

《探索集·我和文学》，第 126 页。

石川啄木：《时代闭塞的现状》，《啄木全集》。

日本的唯美派文学开创者永井荷风，在短篇小说《焰火》（1919）中也曾回顾“大逆事件”给他的打击，谷崎则始终对现实采取逃避的态度。他的创作倾向是颓废的，甚至是他所自称的恶魔主义的。西乡信纲认为，谷崎的“作品的基调始终贯串着对生活 and 美的浪漫主义的向往。缺少紧密地联系现实、探讨现实真相的真正写实主义的态度”。

关于生活与写作的关系，谷崎润一郎曾写道：“对我来说，第一是艺术，第二是生活。起初我力所能及地想让生活与艺术一致，或者使生活隶属于艺术。……不久，我就感到自己的生活与艺术之间有着明显的鸿沟，于是我试图把生活有益地消耗在艺术上。我的生活的大部分都致力于使我的艺术日臻完善。”

谷崎经常把生活中经历的事写进作品里，或者把作品里所写的事表现在生活实践中。在《神与人之间》（1924）的最后几章中，主人公把妻子让给了别人。1930年8月，谷崎就真的曾把与他共同生活了18年的妻子让给了诗人佐藤春夫。转年4月，谷崎再婚，但于1934年10月离了婚，因为他终于遇见了理想的女性根津松子。

这两部长篇巨著中，都有作者的亲身经历。巴金写道：“《家》……描写‘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青年在专制的封建家庭里的生活、痛苦和斗争。我自己就是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大的。书中的人物大都是我爱过或者恨过的；书中不少的场面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经常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我写《家》的时候，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心灵激动的一切。”

在小说中，巴金成功地刻划了觉新、觉民、觉慧这三个代表三种不同性格的同胞兄弟。老大觉新善良、正直，然而懦弱。老二觉民嫉恶如仇，但进取精神不够。老三觉慧积极追求新事物，参加学运，办学生报纸。他和丫头鸣凤之间的恋爱构成了《家》的主要部分，但两个人都知道这种爱情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他们被阶级的鸿沟隔开了。

鸣凤之死，是《家》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她才17岁，与其做年届花甲的冯乐山的小老婆，她宁愿以身殉自己对觉慧那纯洁的爱，为了“落得一个清白的身子”，就毅然跳湖而死。这一惨剧使觉慧大为震动，他声明：“这个家，我不能够再住下去！……”觉慧在19岁上，像生活中的巴金那样，离开“家”，到上海寻求光明去了。

《细雪》描写了一家四个姐妹的爱情生活，其间穿插了一些观花、赏月、捕萤、舞蹈、欣赏歌舞伎剧、钢琴演奏会等有闲阶级的风流韵事。四姐妹的原型是谷崎的妻子松子的姐姐朝子，两个未婚的妹妹重子和信子。大姐鹤子老成持重，二姐幸子温柔敦厚，三妹雪子斯文谦和，小妹妙子泼辣洒脱。幸子的独女悦子的原型则是松子和前夫之间所生之女惠美子。

《细雪》上卷第27章中谈到3月间幸子在旅途中小产的事。第28章中写她出血未止。中卷第29章中又提到，一年之后，幸子依然为此事伤心落泪。现实生活中的松子，却不是小产，而是在谷崎的劝说下，将5个月的男性胎儿做了人工流产的。因为谷崎反复念叨：“生了娃娃，咱们这个充满艺术气

---

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第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谷崎润一郎：《做了父亲之后》，刊于《中央公论》1916年5月号，系长女鲇子诞生后的感想。

巴金：《家 法文译本序》，《花城文库·序跋集》，第466~467页。

氛的家庭就垮了，我的创作欲就衰退了，说不定我什么都写不成了。”谷崎逝世后，松子从他的日记中得悉：其实当初他也逐渐对尚未出生的婴儿有了感情，是处于一种犹豫不决的心情下。于是，松子懊悔不迭。

《细雪》中的女佣绝没有像《家》中的丫头那样受虐待。相反地，女主人一高兴还会送阿春出去游览一趟。但另一方面，女主人公幸子又经常抱怨阿春怎样邋遢，怎样生性懒惰。甚至小小年纪的悦子在发脾气时也会嚷嚷“阿春真讨厌！……我要杀掉阿春！”“她对女佣的爱憎变化也很剧烈。厌烦时，什么极端的话都说得出口，动辄喊要杀这个杀那个”。

日本人对谷崎此作的褒贬不一。评论家小田实认为，“《细雪》是一部杰作。尽管它有若干缺点，却是日本文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之一”。另一位评论家筭田一士则写道：“‘谷崎润一郎是无思想的作家’一语，已成为定评。……倘若照伊藤整那样，把‘思想’解释作‘人生应该如何度过’，那么只能说谷崎的作品自始至终是没有思想的。”关于《细雪》，筭田指出，在这部作品中，“看不出人物性格的发展，不论是人物群之间，还是人物与时代之间，都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事件”。他得出这么个结论：“《细雪》可以说是一部可怜的童话。它规模庞大，是运用近代小说几乎所有的技巧而写的。作者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尽量排除了童话本来应有的暗示力与象征性。”

《细雪》中的对话一律用的是京都、大阪的方言，这也给作品带来了很大的吸引力。但在基调上，作品对于旧家庭持的是赞赏和怀念的态度。

《激流三部曲》和《细雪》的作者都曾研究过西方古典及现代文学，同时也注意吸收本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再加上自己的不同寻常的才华和创造性，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两部作品在各自的文学史上同被列为名著，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问世后屡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还被搬上舞台，至今盛行不衰。

在气质上，巴金和谷崎是完全不同的作家，因而作品也迥不相同。但是在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方面，两人是一致的。巴金年过 85，依然笔耕不辍。谷崎呢，在 79 岁上逝世的前几天，也还在写东西。他曾说，他所掌握的素材，写到 100 岁也写不完。用巴金的话来说，两位作家都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附记：本文系将《中国比较文学》（1991 年第 1 期）上所载同名文

---

谷崎松子：《倚松庵之梦》，中央公论社 1967 年版。

《细雪》中译本，中卷第 18 章，第 281 页。

《细雪》中译本，中卷第 17 章，第 277、278 页。

《细雪》中译本，上卷第 24 章，第 136、137 页。

《细雪》中译本，上卷第 24 章，第 136、137 页。

小田实：《细雪的世界》，见《谷崎润一郎论》，第 155 页，河出书房新社 1977 年版。

筭田一士：《谷崎润一郎论》，第 39 页。

筭田一士：《谷崎润一郎论》，第 48 页。

筭田一士：《谷崎润一郎论》，第 48 页。

《倚松庵之梦》，第 171 页。

《探索集·春蚕》，第 53 页。

章删改而成。

## 我的祝愿

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之际，去回顾《日语学习与研究》创刊以来的十年，意义特别深长。这个刊物是改革与开放政策的产儿。它是在近十年来的丰润土壤中成长的。毫无疑问，它也在为新时期的辉煌成就做出相应的贡献：推动国内日语的学习与研究，从而也间接地培植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了文化交流，并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战败国变为经济大国，是近代史上令人瞩目的奇迹。它从战争废墟中崛起，如今竟跃居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资本输出国和外币贮存国，这成就确实是不同凡响的。“开放”不仅能吸收外国资本及技术，更重要的还是借鉴友邦经济起飞的经验。这就需要精通有关的外语。在这意义上，《日语学习与研究》的任务是重大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

中日两国的文化姻缘源远流长。9 世纪初，日本的嵯峨天皇就能用优美的汉文写出中国体诗词。日本平安时代的宫廷女官紫式部于 11 世纪初写成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广泛引用了中国典籍，也说明作者有着深厚的汉文化造诣。

另一方面，日本派来的使节和留学生也使我国当时的士大夫增加了地理知识，丰富了见闻。唐代诗人刘长卿和崔载华曾赠给日本使节一首七绝：

怜君异域朝周远，积水连天何处通。  
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

日本学者、诗人阿倍仲麻吕甚至留在我国朝廷做了官，易名朝衡，并与李白、王维结为莫逆之交，更是千百年来两国人民所津津乐道的。

19 世纪后半叶，日本结束内战，团结对外，从而成功地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锐意维新变革，为飞跃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古代及中世纪时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还是近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日本人向来不主张全盘接受，总是有所选择地吸收并创造性地运用发挥，使之适合本国情况。而且，即便在积极引进西方科技时，他们也不曾摒弃汉学传统中忠孝信悌等有益于维护社会秩序、贯彻道德教育的因素。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把固有的一古脑儿丢掉，并全盘接受新引进的东西，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另外一点是国民的素质。在探讨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的问题时，许多人只注意到客观因素，诸如二次大战后，美国为了抗衡苏联、谋取世界霸权而制定的大力扶植日本的政策以及由于美国提供核保护伞，使日本节省下大笔国防开支。然而战后日本在经济上的高速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结底是日本的民族素质，人民的勤奋努力，自强不息的精神。从国策上说，自明治维新起，政府就把国民教育放在首位，不遗余力地进行智力投资。公民热爱集体，讲求公德。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这是他们强国之本。

再回到刊物本身。十年来，我国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刊物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因而竞争激烈。有些刊物为了打开销路，迎合部分读者的心理，追求趣味热闹。《日语学习与研究》这一学术性刊物，始终严肃认真，坚持创办宗旨，着重刊载日本语言及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深受国内日本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评论家的重视，也得到日本学术界的的支持。祝愿它今后再接



再厉，更好地成为日本文学、语文研究界交流经验的重要园地。

（原载《日语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6期）

## 反映日本近现代现实的戏剧

中日两国在地理上接近，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以文学来说，唐宋以来，直到 19 世纪末叶，日本文学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到了近代，由于日本吸收西方文学艺术方面比我国早了几十年，中国文学又开始向日本文学借鉴，并把日本出版的多种西方各国的译本转译成中文。这是我国介绍西欧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的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戏剧方面也是如此。日本古代戏剧曾受到我国唐代杂技的影响，中国近代话剧运动也曾从日本戏剧中有所汲取。我国老一辈的戏剧家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都曾在日本留学，有的还在那里从事过戏剧活动；一些著名作家纷纷把日本剧本译成中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鲁迅译）、藤森成吉的《牺牲》（夏衍译）等，尤其是菊池宽的《父归》（黄九如译），还曾搬上了舞台。

日本近代戏剧是在古典戏剧的丰饶土壤上，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逐渐发展起来的。1868 年以后，明治政府对外采取开放政策，富于进取心的日本民族如饥似渴地学习起西方的科学文化。于是，西方的文学艺术也随之传播到日本，促使日本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变革，进入现代文化的新时期。戏剧方面自然也不例外。

幕府末期就已成名的剧作家河竹默阿弥，首先对戏剧改革作出了贡献。他写的反映西南战争的现代剧《西南云晴朝东风》，1878 年初上演，是日本近代演剧史上的一件大事。北村透谷是明治二十年代的一位重要的戏剧家，他创作了日本最早的诗剧《楚囚诗》（1889）和《蓬莱曲》（1891）。接着，坪内逍遥发表了《一叶梧桐》（1894）、《牧夫人》（1896）等新历史剧，森鸥外也写了《两个浦岛太郎的宝匣》（1902）和《日莲上人街头讲道》（1904）。他们都是日本现代戏剧的开拓者。

19 世纪末叶，川上音次郎和伊井蓉峰等又开创了新派剧，这是一种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介于歌舞伎与现代话剧之间的戏剧。他们曾把泉镜花的小说《义血侠血》改编为剧本，易名《瀑布银链》上演，后来又改编了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和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尽管这些戏还带有浓厚的歌舞伎色彩，但它们与新历史剧的流行，外国戏剧的翻译介绍，以及当时风靡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相呼应，促进了新剧运动的蓬勃开展。

日本新剧基础的奠立和繁荣，始于 20 世纪初叶。1906 年，坪内逍遥和岛村抱月组成文艺协会，随后改为话剧团体，上演了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易卜生的《娜拉》。另一方面，小山内薫在森鸥外的支持下，于 1909 年同市川左团次一道组织自由剧场，将易卜生、契诃夫、高尔基、梅特林克等人的欧洲现代剧本，以及小山内薫、吉井勇等人的新剧本搬上舞台。大正时期（1912—1926），新剧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山本有三等人的剧本接连不断地上演，话剧在日本风靡一时。至 1924 年，小山内薫和土方与志携手建立筑地小剧场，才真正为日本新剧奠定了基础。1929 年筑地小剧场又分裂为“新筑地剧团”和“筑地小剧场剧团”，两个团体都参加了左翼阵营。

无产阶级戏剧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进步作品以能尖锐地揭露社会矛盾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从事工人运动的平泽计七是无产阶级戏剧的先驱，他创作了反军国主义的剧本《夜行军》（1911），还在 1921 年组织了工人剧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革命剧坛上还出

现了反映我国“二七”大罢工的戏剧。

这个集子里收入的 10 位日本著名戏剧家在 1915 至 1937 年间所写的 14 部有代表性的剧本，从各个角度反映了那个时期日本的社会现实。这些作品都曾经上演，以其鲜明的艺术形象感动过成千上万的观众，引起人们的深思；特别是一些揭露黑暗、鞭笞不义的作品，更起到促人觉醒的作用。它们是日本现代戏剧丰富的艺术宝藏的一部分。

日本政府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不但使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祸害。武者小路实笃的《他的妹妹》（1915）就是通过主人公野村广次及其妹妹静子的悲惨遭遇，对战争提出了血泪控诉。据作者自己说，这个剧本是他“流着泪写成的”。戏剧家舟桥圣一认为这是武者小路“毕生所写的重要作品之一，对后起之秀山本有三、菊池宽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剧本的反战主题思想，在剧中人物野村的一段话里说得很明白：“我是个盲人，眼睛是在战争中打瞎的。……我是个坚定的非战论者。我厌恶杀人，更厌恶被人杀死。我对国家进行的这场战争持有异议。……我去打仗了，放过枪，参加过枪毙可怜的敌方军事侦探的行刑队。我在心里向被枪杀的人谢罪，为他祷告。我虽未瞄准他射击，但是我也没有能力挽救他的性命，更无法减轻他对死亡的恐怖。”代表黑暗势力的相川父子在舞台上并没有出现，但其支配野村兄妹命运的力量却无时不在，这对孤苦无依的兄妹不论怎样挣扎也未能逃脱他们的魔掌。最后，静子只得牺牲自己的青春，嫁给穷凶极恶的资本家相川的流氓儿子三郎。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妇女的地位尤其低下。剧中娴雅秀丽的女主人公静子是作者道德理想的化身，她是个坚贞不屈、有抱负、有勇气的姑娘。正因为如此，她身世的不幸就越发使人对把她推入苦海的罪恶社会感到无比憎恨。武者小路的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他提倡新理想主义的文艺。至 1918 年他创办《新村》杂志，赴日向去建设耕读主义的新村，他的人道主义和新理想主义就已变成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式的空想了。

菊池宽在思想倾向上是当时日本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既不像武者小路那样试图创造一个理想世界，又不像无产阶级作家那样身体力行，去改造客观世界，而是对种种社会矛盾采取折衷态度。这在他的许多剧本中都有所反映。独幕剧《屋顶上的疯子》（1916）写一个患疯病的人怎样高高兴兴生活在他的幻觉世界里，父母用尽种种办法也治不好他的病。但是病人的弟弟却认为，与其给他治好病，让他看到痛苦的现实，倒不如让他在美好的幻觉中得到快乐。作者对现实是否定的，剧本有一定的揭露意义，但却不主张面对现实，好像只有逃避才是解除痛苦的唯一办法。这种人生哲学显然是很消极的。《父归》（1917）是菊池宽的成名作。他说这是看了英国戏剧家约翰·汉金的《浪子回头》后受到启发，认为“浪父也会回头”，才写了这个剧本。全剧语言生动洗练，几个人物的心理描绘和性格刻画都相当成功，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写作技巧；但同时也存在着菊池宽创作上的一个普遍弱点，那就是对旧道德的妥协。贤一郎的父亲年轻时抛弃了全家人，只图在外享乐，老来穷困潦倒，回到家里。贤一郎理所当然地不肯认他。但是，一旦老父悲伤地离去，父子之情就战胜了一切怨恨。剧本正是以此来

---

《现代日本戏曲选集》第 3 卷解说，白水社 1955 年版。

《现代日本戏曲选集》第 3 卷解说，白水社 1955 年版。

赢得观众一掬同情之泪。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受西方影响，年轻的一代逐渐丧失了东方的家庭伦理观念，所以这个剧本演出后，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是保留剧目。

有岛武郎在《死及其前后》（1917）中，以浪漫主义手法，巧妙地将梦幻世界与现实生活穿插起来，深刻地描绘了妻子之死给丈夫带来的痛苦。剧中描写了他们婚前的恋爱、婚后双方感情上出现的危机、脱离教会、密探上门、父亲去世等情节，均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结巴阿又之死》（1922）是个轻快明朗的独幕剧，副标题表明此剧是受了马克·吐温小说的影响。剧本情节和马克·吐温的《他是否还在人间？》确乎有些相似，但有岛决不是照搬，而是独具匠心，写了一出具有日本情调的讽刺喜剧。剧中人物是五个穷画家和一个做模特儿的姑娘，他们让其中一人改换名字，宣布他已经死去，然后以高价出卖他的作品，耍弄了那些不懂艺术、唯利是图的奸商。作品人物性格鲜明，从头至尾妙趣横生。

山本有三的《杀死婴儿的人》（1920）中出现的人物，都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收购破烂的、酒店小伙计和女工等等。就连警察小山，也因为没钱给妻子和儿子买药治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特别是那个女工，为生活所迫，亲手杀死了她刚刚出生的娃娃。小山知道她是无罪的，但他是警察，必须尽自己的职责，把她逮捕起来。作者写这个剧本的前两年，日本曾发生抢米暴动，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此剧所写的主要人物的遭遇，正是反映了社会上最尖锐的现实问题。

仓田百三的《水边》和小山内薰的《第一世界》均发表于1921年。前者写一个学者被女友高子遗弃后，患了重病，得到女佣阿村无微不至的照顾，并由此同居，生了一个儿子。但由于他未能忘怀于高子，始终不肯同阿村正式结婚。高子事后懊悔，又找了来，两人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定永远分手，以成全阿村母子。《第一世界》是作者经过十年的酝酿才写成的，但因其表现的是所谓现实世界（第一世界）以外的第二世界（心灵的世界），演出效果并不理想。青年时期的慎一热恋系子，他的好友龙太郎则说系子并不爱他，劝他不可痴情。但慎一离开系子后，龙太郎却爱上了她，并和她结婚了。后来慎一也草率地结了婚，妻子生了一女后抑郁而死。慎一从此与世隔绝，躲在第二世界（心灵的世界）里，埋头钻研但丁的《神曲》。但是，他的女儿长大成人后，恰恰爱上了龙太郎和系子所生的儿子。于是他又被拉回到第一世界（现实世界）中来。

1917年，有岛武郎在小说《该隐的末裔》中满怀同情地描写了农民广冈仁右卫门的悲惨遭遇。他背井离乡，到冰天雪地的北海道谋生，结果被资本家和地主榨干血汗，无情地逐出农场。三年后，秋田雨雀在其代表作《国境之夜》中，塑造了另一个北海道开拓者的形象。主人公大野在边远的国境线上苦干了20年。在这里，他看到了金钱的罪恶，同时他自己也变得利欲熏心。他唯一的愿望是积攒下更多的钱，以便将来到东京去安度晚年。利欲使他养成了一副铁石心肠。在一个大风雪的夜晚，一对过路夫妇背着幼儿请求进屋取暖。大野的妻女都很同情他们，苦苦替他们说情，大野却无动于衷，狠心把他们赶走，以致那大小三口都冻死在雪地里。作者怀着满腔革命民主主义的激情，鞭笞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残酷，揭露了这个北海道开拓者的强盗本质。作品中出现的那个纯朴的阿伊努人，与大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骷髅的舞蹈》里，作者的笔锋更进一步指向日本的

统治当局。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造成了严重灾害。日本统治阶级却乘机镇压革命人民。宪兵队长甘粕杀害了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和伊藤野枝。军人在龟户警察署杀害了无产阶级作家平泽计七等人，制造了“龟户事件”。与此同时，日本军政首脑又煽动群众屠杀朝鲜人，牺牲者达3000人之多。秋田的这个剧本就是以这次的血腥事件为背景而写成的。主人公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年轻学生，他经过周密调查，证实所有被杀的人都是无辜的。那些自称奉政府和警察署之命乱抓朝鲜人的“自卫团员”，在他的揭露和指责之下一个个都变成骷髅，狂跳乱舞，最后在一片嘲笑声中纷纷倒地，变成碎块。晨曦初现，幕落剧终。刊载此剧的那一期《演剧新潮》遭到了查禁。

藤森成吉的《星之岛》（1934）以30年代初的檀香山为背景，揭露驻守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美军的凶残。上尉勃伦为了他个人和海军的所谓荣誉，竟开枪将一个无辜的青年工人打死。同时，作者也通过这个人物之口，隐隐约约透露出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不满。明治维新后，以外国为背景的日本作品逐渐多起来，《星之岛》是其中的一个多少有些进步意义的剧本。

这里收进了真船丰的两篇作品：《黄鼠狼》（1934）和《小镇》（1937）。前者是真船丰的成名之作，写一家人为了金钱，不顾骨肉情谊，尔虞我诈，如同仇人，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情世态。剧中人物性格生动，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小镇》（1937）写的是发生在一个学校里的故事。纯洁正直的女教师祢子面对心怀邪念的校长的威逼，依然保持她冰清玉洁的品格，不入俗流，不为所屈，敢于同其他几个男女教员一起和以这个校长为代表的封建残余进行斗争。两个剧本写的都是偏远地方的凡人小事，却强烈地表达了剧作者对善良人的同情和对恶势力的厌憎。

久保荣的二部七幕长剧《火山灰地》发表于1937、1938年，并于1938年6月由新协剧团在筑地小剧场公演。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已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该剧的演出是对法西斯的有力反抗。剧本以北海道为背景，写出旧的生产关系如何严重地阻碍着火山灰地农业技术的发展；剧中出现的人物有地主、农民、烧炭工人、白俄知识分子，同时还写了试验场长雨宫的家庭悲剧和已转入低潮的农民运动，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矛盾。

从30年代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的新剧在白色恐怖下遭受摧残，一切进步的戏剧活动都被禁止。但是在漫漫长夜中，新剧作者一直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斗争，《火山灰地》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当时，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工人看了此剧，如同久旱逢雨似地感到高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久保荣在收入自选集第2卷的《火山灰地》后记中写道：“不论他（雨宫）本人相信社会主义与否，他总算认识到了单凭农地的技术改革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剧中有这么一句台词：‘日本和外国在土壤上的差别犹在其次……更重要的一点……已隐隐约约露出了一点苗头。’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记得每天晚上舞台上演到这里，筑地小剧场的观众席上就发出一片叫好声，鼓掌声。我看到这种情景，心里不由得一块石头落了地。”在日本文学史上，《火山灰地》被列为抵抗文学的代表作，久保荣以它为武器，打破了军国主义对文化的禁锢，激发起观众对光明的强烈向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日文化交流活动蓬勃开展，戏剧界的相互往来也日益频繁，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比较全面的日本戏剧选集，以满足

社会上的需要。编选这个集子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些佳作，使我国读者对日本现代戏剧有个较全面的认识。日本现代戏剧作品浩如烟海，只能就目前掌握到的材料来选，大致按发表年月的先后编排。作者简介均系笔者所写。不足之处，尚希读者指正。

附记：本文系将《 他的妹妹 日本现代戏剧选》译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版）修改而成。

## 春蚕到死丝方尽

——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英国小说一向以长篇为主。本世纪初，一位以写短篇小说闻名于世的女作家彗星般出现在英国文坛上。在短短 14 年（1908—1922）的创作生涯中，她写下了 88 篇短篇小说，大量的文学评论、日记、书信、札记以及别具一格的诗。她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做了大胆的探索，有“英语世界的契诃夫”之称，曾经产生过，并且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她就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即 20 年代初期我国诗人徐志摩前往访问并撰文介绍过的曼殊斐尔。

曼斯菲尔德的曾祖父和曾外祖父都是从英国到澳大利亚去的移民，到了她祖父和外祖父这一辈，又举家迁到新西兰。曼斯菲尔德于 1888 年 10 月 14 日生在新西兰惠灵顿，父亲哈罗德·博昌是个商人，1898 年被任命为新西兰银行董事（后升为行长），并于 1923 年封为爵士。曼斯菲尔德有两姐一妹，她却对幼弟莱斯利的感情最深。

曼斯菲尔德幼时住在惠灵顿郊区，6 岁上小学，同周围的洗衣妇、挤奶工人、汽车司机的孩子一道受义务教育。这样，尽管出身富户，她从小就接触到社会底层。

曼斯菲尔德天资聪颖，9 岁入惠灵顿女子学院时，就在校刊上发表了生平第一篇小说，并已显示出写作才能。1898 年全家搬入惠灵顿的一座面临港湾的白色大厦，同聚集在附近的工人窝棚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贫富悬殊使凯瑟琳深感愤愤不平。

1903 年初春，凯瑟琳和两个姐姐一道去英国。她进了牛津大学皇后学院，专攻英国文学，兼学法文和德文，同时迷上了大提琴。有个时期，她曾在以音乐还是以文学为业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1906 年 10 月，三姐妹又一同回到新西兰。次年末，曼斯菲尔德随一支探险队，赴新西兰腹地考察，途中做了详细的札记，对故乡的风土人情加深了认识。一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几家报刊曾陆续刊登她的小说。她原姓博昌，为了纪念外祖母，开始改用外祖母娘家的姓——曼斯菲尔德。1908 年 7 月，她终于使父亲相信她有能力当职业作家，遂返回伦敦，从此开始了坎坷的写作生涯。

一个年轻貌美的单身女子，独自在那样一个花花世界生活，必然要经受种种考验。比她大 11 岁的音乐教师包顿热烈地追求她，他们结识数周后即举行婚礼。但当天傍晚，她就不辞而别，去追随自己最初的恋人——她 13 岁时在新西兰结识的一名小提琴手。怀孕后，她客居比利时和德国，尝到了流产的痛苦，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1910 年初回到伦敦。生活中的挫折反而换得了艺术上的升华，1911 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德国公寓》问世。

这一年，她结识了《节奏》杂志的主编约翰·密德尔顿·穆雷并产生了爱情。但是直到 1918 年，曼斯菲尔德的第一个丈夫提出离婚后，两个人才得以正式成为夫妻。

不幸的是，1917 年她的艺术技巧正臻于成熟时，她却患上了肺结核。倘若她肯接受大夫的劝告，立即停止写作，进疗养院，本来还能多活几年。然而那正是她的创作欲最为旺盛之时，她片刻也不肯休息。此外，在气候温暖、阳光充足的新西兰长大的曼斯菲尔德，始终也未能适应英伦那阴霾寒冷的冬

季。像候鸟一样，她每年都要到欧洲大陆去避寒。在飘零中，她从死神手里夺取时间，写下了《在海湾》、《园会》、《一杯茶》、《苍蝇》等众多优秀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是一次巨大打击，曾使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幻灭。1915年，曼斯菲尔德的弟弟莱斯利在赴前线途中来看她，姐弟俩畅叙旧事。可是一个月后，在法国举行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他便丧生了。她在悲痛之余，感到有责任把在新西兰和弟弟一道度过的童年，用文字形式再现出来。这就是1918年问世的《序曲》。此书在排印期间，排字工人看到原稿后就不禁嚷道：“天哪，这些娃娃是真的哩！”尽管当时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尚未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但她得知此事后，却深受鼓舞，因为她更重视普通读者对她的赞赏。《幸福集》（1921）问世后，她又收到许多读者淳朴诚挚的来信，从此，她在创作上更加苦心孤诣地探索尝试。《园会集》（1922）的出版奠定了她作为英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的地位。

曼斯菲尔德曾与穆雷和作家戴·赫·劳伦斯合办文艺刊物《签名》。她和同时代的女作家维吉尼亚·沃尔夫、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交往密切。关于她，维吉尼亚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嫉妒她的文章，那是我所唯一嫉妒的文章。”维吉尼亚的名作《达洛威夫人》（1925）就是在曼斯菲尔德的《园会》的影响下写成的。劳伦斯曾把她比作狄更斯，认为她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她那妙趣横生的幽默都使人联想到那位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妇女》（1921）中的人物戈珍就是以曼斯菲尔德为原型的。

曼斯菲尔德短暂的一生，大抵上是在漂泊中度过的。离开自己的出生地新西兰后，她一直客居英、法、德、意、瑞士，过着公寓生活。她的作品，有不少是在旅途中所写，或以旅行为题材。这个集子里所收入的《男爵》和《男爵夫人的妹妹》，选译自《在德国公寓里》（1911），作者以揶揄手法描述了本世纪初巴伐利亚人趋炎附势的丑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反德情绪高涨，出版商要乘机再版此书，并答应付给她500镑。战争不但夺去了她周围的一些年轻朋友的生命，她的胞弟也丧生。因此，她厌恶战争，坚决反对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掀起民族仇恨的工具。当时，尽管她身染重症，需要靠稿酬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但她在世时，却从未允许再版此书。《不谨慎的旅行》（1915）是根据她在战争期间的实际经历写成的。

《郊区童话》（1917）的背景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到处在闹饥荒，一对处于小康局面的夫妇却只顾给自己一家人弄到吃的。结尾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孩子同情户外挨饿的娃娃们，化成麻雀，和他们一道展翅飞去了。作者擅长描写儿童心理，精确地掌握儿童语言。在《小妞儿》（1912）中，作者用清丽、委婉的笔触，将一个幼女的内心活动写得逼真。女主人公凯瑟娅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为了送给父亲一件生日礼物，她无意中剪碎了他的重要讲稿。父母却不问她的动机如何，粗暴地惩罚了她，致使一颗稚嫩的心灵受到创伤。凯瑟娅具有作者的特征，经常就是她本人的化身。

曼斯菲尔德的一些最好的短篇，是以风光明媚的故乡为背景的，这里所选的《航海》就是其中的一篇。

凯瑟琳出生后6个月，曾乘船跨过科克海峡，被带到皮克顿镇去探望祖父；幼年，又去了一次。《航海》的故事情节虽然是虚构的，结尾出现的爷爷却是以她的祖父阿瑟·博昌为原型而写的。关于此作，她在致友人的书信



中曾写道：“……你对《航海》有这样的感受，是多么奇妙，多么可喜啊。除了密德尔顿·穆雷，谁也不曾向我提起过它。但是当我写那篇小故事的时候，我感到仿佛自己就在那艘船上，走下舷梯，嗅到大餐间的气味。当女茶房走进来说：‘船上没装多少货，也许有些晃荡’时，我敢相信我坐的沙发也晃起来了。我忽而梳上个像绸子一样光滑的小白纂儿，戴上顶软帽，忽而变成斐内拉，手里攥着柄上雕了只天鹅头颈的雨伞。一切都是那么逼真——极其逼真——尤其是当他们乘的船远去，并听见海浪缓缓地冲上岸的声音。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那并不是出自实际经验的一段回忆，我只是着了魔。假若当时风向变了，我也许就会变成那个老奶奶了。而这会害得密德尔顿·穆雷多么尴尬……”

《稚气却很自然》(1914)这个题目取自1799年英国诗人柯尔律治(1772—1834)从德国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所附同名的诗，系模仿一首德国民歌《倘若我是只小鸟》而成，后来公开发表。

《稚气却很自然》中的亨利还不满18岁，艾德娜才16岁。小说把他们的青春之恋写得纯洁真挚而又耐人寻味。如果把这篇小说和作者后期的短篇小说《心理》(1918)对照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多么善于刻画不同年龄的人对待恋爱的态度。《心理》的男主人公是个31岁的小说家，女主人公是个30岁的戏剧家。他们涉世已久，阅历较深，认为“热情会毁灭一切”，彼此都安详冷静地分析对方的心态，与《稚气却很自然》中那对喜欢幻想、热情奔放的少男少女形成鲜明的对照。

1923年徐志摩所写的曼殊斐尔访问记在中英文学交往上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一个来自东方的诗人，怀着尊崇的心情去探望一个病魔缠身的英国女作家，而半年后，她就与世长辞了。从那篇访问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位英国女小说家与俄罗斯的契诃夫之间的文学姻缘。她殷切地向徐志摩问起中国介绍契诃夫作品的情况。

曼斯菲尔德私淑契诃夫，她与人合译过契诃夫和高尔基的作品。就传统而言，英国文学家一向重视长篇而忽视短篇，重视多幕剧而忽视独幕剧，曼斯菲尔德却呕心沥血地探索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在给她丈夫的弟弟理查·穆雷的信中她写道：“……技巧对写作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奇妙的。我指的是包括细节在内。例如，在《布里尔小姐》(1920)中，不但每个句子的长短是经过选择的，在音调上我也下了功夫。每个段落的起伏都是为了配合她而精选的，配合的又是当天那个时刻的她。搁笔后，我又大声朗读了好几遍，犹如弹奏乐曲一样，试图让它接近于布里尔小姐的神态情致，直到完全吻合为止。”

曼斯菲尔德的社会圈子比契诃夫狭窄，题材大多局限于她所熟悉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她的作品不以情节取胜，立意多在捕捉人物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抒情气氛浓重，回荡着散文诗的旋律。她善于把握人物心理活动的特征，通过不同层次的心态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含蓄典雅，留有余韵，

---

见1922年3月13日致威廉·葛哈狄函，《书信日记集》，第258~259页，《企鹅现代文学丛书》，伦敦，1927年版。

见徐志摩译《曼殊斐尔小说选》，北新书局1926年版。

见1921年1月17日致理查·穆雷函，《书信日记集》，第213页。

回味无穷。她打破了过去的小说简单地叙述故事的传统，为短篇小说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她曾说：“我是一架照相机——一架自行选景的照相机，而我的选择取决于我对人生的态度。”

她写的往往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意境，于平淡中见新奇。她的每篇小说都是蘸着心血写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由于艺术上的刻苦，她竟缩短了自己的生命。

1923年1月9日，曼斯菲尔德客死于巴黎东南枫丹白露镇的阿冯村，时年仅34岁。

曼斯菲尔德去世后，她的丈夫密德尔顿·穆雷编辑遗稿，出版了短篇集《鸽巢集》（1923）和《稚气集》（1924）、《诗集》（1927）、《日记》（1927）、《书信》（1928）和《札记》（1939）。她还写过150余篇文学评论，收入《小说与小说家》（1930）。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蜜月》译本序。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 漫谈奇书《尤利西斯》

人和人有缘，人和书也有缘。我和《尤利西斯》的缘分始于 1941 年 6 月。那时我正在北平东单三条圣心学校读英语，教我们的爱尔兰修女艾玛指着四年级课本中的美国作家华盛顿·艾文所写《瑞普·凡温克尔》这篇小说，说：“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中，不只一次地提到这个作品和它的同名主人公。”我当时 14 岁，初次听到这个书名，便把它和在日本小学时就熟读过的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改编的《奥德修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了。6 年后，又在清华大学外语系美国教授温德开的《英国文学史》课上详细地听到关于这部“天书”的介绍。温德老人是个左撇子，边讲边写，涂了满满一黑板，分析主人公布卢姆在都柏林市 18 小时的活动。几年之后，初识萧乾时，我们又很自然地谈起这部意识流“开山之作”。他随手从案头抽出一本奥德赛出版社 1933 年版的《尤利西斯》给我看。他还用紫墨水密密麻麻地在空白处写满了笔记。

1922 年在巴黎问世的詹姆斯·乔伊斯(1882—1914)这本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如今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有了译本，有些国家甚至不只一种。日本远在 1932 年就翻译出版了，至今已有了四种不同的译本。然而我国迄今才只有一个不及原作五分之一的选译本。我国读书界（尤其学习或研究外国文学的）大都知道此书，有的读过摘译的片断。然而至今大多只闻其名，而未见其全貌，诚然是个不小的遗憾。

所以四年前当译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长找到我们，力促我们译这部天书，那确实是个挑战。半个世纪前，萧乾曾在剑桥王家学院对此书下过点“傻功夫”（他的原话）。他晓得这可不是轻易挑得起来的担子，但我们终于还是接受了这一挑战。心想：既然旁的国家有几种译本，中国也应该有；而且除我们之外还完全可能有高手再来译第二个、甚至第三个译本。这部奇书是经得起这么反复尝试的。然而总得有人先来闯闯路。我们相信，最终会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译本。我们这只是抛砖引玉，当人梯。晚年能从事这么一项大工程，还是值得的。

我对文艺理论毫无研究，但我感到很难用什么主义来限定《尤利西斯》这部小说。它有时写实，有时荒诞无稽（连蹄子和扇子都能讲话，见第 15 章），有时十分抽象，大谈哲理，有时又十分具体（如关于赛马、斗拳，见第 2 章、第 10 章）。

我认为《尤利西斯》的价值，主要在于深化了写小说的艺术，从外在情节而探索到人物的内心世界。

乔伊斯于 1904 年离开都柏林后，曾宣布“自愿流亡”。他辗转于巴黎、伦敦、的里亚斯特、罗马、苏黎世等城市，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哺育他成长的故土爱尔兰梦绕情牵，并运用内心独白手法，以都柏林为舞台，写成了这部本世纪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

《尤利西斯》全书共 18 章，写主人公布卢姆（一个怕老婆的广告兜揽员）和他的妻子摩莉（歌唱家）以及一个名叫斯蒂芬·迪达勒斯的青年诗人（乔伊斯自传体小说《一个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中的主人公），在 1904 年 6 月 16 日这一天 18 个小时（晨 8 时至次日凌晨）的行动和内心活动——也就是意识流。作者把主人公这一天（后来《尤利西斯》的热心读者称之为“布卢姆日”）在都柏林的活动与古希腊史诗《奥德修纪》中的英雄尤利西斯在

海上的十年漂泊相比拟，感到他所观察的爱尔兰现代生活是荷马世界的再现。小说赋予平庸琐碎的现代城市生活以悲剧的深度，使之成为象征普遍人类经验的寓言。这 18 章起初在杂志上连载时，为了突出各章主题，作者曾以荷马史诗的人名或地名作为标题。出单行本时，却把标题统统删去了。事实上，古希腊那部史诗只不过曾给作者以启发，二者并没有紧密的联系。

《尤利西斯》尚在执笔期间，前 14 章就已经在美国的《小评论》杂志上连载（1918—1920）。1921 年，该杂志在纽约被控刊载“淫秽”作品，因而在英、美、爱尔兰出版界没人敢承印此书。初版 2000 册还是由美国西尔薇亚·毕奇女士在巴黎开的莎士比亚书屋承印的。次年 2 月，西尔薇亚把样书亲自交到乔伊斯手里。他是 1907 年开始构思，1914 年动手写的。1932 年，敖德萨出版社又在汉堡出版了此书的新版，由乔伊斯研究家斯图尔特·吉尔伯特担任校订，至第四版，始成为定本。

1933 年，纽约法庭经激烈辩论，最终宣布《尤利西斯》并非诲淫之作，转年 1 月，此书的美国版即问世。在英国和爱尔兰，也相继解禁。

《尤利西斯》是本世纪最有争议，也是影响极大的一本书。最初，在英国，有人认为它违反了伦理；在爱尔兰，有人说它反天主教；德国那时希特勒已上台，又嫌它的主人公是犹太人；在西班牙，有人认为作者把出生在那里的摩莉写得太放荡了；当时只有苏联的密尔斯曾认为书中给工人运动带来了有益的信息。

书出版后，当时爱尔兰自治邦的一位部长曾去拜访乔伊斯，打算推荐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乔伊斯戏答曰：“那不会给我带来奖金，倒会使你失掉部长的官职。”更有趣的是，当时柬埔寨国王正在巴黎，对此书十分赞赏，他竟然宣布改名为列那·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问世以来，受到众多知名作家、批评家的称许，各国专门研究此书的著作不断出版，还成立了“乔伊斯学会”。再加上各种注释本，使越来越多的人能读懂并欣赏这部书。

《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卢姆是生活在都柏林的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19 世纪末叶发生德雷福斯事件（法国军方陷害犹太血统的军官德雷福斯的冤案）后，犹太人在欧洲十分孤立，爱尔兰也掀起一场反犹运动。乔伊斯以这样一个犹太人为他这部杰作的主人公，并在此人身上倾注了他的同情。他笔下的布卢姆当然不是完人，但他是个宽容的丈夫，充满爱心的父亲，真诚慷慨的朋友。

乔伊斯在苏黎世写此书时，曾对画家勃真谈起他对犹太人的好感，认为他们在一个天主教国家里坚持犹太教的信仰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他们不怕孤立。相形之下，小说中，与布卢姆的妻子摩莉私通的爱尔兰人博伊兰倒是徒然有个强壮的身子，但缺乏思想，没有灵魂的空壳子，一个饭桶。

乔伊斯在给妻子的信（1904 年 8 月 29 日）中曾说：“我从心坎上摒弃当前的整个社会结构（包括家庭）以及基督教信仰。……我的家庭属于被挥霍习惯所毁的中产阶级，我也受到遗传。我母亲估计是受我父亲的虐待，又被历年的苦恼以及我那率直的乖张行为缓慢地折磨致死的。当我发现，躺在棺材里的她那被癌症摧残得憔悴了的脸是那么灰暗时，我晓得自己是在望着一个受害者的脸。

“六年前，我离开天主教会，我对它恨之入骨。我发现由于我本性的冲动，我再也不属于它了。我在学生时代就偷偷地反对过它，拒绝为它任职。

我甚至因此沦为乞丐，但我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如今，我用笔和口和行动公开反对它了。我在社会上只能是个流浪汉。我曾三度开始学医，一度学法律，一度学音乐。一周前我还想在巡回剧团里当个演员。我没有力量实现这计划，因为你在掣我的肘。”

《尤利西斯》不仅在写作方法上彻底摆脱了西方小说几百年的传统，另辟蹊径，在思想上，他也是叛逆的。本世纪初，以诗人叶芝为首的爱尔兰文艺界都在致力于民族文艺复兴运动，乔伊斯却远离故土，摒弃天主教信仰及固有的社会秩序守则。他不但倾注大量笔墨写犹太人布卢姆的善良忠厚，头脑敏锐，还借这个人物的口说：“门德尔松（大音乐家）是个犹太人，还有卡尔·马克思、梅尔卡丹特和斯宾诺莎，救世主是个犹太人。”

失去祖国、到处流浪的犹太人的遭遇，使乔伊斯越发深切地感受到处在异族统治下的爱尔兰人的命运。例如在第12章中，绰号叫“市民”的一个激进分子就愤愤地问道：“咱们这里本来应该有2000爱尔兰人，如今却只有400万。咱们失去了的部族都到哪儿去啦？”他把爱尔兰人比作以色列人，所以特地使用了“部族”一词。公元前8世纪，由于遭受亚述侵略，以色列人就曾由原来的12个部族锐减到两个部族；而19世纪中叶以来，因饥馑、移民等原因，爱尔兰人口由1841年的819万锐减到1901年的446万弱（照原先的自然增长率，本应增加到1800万）。据统计，19世纪有400万爱尔兰人被迫背井离乡，移居美国。

“市民”接着控诉道，爱尔兰的经济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咱们的贸易和家园毁于一旦这一点上，那些卑鄙的英国佬们欠下了咱们多大的一笔债啊！”

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乔伊斯自幼仰慕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巴涅尔。当巴涅尔失势并突然去世后，年仅9岁的乔伊斯怀着悲愤之情写了一首长诗。后来经过润饰，收在《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在《尤利西斯》中，包括巴涅尔在内的为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做出贡献、甚至英勇献身者，几乎无不被提及。尤其是第12章中，描绘富于传奇色彩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罗伯特·埃米特（1778—1803）因反英起义未遂，被判叛国罪，当众施以令人发指之酷刑，慷慨就义的场面，自始至终是用反笔写的，越发烘托出统治阶级之残酷毒辣。

《尤利西斯》的历史背景是1904年。在那个时候，恐怕没有人能预见到仅仅18年后，爱尔兰自由邦就建立起来了。在第12章末尾，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使布卢姆成为先知以利亚的化身，连同他所乘的车子升到上空灿烂的光辉中去，表现出对美好的明天的憧憬。

利奥波德·布卢姆是以爱吃家禽的下水、浓郁的杂碎汤亮相的。读毕全书，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就印在读者脑中。布卢姆作为一个从匈牙利来到爱尔兰落户的犹太人后裔，对歧视并围攻他的本地人说，他“属于一个被仇视、受迫害的民族”，并指出，“侮辱和仇恨并不是生命。真正的生命是爱”。（见第12章）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就在这短短的一天中，他为刚去世的友人狄格纳穆的遗属慷慨解囊，搀一个素不相识的盲青年过马

---

见理查德·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169~170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见《尤利西斯》第12章末尾。

见《都柏林》中译本。

路，午夜又救起酒醉后被殴打、倒在街头的斯蒂芬，把他带回自己的家。

应该说，乔伊斯之所以在布卢姆身上倾注了如此深厚的感情，是因为他本人就属于弱小民族。作为一个当时尚未取得独立的爱尔兰的知识分子，在英国人面前，他不断感到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位。

不论乔伊斯离故土多么远，年头多久，他的创作源泉始终是爱尔兰，笔下写的也只是爱尔兰。1921年，他对青年阿瑟·鲍尔说：“你这个爱尔兰人，必须根据自己的传统来写。……你必须写自己血液里的东西，而不是头脑里的东西。”他又说，“一切大作家都首先必须立足于本民族，他们那强烈的民族精神最终使他们成为国际作家。……至于我，我总是写都柏林，因为倘若我能进入都柏林的心脏，我就能进入世界各个城市的心脏。普遍寓于具体。”

世上有些作品一出现，立即引起轰动，然而很快就为人们所淡忘。《尤利西斯》却不是这样。当它遭禁时，许多名人为了维护出版自由而通力表示支持。然而当书出版后，人们却又迟迟疑疑地不敢轻易做出评论。但是今天，对此书的评论和注释，可摆满不止一书架。在它出版后七十多年的今天，这部小说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拉尔夫·雷德语）。它的价值日益被文学界所认识。乔学家哈利·莱文曾指出，它那“独创的表现形式有助于人们把握经验的新的方面”。进入90年代，乔伊斯研究依然是一热门话题，美国波士顿大学乔伊斯研究中心的基德教授，正在对德国学者盖布勒主编的《尤利西斯》（1984年初版）开展“标点符号之战”，广泛地引起注意。1992年4月的英国《卫报》载文说，基德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乔伊斯作品收藏家，拥有用28种不同语言出版的250种乔伊斯著作。看来关于《尤利西斯》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翻译《尤利西斯》时，我十分赞赏这部奇书内容之丰富：3卷18章，粗看好像天马行空，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漫无边际。其实全书布局十分周密。每章各有独立的内容。有谈莎士比亚的（第9章），有谈音乐的（第11章），也有用英国散文发展史来象征婴儿从胚胎到分娩的发育过程的（第14章）。文章既独立，前后又总有呼应。

我们译这部用字生僻、措词艰涩的书时，首先注意的是译文的流畅。另外，为了避免读者陷入迷津，我们尽量通过注来指出前后呼应处。例如第3章末尾提到一艘三桅船正逆潮驶回港口，第10章倒3节末尾又提到这艘从布里奇沃特运砖来的罗斯韦恩号，到了第16章，布卢姆才从水手墨菲口中得知，原来他就是乘那艘船驶抵都柏林的。前两次写这艘船，都是伏笔。单是第15章的注就达984条，因而所有的译注只好集中在每章之尾。

我们译这部小说在国内引起注意是不难理解的。一本名气这么大的书，终于即将见到其全貌了。所以不断有人给我们写信，鼓励我们早日完成。同时这个尚在进行中的译本居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兴趣，这是我们未料到的。最初是美联社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魏梦欣（Kathy Wilhelm）两次来家访问，并写了颇长的报道发往世界各地。接着，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罗伯特·本杰明也来访。事后他寄来了剪报，不但有美国几家报纸登了他那篇访问记，加拿大法语报纸和葡萄牙报纸也都译载了，有的标题为《布卢姆在中国》，有的是《布卢姆在北京》。另外，多伦多电台还电话采访过。

我们细读这些报道，才明白他们是把《尤利西斯》的中译本看作是我国文艺方面改革开放的象征。他们提到 50 年代连《简·爱》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都曾遭到批判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如今竟然翻译出版 30 年代在西方也有过争议的《尤利西斯》，这表明中国真的走向世界了。

附记：本文系把《话说 尤利西斯 》（《光明日报》，1994 年 5 月 27 日）和《天书、奇书、淫书？——话说 尤利西斯 》（《世纪》杂志。1994 年第 4 期）二文删改合并而成。

## 从《尤利西斯》看乔伊斯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乔伊斯自传体小说《一个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的末尾，主人公斯蒂芬在4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欢迎，啊，生活！我准备第100万次去接触经验的现实，并在我心灵的作坊中铸造出我的民族那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良心。”这里，“民族的良心”指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魂”。读《尤利西斯》时，不可忘记乔伊斯写此书之际，爱尔兰尚是大英帝国一部分。书中不时出现“家里的陌生人”一语，即指英国人。

爱尔兰原是个古老的独立王国，曾经有过灿烂的凯尔特文明。公元5世纪后半叶，圣帕特里克从不列颠岛前来爱尔兰传教，在爱尔兰建立了基督教会。这些传教士尊重凯尔特传统，很受爱戴。到了7世纪，凯尔特族基督教传教士高隆班及其后继者们从爱尔兰出发，辗转赴西欧各国传教。后来，爱尔兰的基督教会就归属梵蒂冈的罗马天主教廷了，但是继续保持其特色。进入16世纪以来，爱尔兰天主教与英国国教的对立愈益尖锐。

英国是在12世纪中叶开始入侵并占领爱尔兰的。至15世纪末叶，爱尔兰就沦为其属邦。17世纪初起，英政府还进而没收了爱尔兰北部大片土地。当时，凡是迁移到那里的英国殖民者，只要宣誓效忠于英王并且承认信奉新教的英王为宗教领袖，就能够领到一份土地。从此，当地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便成为佃农。经过前仆后继的流血斗争，爱尔兰人的处境才略微有所改善。

在《尤利西斯》第1章末尾，爱尔兰青年斯蒂芬对英国人海恩斯说，自己是“两个主人的奴仆，一个英国人（指“疯狂的女王”维多利亚），一个意大利人（指罗马教皇）”。这二者正是作者在书中所鞭挞的对象。玩世不恭的爱尔兰医科学生穆利根也曾对斯蒂芬议论道：“天哪！那帮混帐的英国人！腰缠万贯，脑满肠肥！”可见他对异邦统治者的深恶痛绝。

读《尤利西斯》，令人无法不感到弥漫在全书中的反英情绪。第1章末尾使用的“篡夺者”指的固然是硬从斯蒂芬手里夺走炮塔（斯蒂芬租的住所）钥匙的穆利根，这里似乎也在影射英国对爱尔兰的掠夺。尤其明显的是同一章中写到送牛奶的老太婆时的那句：“一个到处流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女神假借这个卑贱者的形象，伺候着她的征服者……”这里，“征服者”明明指的也是英国人。第9章中提到豁牙子凯思林。这是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叶慈的同名剧本中的女主角。这个贫穷的老妪也象征着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失去自由的爱尔兰。她那四片美丽的绿野（指爱尔兰四省：阿尔斯特、伦斯特、芒斯特、康诺特）都被夺走了。那个剧本曾唤起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爱尔兰人民的民族意识高涨。当时，与政治上的民族独立运动相呼应，以威廉勃特勒·叶慈、格雷戈里夫人、乔治·威廉·拉塞尔、约翰·米林顿·辛格为中心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在爱尔兰青年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年轻的乔伊斯虽然未直接参加这一运动，却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还把其中的几位写进了《尤利西斯》。诗人拉塞尔尤其在作品中频频出现，全书18章中，先后有6章都写到了他。

第9章中，斯蒂芬在爱尔兰国立图书馆向馆长托马斯·威廉·利斯特等



人发表关于哈姆莱特的独特见解。有些注家指明，他所说的“身着土黄色军服的哈姆莱特们毫不迟疑地开枪”这句话，包含着双关的内容。这里，乔伊斯一方面把《哈姆莱特》一剧末尾的流血惨剧比作南非战争（1899—1902）中英军对布尔人的杀戮（当时英国士兵均穿土黄色军服），另一方面又影射1887年9月爱尔兰民族主义党领袖约翰·狄龙（1851—1927）准备在科克郡米切尔斯镇发表演说时英国警察前来镇压，有个名叫普伦基特的英国上尉下令“毫不迟疑地开枪”，致使三名爱尔兰人被当场击毙，引起轩然大波。于是，包括狄龙在内的下院议员们愤怒地提出质询，而那时任爱尔兰事务首席大臣的贝尔福却单凭警察当局草率发来的一纸电报，就认定镇压有道理。英国自由党领袖威廉·埃瓦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提出“记住米切尔斯镇”这一口号，立即激发起爱尔兰人的反英情绪。

在第8章中，布卢姆回忆英国政客张伯伦于1899年到都柏林三一学院来接受一项荣誉学位时，爱尔兰学生和爱国志士曾怎样借此机会声援南非，边游行边高喊“支持布尔人！”“把乔·张伯伦吊死在酸苹果树上！”当时爱尔兰人和布尔人同样处于没有主权的地位，所以在南非开展的反英独立战争中，爱尔兰民众理所当然地支持南非，然而在英军残酷而野蛮的镇压下，最终布尔人还是被迫屈服，放弃独立。

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格莱斯顿早就注意到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力量，从而对爱尔兰自治表示支持。1886年2月他第三次组阁时，曾在议会里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却遭到否决，遂于7月间愤而辞职。不过，在格莱斯顿第二次组阁期间，他毕竟替爱尔兰农民做了件好事，那就是1881年通过的爱尔兰土地法案，俗称“格莱斯顿土地法”。这项法令的通过无疑也是爱尔兰土地同盟多年所奋斗的成果。土地同盟中的激进分子对此法令却并不满意，以致同盟大有分裂之势。这时，同盟主席查理·斯图尔特·巴涅尔（1846—1891）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终于恢复了同盟的团结。可惜巴涅尔由于与一有夫之妇同居的私生活问题而栽了跟头。天主教主教们指责他道德败坏，不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最后，连他的主要盟友《自由人》杂志同仁也跟他反目，结果竟壮志未酬而死。那是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一大挫折和损失。

詹姆斯·乔伊斯在其父约翰·乔伊斯的影响下，自幼就心仪巴涅尔。那位爱尔兰自治运动和民族主义领袖猝然去世时，乔伊斯才9岁。他却出于对巴涅尔的仰慕，怀着沉痛激奋的心情写了一首讽刺诗《希利，你也这样！》。希利是爱尔兰自治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另一领导者，本来他与巴涅尔关系密切，但在关键时刻，却与巴涅尔决裂。约翰·乔伊斯曾把此诗打印出来，散发给朋友们，可惜现已失传。成年后，乔伊斯另写了一首，题目叫做《巴涅尔逝世》，插在短篇小说《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中。巴涅尔在爱尔兰的影响极为深远，我们从乔伊斯《一个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1章中可以看到，他去世后，人们还在圣诞节晚宴上为他争论不休，甚至破坏了一年里最隆重的佳节气氛。在《尤利西斯》中，共有7章提到了巴涅尔，尤以第16章中布卢姆对与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两大段缅怀文字最为感人。作者还刻意插进相貌酷似乃兄的约翰·巴涅尔的活动（见第8、10、15章），也曾提及他的两个妹妹，使人仿佛觉得巴涅尔虽死犹生。

《尤利西斯》中，几百年来凡是在抗英斗争中有过丰功伟绩，或为之献身的爱尔兰民族英雄，一个个地都被提及。这里有起兵反抗英王亨利八世，事败被处绞刑的托马斯·菲茨杰拉德（1513—1537），以及19世纪英国下院中第一位爱尔兰民族独立领袖丹尼尔·奥康内尔（1775—1847），他毕生为爱尔兰人信仰天主教的自由和废除英、爱联合议会而奋斗。还提到他的后来人詹姆斯·斯蒂芬斯（1825—1901）。1857年，这位爱尔兰革命家在美国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芬尼社，主张推翻英国统治，并废除大地主所有制，建立共和国。（以上均见第2章）再就是爱尔兰政治家阿瑟·格里菲斯（1872—1922）。他原来是都柏林的一名排字工人，后赴南非当矿工和新闻记者，于1899年创办以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为主旨的周刊《爱尔兰人联合报》。（见第3章）当然，《尤利西斯》并不是爱尔兰民族起义的史书，而是一部小说，它对这些只是点到为止，尽在不言中。

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罗伯特·埃米特慷慨就义的场面了。（见第12章）这位爱尔兰民族领袖曾参加1791年成立的以解放天主教和实现议会改革为宗旨的爱尔兰政治组织爱尔兰联合会，并率领一批抗英起义者向都柏林堡（英国殖民统治机构所在地）进军。事败后被捕，定为叛国罪，被处死刑。作者用很大篇幅描述了行刑场面，揭露那时英国当局对起义者是何等残酷。在《尤利西斯》第12章中，一个绰号“市民”的激进派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叹惜爱尔兰陶器、纺织品、羊毛、花缎、利默克花边、白色火石玻璃、府绸、丝织品、花呢、象牙针绣，统统一蹶不振。由于河道堵塞，好几百万英亩良田均化为沼泽地和泥炭地，森林也濒于毁灭。随后，“市民”又拍着大腿描绘出爱尔兰的灿烂前景，“咱们那些空空荡荡的港口又会变得满满当当……咱们将会看到第一艘爱尔兰军舰乘风破浪而来，舰头飘着咱们自己的旗子。”

在第17章中，斯蒂芬因对英国国王有不敬之词而遭到两个英国大兵的殴打。连那位除了饮食男女之外，似乎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摩莉（布卢姆之妻），也回忆起她豆蔻年华时的情人加德纳中尉怎样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南非战争中害伤寒而死的事，而愤慨不已，“他们满可以一开始就讲和嘛。要么就让老保尔大叔和另外一个老克雷格尔（按：由于无知，她把南非荷裔布尔政治家保尔·克雷格尔的姓名拆成两个人了）去拼个死活，省得这么把战争拖上好几年，让那些漂亮小伙子害热病死在那儿”。（第18章）

乔伊斯早年就受到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一直是争取爱尔兰独立的政治运动的热烈支持者。他向往的是19世纪末在欧洲文学中萌芽的自由思想。自从20岁出走巴黎，他一生在欧洲大陆漂泊将近40年，其间只回过都柏林三次，每次也仅作短暂逗留。叶慈于1923年这样描述过乔伊斯：“他是个流亡者，起初在苏黎世，接着又去了巴黎。他逃离自己所憎恶的事物，却连那些商店的字号都始终铭记在心头。他既恨都柏林，对它又永难忘怀。”转年叶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丹麦诗人、评论家凯·弗里斯—莫勒向乔伊斯转告了叶慈对他所做的评语：“多了不起呀。乔伊斯打年轻时就没在都柏林呆过，然而他笔下却只写都柏林。”

乔伊斯曾借用19世纪的爱尔兰女作家西德尼·摩根夫人的“亲爱而肮脏的都柏林”一语作为《尤利西斯》第7章中1节的题目。这句话可以概括作

者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眷恋。所谓“憎恶”，其实是恨它不争气而已。依恋故乡而寸步不离是一种爱法；由于有如此执着的故土情结，身虽不在那里，不管离开多少年，相距多么远，依然梦魂萦绕，毕生只写以故乡为背景的作品，又是一种爱法。

1921年4月，为了庆祝《尤利西斯》出版合同的签订，莎士比亚书屋能干的女老板西尔薇亚·毕奇曾在巴黎为乔伊斯举行了一次酒会。那天，一个名叫阿瑟·鲍尔的爱尔兰文学青年被领到乔伊斯那张桌前，乔伊斯关切地问起他的写作。鲍尔说，他正想模仿法国讽刺作家的风格。乔伊斯对他说：“这可绝对使不得。……借来的风格不中用。”鲍尔说，他对民族主义已感到厌烦，想成为一名国际主义作家，像所有那些文学巨匠一样。乔伊斯指出：“他们都首先是民族主义的。例如屠格涅夫。你该记得他的《猎人笔记》是多么富于地方色彩——可就是以此为契机，他最终成为一位跨出国界的伟大作家。”

乔伊斯之所以选定匈牙利裔犹太人布卢姆作为本书主人公，绝不是偶然的。他在1920年9月21日致卡洛·利纳蒂的一封信中写道：“《尤利西斯》是一部两个民族（以色列和爱尔兰）的史诗……”当时，爱尔兰本来就已沦为英国属邦，而作为归化爱尔兰的匈牙利裔犹太人，布卢姆更是受着双重的压迫和歧视。他父亲鲁道尔夫就因濒临破产，服毒自尽（见第6章）。他素来温文有礼，与世无争，然而一帮心地狭隘的爱尔兰市侩偏偏抓住他的种族问题寻衅。他忍无可忍，被迫反击了，大吼一声：“为以色列三呼万岁！”接着就严正指出：“你们的天主是个犹太人，耶稣是个犹太人，跟我一样。”（见第12章）

这句话说得理直气壮，不啻是给反犹分子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1936年，乔伊斯边读着英国版《尤利西斯》的校样边对弗里斯—莫勒说：他为了这一天，“已斗争了20年”。是的，自从1914年着手写《尤利西斯》以来，直到1918年美国的《小评论》方开始连载，最早的单行本则是1922年在法国由莎士比亚书屋出版的。德（1927）、法（1929）、日（1932）译本相继问世后，美国版（兰登书屋，1934）也出版了。然而毫无疑问，对乔伊斯来说，最重要的是此书在英国本土的出版。也难怪他接着以更加豪迈的口气对丹麦诗人、小说家汤姆·克里斯滕森说：“现在，英国和我之间展开的战争结束了，而我是胜利者。”他指的是，尽管《尤利西斯》里对1901年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太子（当时（1904）在位的国王爱德华7世）均有不少贬词，英国最终不得不承认此书，让它一字不删地出版。

在乔伊斯的一生中，民族主义思想是贯彻始终的。早在1912年8月22日，刚届而立之年的乔伊斯就在致妻子诺拉的家书中写道：“阿贝剧院开办了，他们将上演叶慈和辛格的戏剧。你应该到那儿去，因为你是我的新娘子。我是也许终于在这个不幸的民族的灵魂中铸造了一颗良心的这一代作家之一。”

借用《尤利西斯》第1章中的话来说，乔伊斯是用手中那把“艺术尖刀”，

---

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504~505页。

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521页注释。

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693页。

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332页。

一杆“冷酷无情的钢笔”，为他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爱尔兰同胞和他们的生活做了素描，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

爱尔兰民族一向酷爱自由。30年代，爱尔兰文学在中国就十分走红。当时，格雷戈里夫人的《月亮升起》简直不知道上演了多少场，因为两个国家都受着各自邻国的压迫，民族主义同是思想界的主流。在一个意义上，《尤利西斯》在爱尔兰，正如《阿Q正传》在中国，都是以恨铁不成钢的悲愤心情而写的。萧伯纳认为，“足以告慰的是，终于有人（指乔伊斯）由于对都柏林的落后面感触极深，因而敢于面对它并将它的丑态统统写下来，而且用自己的那份艺术天才，强迫人们去正视它”。当乔伊斯正酝酿并撰写《尤利西斯》时，爱尔兰这座“绿宝石岛”还是英国一块属地。《尤利西斯》脱稿的那一年（1921），爱尔兰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由邦了。1948年，爱尔兰终于脱离英联邦，成为一个共和国。

在20世纪小说史上，《尤利西斯》是一座奠基石。在爱尔兰民族独立史上，它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1995年1月1日  
为《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而作

（原载《读书》，1995年4月号）

